

难忘的 1945 年

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新闻界的冲击

国务院政研室和 1975 年的整顿

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我的祖父孙中山

中共党史资料



61

总第六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1997年1月出版

D239
6:49

98580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主 编：韩泰华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

本期责编：陈 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61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1997.3

ISBN 7 80136-082-6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6306号

中共党史资料(61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7印张 160千字
1997年3月北京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ISBN 7-80136-082-6/K·72

定 价:6.00元

DH194/26

目 录

回 忆 录

- 难忘的 1945 年 李 新(1)
- 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萧 克(32)
- 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李 锐(54)
-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新闻界的冲击 穆 欣(91)

专 题 资 料

- 博古与《解放日报》的四年 陈 夕(127)
-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 1975 年的整顿 程中原(137)
- 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159)

文 献 资 料

- 致陈乔年等的一封信 王若飞(170)

人 物 介 绍

- 我的祖父孙中山 孙穗芳(172)
- 祖父郑洞国的一生 郑建邦(175)

译文选登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

(1945.12—1946.1) 陈春华 译(193)

新书选介..... (220)

难忘的 1945 年

李 新

一、太岳区所闻

1944 年冬,大约是十一二月间,我随刘锡五到太岳区巡视工作。刘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我是组织科长。到太岳区后,我到阳城等县的乡村去调查;他留在区党委听各地来汇报,有时也就地作些调查。

在阳城的时候,听说王震、王首道的南下支队从延安出来,经过太岳区过黄河,到豫西,往南边去了。群众传说南下支队过河时,天老爷保佑,河水全结了冰,部队徒涉而过,非常顺利。这是因为河南人民对汤恩伯十分痛恨,认为他是“河南四荒:水、旱、蝗、汤”的老总。日本打来,他就跑了。而老八路是神兵天将,这时来救老百姓,所以天老爷特别保佑他们。从这个传说,可见当时民心的向背。听到这个传说不几天,刘锡五就给我来电话,要我赶快回安泽,到区党委去听重要传达报告。

作传达报告的是区党委的代理书记王鹤峰。他说:党中央认为目前抗战的形势很好,所以特别组成南下支队,以三五九旅为基干,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要从豫西经鄂、湘直到桂、粤，筑一道长堤，防止蒋介石由峨嵋山下来，从三门峡、三峡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同时，还由王树声、戴季英率两千余人到河南开展工作。

二、赶回北方局

听完王鹤峰的报告不几天，刘锡五就告诉我，邓小平有电报来，要我们赶回北方局。

1945年1月，我随刘锡五回到山西辽县的麻田镇，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从1940年就一直住在这里。回到北方局，看到了中央发来的电报，要北方局加强对冀鲁豫工作的领导。

中央的电示指出：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人口将近两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是敌后最大的根据地。但减租息大半尚未进行，各项工作尚未走上正轨，群众基础还不巩固。黄敬（当时任中共平原分局书记）又因病离职。为此，北方局即应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对减租减息工作有经验、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帮助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北方局必须亲自抓平原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八路军总部及野战政治部仍留太行。随后，中央又通知：北方局去平原工作期间，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河南区党委由中央直接领导；太行、太岳两区党委仍由北方局就近领导。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立即率领北方局全班人马南下中原。

自 1939 年我率西青救(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剧团到前方后,即在太行山吃小米,我心里是多么地盼望有这么一天,八路军南下平原,实行反攻,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啊!现在,这一天果然来到了!我兴奋得晚上不能入睡,从延安到太行的一切经历,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为安定心情,我依《水龙吟》词调写成了这首词的上阕:

“延安万古流芳，
延河送别多悲壮！
挥戈东渡，滔滔黄水，排空浊浪。
高举红旗，仰天长啸，太行山上。
望长城烽火，中原离黍，
凝眸处，增惆怅。”

一想,这样写不对,我这时还有什么惆怅呢?惆怅,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不是高兴得觉都睡不着吗?应该改写。正想如何改写,想着想着,一睁眼,天大亮了。于是,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起程。

三、直下中原

大约在 1945 年春节前,邓小平率领中共北方局全班人马,由太行山上清漳河畔著名的麻田镇起程,浩浩荡荡,直奔已被日寇铁蹄蹂躏将近 8 年之久的华北大平原——中原。当时所谓的全班人马,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因为自从 1942 年 5 月日寇大“扫荡”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

以后，北方局进行了大精简。组织部除部长刘锡五外，只有部员两人、干事一人。两个部员即干部科长郭森和组织科长李新；一个干事即周金光。而郭森是从冀南调来的，成立平原分局时已回冀南去了。周金光似乎也走了。所以这次南下，就只有刘锡五和我两人。宣传部除部长李大章以外，只有部员朱穆之等二三人，在我的记忆中，朱穆之并没有随李大章南下。统战部和政权工作部自5月“扫荡”、张友清被俘和张衡宇牺牲后就没有再恢复。青委的江明早已离开，周惠则到太岳区担任了士敏县县委书记。妇委自蒲安修随彭德怀去延安后，似乎也没有人了。秘书处只有处长陈鹤桥随行，卓琳是否随邓小平一起南下我已记不清了。交通科的人较多，大概有十来个人，但他们有任务，是不能走的。城市工作部的人也是不能走的。为了到平原去加强群众工作，又从太行区把彭涛调来，从太岳区把周惠调回，是否还有其他人员，印象也模糊了。不过最多也不过两三人而已。总之，这次的全班人马，大约有十多个干部，但因有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刘锡五和李大章，在当时情况下，其声势确也是很浩大的。何况还有护送的部队呢。

这次南下中原，一路顺利。一方面是因为有部队护送（但护送的部队不多，所以我已记不清是哪个部队了）；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是因为1942年以后，我们对敌占区的工作加强了，许多伪军据点，都是两面派，对我们通过，并不阻拦。这同1942年我率领青委巡视团，随邓小平、戎子和到冀南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次过平汉路没有成

功,返回时还遭到日寇的袭击。这次通过不少敌人的沟垒,但没有听见敌人的枪声,如入无人之境。尽管日寇1944年经过豫湘桂战役,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从敌占区的情况看来,中国人心不死,“中原父老望旌旗”,我们的反攻,现在虽然还是局部性的,但最后的胜利已经是不远了。

一踏到平原的土地,我们就欣喜若狂。抬头一望无际,尽是麦田,而且每天都吃白面,这和太行山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每天一大清早,太阳就出来了,要很晚很晚,太阳才落下去;而在太行山则要很晚才看到太阳,很早太阳就被山遮住了。似乎平原的一天要比山区长得多。不过仔细一想,平原的同志们坚持抗战多么艰苦啊!他们每天都盼望早些天黑,晚些天明,他们真是度日如年。这时我们就觉得太行山可爱了。要没有太行山,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呢。

不几天,我们就到了濮阳。当时,中共平原分局就设在这里。

四、在濮阳的争论

我们到濮阳后,受到平原分局同志们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对分局干部的讲话,也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邓说:当前革命形势很好,抗战胜利已不成问题。但必须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必须防止蒋介石抢夺和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为此,中央已派王震率部南下,从豫西、

鄂西以至湘赣、桂粤，在平汉路西修一道大堤，防止蒋介石那股祸水从三门峡和三峡涌出来。这就像古代修筑万里长城一样，防止敌骑南下，到中原来抢夺秋收果实。今天，中央又要我们到冀鲁豫来，帮助你们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并向南和新四军的五师、四师打通联系，又在平汉路东再修一道长城，或叫再筑一道大堤，防止蒋介石那股祸水泛滥。黄水在中原是经常泛滥成灾的。蒋介石也和黄水一样，你们这里不是叫“水、旱、蝗、汤”吗？汤恩伯去年被日本人打垮了，我们就是不许他再回来。中原人民是最善于筑堤防水的，现在我们对付蒋介石，说像对付黄水为患一样，这叫做“筑堤防水”。邓小平很会讲话，讲得既深刻，又生动，不时引起大家的笑声和掌声。

随后是分局和各地的同志们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汇报的中心是发动农民，主要是减租减息工作的情况。这时冀鲁豫各地正在开展“雇、佃、贫运动”。何为“雇、佃、贫”？就是雇农、佃家和贫农。当时冀鲁豫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搞得很“左”，只强调雇、佃、贫，不注意团结中农，甚至对中农连提都不提了。我们这些从太行、太岳来的人，见此当然感到不安。因为现在还在抗日嘛，地主、富农、开明士绅都要团结，怎么连中农都可以不要呢！但是，他们这里的群众运动确是搞得轰轰烈烈，邓小平、刘锡五、李大章不好说话。彭涛是太行来的，周惠是太岳来的，说话也有顾虑。于是他们都推着我出来讲话。那时，分局书记黄敬因病到延安去了。代理书记宋任穷又到前面管军事工作去了，分局管群众工作的是张霖之，驻

地濮阳的地委书记(或副书记?)是赵紫阳,地青委书记是纪登奎。在汇报和讨论中,平原方面主要是他们三人发言,他们都一致支持说雇、佃、贫运动正确,尤其是纪登奎,分局驻地就是他在那里“坐村”。他讲得很生动,很动听,坚持雇、佃、贫也最坚决。纪登奎是我在北京局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学生,所以这次从北方局来的人都认为我出来说话最合适。刘锡五还专门为此和我谈过话。我自己也觉得应该说话了。

一到濮阳,我就注意到驻村去了解群众生活情况。会议开始后,我是白天开会,晚上到群众中作调查。尤其是大家要我发言后,我更深入地作了专题调查。经过深入的了解,我发觉这里雇、佃、贫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强迫命令很严重。群众每晚上听见敲钢轨的声音(当地群众把破坏铁路拉回来的钢轨吊在树上,敲击它便是号令群众集合的钟声),便跑步赶往会场。就连小脚老太太也都提着马扎,一歪一扭地赶着去开会。会场上鸦雀无声,秩序井然,就像我们的正规部队集合时那样的严肃。我一看到这种现象就怀疑,经了解,果然是强迫命令的结果。雇、佃、贫农,社会地位低下,很容易接受强迫命令。当他们被组织起来,连中农也不要,就感到很孤立,便一心依靠八路军共产党。而经过减租减息,特别是通过清算退租,他们得到很大的利益,便又骄横起来,更不注意团结全村中农以上的群众。这样的地方,如果日寇再来,要建立伪组织是很容易的。

我把情况了解清楚后,便在会上作了一次长篇的发

言。我根据太行的经验,说明强迫命令不能真正发动群众。说明不团结中农,不争取一切阶层抗日,是经不住战争考验的,由此证明中央既依靠基本群众,又注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而且,基本群众就包括中农在内,只要雇、佃、贫,就会脱离相当多的群众,就会孤立,群众感到孤立,就不会自觉地起来,那就只会是强迫命令了。这时我把调查到的材料,把驻村的真情况讲了出来,到会的人都大吃一惊,谁也无话可说。纪登奎虽然不服气,有时争了几句,但在事实面前,尤其是在中央明确有政策面前,他也只好忍着不说话了。

最后由邓小平做总结。他首先肯定了平原分局的工作成绩,称赞军队打胜仗,扩大了解放区;地方干部特别辛苦,支援了战争,也发动了群众。在平原地区的地方干部,坚持抗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特别关心他们。然后着重谈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他说:在敌后,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坚持抗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要依靠农民,就必须减租减息,要减租减息,就得依靠雇、佃、贫,冀鲁豫的同志们着重发动雇、佃、贫是对的。但是,今天是抗日战争,不是土地革命,一定要把中农团结好,同时还要注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就是搞土地革命,也是要团结中农的。从前“左”倾路线的错误,就是没有注意团结中农。太行、太岳在发动群众中注意团结中农,有好的经验。总之,我们是来帮助冀鲁豫同志们做工作的。首先,太行、太岳的同志要向这里的同志们学习,这里的同志们也应该学习太行、太岳的经验。现在,我们开始局部

反攻了，不久就会大反攻，抗战就会胜利。但是，同志们切勿骄傲，一定要虚心，要团结，争取胜利早日到来。邓小平的总结，面面俱到，一场争论，就此结束，大家都感到满意。

五、难忘的奇遇

在濮阳，我还有一次终身难忘的奇遇。

群众为了欢庆春节，特地请来大戏班唱戏。濮阳虽属河南，但地近山东，群众的性格豪迈粗犷，颇有水泊梁山的英雄气概。集上人们喝大碗酒，吃大块肉。唱戏时声音高亢，尤其是花脸，力竭声嘶地大喊大叫，令人震耳欲聋。

那天我看戏看得正带劲的时候，忽然有人从身后往我肩上一拍，蓦地回头一看，原来是“死鬼”彭梦庾，叫我大吃一惊。我定睛细看，不错，这不分明是活生生的“清谈家”吗？我们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许久才放开。这时，我开玩笑地问他：“你不是老早就‘万岁’了吗？今天不能来找我替死呀！”他轻轻地给了我一拳，于是大家都哄笑起来。这一幕情景，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际。

我和彭梦庾 1940 年一起在北方局青委工作。我担任青训班主任，他当副主任，亲如兄弟。我俩都是四川人，爱吹牛，彼此戏称“清谈家”，别人也都这样称呼我们。1942 年 5 月“扫荡”时，他被俘了，传说他与张友清一起被敌人杀害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其实他被俘后押往太

原,敌人审问时,他故意说是河北南宫人,因为他巡视工作时到过南宫,熟悉那里的情况,并学会说几句那里的话,因此连翻译都被他骗过了。这次审问,凡说是南方人的都被认为是老红军给杀了。张友清因为是中共著名人物,敌人有他的照片,所以也被杀了。彭后来被送往东北作苦工,在黑龙江挖煤矿。在听到又要把他们送到日本作劳工时,他联络了一部分可靠的人组织暴动。暴动虽然成功,但逃到森林里无法立足,于是便分散了。他找到一个地主家当长工,这家人有爱国思想,尤其是那位大少爷是个学生,很同情抗日军队。后来便是在他的帮助下,彭梦庾才能够和一个难友(一二〇师宣传队副队长?)一起回到石家庄附近那位难友的老家。经过打听,他们知道北方局已到濮阳,于是那位难友故意带上他的小侄女,一起赶到濮阳来。那个小女孩不过十一二岁,很机灵,我故意装成敌伪人员来考问她,她回答得一丝不漏,因此我相信他们一路上是很顺利的。

上述情况,是我和彭梦庾谈话后得知的。我向刘锡五做了汇报。锡五说:在前方不便审查。送回延安去吧。在延安,对他这种传奇式的经历也无法做结论。后来到了东北,张闻天经过认真调查,证明他所谈属实,肯定了他们的斗争,恢复了他的党籍,并任命他担任了黑龙江省的一个县委书记。全国解放后,他调到江西工作。江西省长邵式平很赏识他,让他当了省政府的秘书长,同时还是省委的秘书长。他这时在江西真是红极一时,曾几次邀我到庐山去游览,但我都因工作繁忙,未能如愿。一直到今天,我

也未曾亲上庐山，很可能是一生的憾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彭梦庾这个江西的大“走资派”当然在劫难逃。但他却善于躲避，造反派很难捉住他。有一次造反派追到庐山来逮他，他实在无处躲藏，便躲进了毛主席的住所。造反派明明知道他躲在毛主席那所特别的庭院里，但谁也不敢闯进去，因此得免于难。

“四人帮”倒台后，他被周惠邀到内蒙古任自治区副主席。后来又回到东北工作了一段之后便离休了。去年秋天，因跌交倒在地上便仙逝了。听到他的噩耗，我不胜悲悼，现在提笔写到这里，一想起我们在太行山上的真挚友情，我的手便止不住发抖，无法再写下去了。

六、赶赴豫东

在濮阳没有住多久，彭梦庾就起身往延安，我也就起身赶赴豫东去了。

这时北方局决定在平原分局下面，设立一个豫东区党委，辖十二地委和十三地委，十二地委在水东（黄河改道后黄泛区的东面），十三地委主要在水西。我记得区党委书记是戴晓东，组织部长是王一心。其余的人事安排我已记不清楚了。我现在看到的党史材料，有关豫东区党委的事竟一字也没有。我相信经过认真查考，豫东区党委成立的经过和它的活动情况，总可以搞清楚的。

我到豫东，是刘锡五和我谈的话。他说北方局决定新成立一个豫东区党委，因缺干部，要把王一心从太岳调到

区党委当组织部长，把你调去担任十三地委副书记。现在王一心还没有到，你可随部队先走。王一心到职后，由他和你再联系。王原来是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科长（刘尚志之后，郭森之前），我们曾共事两三年，非常熟悉。因为形势发展很快，部队走得很急，我也赶紧跟着离开了濮阳。这时十三地委在水西，我也随部队过了黄河。但刚一过黄河，又接到通知，要我赶快到水东去。我于是离开部队，由地下交通带领着再渡河东去。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的中心区杞县。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内，我两渡黄河，并且经过黄泛区，使我对黄河两岸人民的苦难，有了初步然而十分深刻的了解。那一带的人民群众，居无定所，随时迁徙。所谓房屋，只不过四根砖柱，另外有一只小船，系在一根砖柱上。黄河水来了，一家人就到船上住，等水涨过砖柱，他们就驾着小船，四处飘流，随遇而安。等黄河水退了，他们又回到老家那四根砖柱内居住。因为砖柱上刻了字，所以能各回各的家。各家的土地，也可以从砖上的字，按方向、距离和面积测量出来，毫无差错。一般情况下，黄河是秋后退水，人们可以赶回家去种麦。他们种麦的方法很简单，前面一个人拉着犁走，后面一个人用手把麦种放进那浅浅的犁沟里面，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犁沟麦”。因为泛滥的河水淤成的泥土很肥沃，所以“犁沟麦”的收成很不错。不过要早种早收，种迟了或收迟了就有被河水淹没的危险。这一带人民主要就靠这一季麦收过日子，实在穷得可怜。家里什么也没有，穿着之破烂，看起来都像乞丐一般。

我们在太行听说平原老百姓吃白面，哪里知道他们比吃小米的山西人还苦得多呢。到黄泛区看到的景象，更令人惊异！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连白云经过这里也变成了黄色的。纵长至少一二百里，横宽数十里的黄泛区，大部分地方水都不深，可以步行，但脚一踏进去，浅处拔起来已感困难，越深越难拔脚，到更深的地方，则越拔越深，甚至于有灭顶之灾。这和红军经过的草地颇为相似，而这里是黄天黄地，中间还有深浅莫测的黄河流水，更增加人们的恐怖感。因有交通员引导，我们是从黄泛区上游的边沿到水东去的。上述的情况，大部分只是看到和听说，并没有亲历其苦。在随部队渡河南下的时候，我的情绪很高，曾写下一首诗记行，名曰《南下》：

中原父老望救星，
天上飞来八路军。
万里黄河今夜渡，
千寻江岸几时平？
壶浆箪食迎郊野，
戴月披星奔远程。
胜利归来再相见，
房东休怪未辞行。

等到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虽然对抗日反攻的形势仍然感到鼓舞，但人民生活的困苦却使我心中感到很难过，连一点写诗的情趣也没有了。

七、在杞县工作

我赶到杞县时，豫东区党委正在开会。王一心在会下告诉我：因为十三地委在水西，这时河南省委已成立，而河南省委直属中央，水西究竟归河南还是归豫东区，尚未确定。对这个问题，豫东区党委不好说话，北方局和平原分局也要等中央决定。不过，水西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根据地，他们地委和专署机关人员以及几个县的干部现在都还在水东。因此区党委决定你暂时担任十三地委组织部长，把十三地委在水东的人员全部管起来。至于如何开始工作，等再研究一下才决定。

我虽然列席区党委的会议，但大部分时间是用来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这里本来是河南东部，因为黄河改道，才和河南其他地区分隔了。由于日寇占领了津浦路和陇海路，这样，黄泛区以东至两条铁路之间的三角地区便称为豫皖苏边区。从1938年到1941年，这个地区都属于新四军活动的范围。1941年以后，党中央决定这个地区仍归华中局，但由冀鲁豫代管。1944年汤恩伯被日军赶跑后，我八路军分两路（豫西和豫东）南下。到1945年，我豫西部队又向豫中发展，以至成立了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我平原分局成立豫东区党委和豫东军区也正是这个时候。但这时水东地区的根据地，其中心比较巩固的地区也不过睢（县）、杞（县）、太（康）交界处的一百来个村庄。现在，在这个狭小的地方，除豫东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外，还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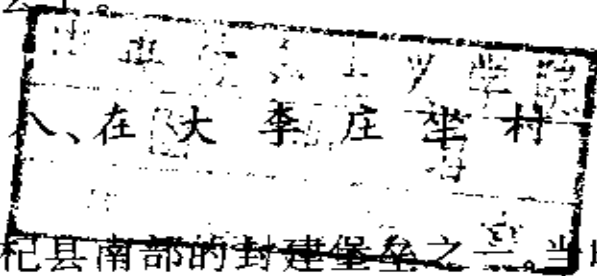
一个军分区(十二军分区)以及十几县委、县政府和几个县大队,到处都是机关,到处都是干部,实在拥挤不堪,而且又没有发动群众,以至连给养都发生困难。根据这种情况,我认为当务之急,一是军队趁势向前推进,极力扩大解放区;二是集中干部,把中心区一百来个村庄的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减租清算,巩固根据地,以便加速反攻,消灭敌伪,并防止汤恩伯之流的顽固势力卷土重来。为此,我建议区党委组成一个工作团,把所有十二、十三地委的有关干部都集中起来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我愿承担这项任务而不必到十三地委去工作了。区党委采纳了我的建议,任命我为杞县工作团的团长(因为中心区大部分都属杞县)、中共杞县工委会书记兼杞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

这次区党委开会,正值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法西斯德国继意大利之后彻底失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已毙命,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在讨论政治形势时,人们无不欢欣鼓舞,认为日寇的末日即将到来。但同时也感到蒋介石必将趁日寇灭亡之际,从峨嵋山下来和我们争夺抗战胜利果实。我们必须赶快“筑堤防水”,以免“祸水泛滥”。眼看平汉路西那道堤修得快,王震部队已到湖北、湖南,快要与两广打通了;而我们平汉路东这道堤,虽说在水西已有很大发展,但至今还没有和新四军的五师和四师打通关系,联结起来。也就是说这道堤还没有筑成个样子,更不用说巩固了。估计到蒋顽必将来犯,我们除军区主力要加紧反攻,努力扩大解放区并巩固和扩大部队外,两个军分区都要抓紧建成自己的地方主力,各县

的游击队要赶快建成独立团或比较正规的游击大队，县以下各区都要有游击队，各村都要普遍建立起民兵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豫皖苏解放区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巩固。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是要把中心区的群众发动起来，以便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向外发展。在讨论发动群众的工作时，强调既要依靠基本群众（贫雇农和中农），又要团结一切抗日民主阶层特别是有影响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要注意统战工作。为此，认为用共产党员的名字（无论是烈士或著名人物）作为县名，很难得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的同意。会上决定恢复杞县、睢县和太康的名称。于是，杞南（芝辅县）和杞北（克威县）合而为一，两个县委合成一个县委，由我去担任县委书记；两个县政府和两个县大队也都合并。因为合并必须有人事变动，而我在那里工作不到半年，所以现在连县长、副县长以及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和副政委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杞县工作团共有一百多个干部，以十二地委各县的干部为最多，其次是十三地委的干部，再加上区党委和行署机关的干部。另外还有刚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十几个知识分子。我把全团人员集中起来经过动员之后，又把他们分配到 11 个基点村去，每个基点村一个工作组，首先在基点村发动群众，然后推广到附近的村庄。把工作团的工作布置好以后，又把两个县大队合并的问题处理好，因为军分区副政委李中一是我在延安就熟悉的老战友，而且还是四川同乡，所以一切麻烦都靠他来帮

助解决。随后我把杞县县委和县政府的驻地安放在赵村吴芝辅的大院里。为了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和建设新杞县,我以工作团团长的身分和县长共同具名邀请杞县各界著名人士来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我做抗日反攻的政治形势报告;县长则阐明有关减租减息的政策问题。刚从开封出来的一位女大学生,是学音乐的,会作曲,会唱歌,也会弹琴,她把我刚写成的一首《眼看日本快完蛋》的歌词,按河南曲调谱成新歌,并且当场自弹自唱地表演,赢得全体与会者喝彩。随即又有两个大学生出来讲话,一个痛诉敌占区人民的苦难;一个痛斥国民党的腐败,前者哭诉得泪流满面,后者激动得怒发冲冠,所有的人听了都十分感动。这次座谈会开得很成功。有几个士绅在会后说,共产党在这里坚持抗战多难啊!现在实行减租减息,也是为了抗日反攻,我们有什么话可说,就是割下一块肉,也只得忍痛了。开完这个座谈会后,全县的领导干部,除留下个别同志照顾日常工作外,其余的全都下到基点村坐村去了。



大李庄是杞县南部的封建堡垒之一。当时,敌伪还盘踞着杞县城,大李庄便成为杞南的中心地区,如果不把大李庄的封建势力打垮,要在杞县以至睢、杞、太地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很困难,即使表面上建设起来了,也很难巩固。因此,我选择大李庄作为基点,并到那里去坐村。

同时，大李庄离县委和县大队的驻地都不远，对照顾全县的工作也较为方便。我到大李庄时，工作组正在准备成立农民组织。大李庄的东西两头历来有矛盾，这一头主张成立农民协会，那一头却主张成立农会，争论不休，工作组也感到为难。而且冀鲁豫那套“雇佣贫思想”也传到这里来了，认为每人平均3亩地以上的农户都不能参加农民组织。我一到，工作组的干部和村里的农民积极分子都要求我解决这一问题。

经过了解，我知道村东头和村西头的矛盾，历史很久，是由于东西头的地主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里在大革命时期成立过农民协会，而且参加过武装暴动，人们都说吴芝圃于1927年领导农民起义，打开过杞县城，还坐过几天大堂。这里的党组织，一直保存到现在，全村还有4个秘密党员，组成一个党的小组，长期由外面派人来直接领导（现在已归区委领导）。我首先找党员来商量，随后又和积极分子们讨论，结果大家认为农民协会本来很好，但是农民起义失败后，不仅地主恨透了它，就是农民们提起也有些害怕。现在华北的农民组织都叫农会，有八路军作主，我们这里现在也来了八路军，那么，还是叫农会的好。组织名称很顺利地解决了。关于什么人能参加农会的问题，大家都不赞成中农参加，说中农靠不住。工作组的干部也是这个意见。对此，我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要打败日本，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非团结大多数人不可，结果总算说通了。不要富农参加，没有不同意见。可是什么是富农呢？都说每人平均5亩地以上的就是富农。我说：那

样不好(不科学),是不是富农应该看他雇工不雇工?最后大家同意:5亩地以上又雇工的算富农,5亩以上、自己劳动、不雇工的仍是中农,可以参加农会。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思想统一后,由他们去串连,很快,参加农会的人就占了全村的大多数。成立农会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极了。

紧接着便展开了减租清算运动。首先,农会会员分片诉苦。然后找出最能说理斗争的积极分子和最需要向他展开斗争的地主对象。于是,先向容易斗倒的对象展开斗争,等取得胜利并得到些胜利果实、群众情绪特别高涨时,再召开大会向最顽固的地主展开斗争。结果不错,一个最大的、最顽固的地主也低头了。不但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按清算帐目的数字退赔给佃户、债户、雇工和全村群众(多年少交的各种负担)。由于把所有的积谷、财物拿来退赔都不够,便把土地拿来折价退赔。这下群众可高兴了,又有几家地主连土地都要拿出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和当地的环境,我觉得还不宜把地主的土地都给分了。事前我们也曾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减租减息和各种负担都是从我们在当地正式建立政权之日算起,而不是从抗战开始的1937年算起。但群众很会算帐,把各种帐目都一一加以清算,结果几乎所有地主的财产和土地都将被算光。怎么办呢?我找党员和积极分子来开会,说明现在就分田地还不是时候,这要等打完日本鬼子以后才可以,希望大家要忍耐。按照现在算帐的结果,土地财产本应都退还我们,但我们可以大方一点,只要几户大地主的土地

和房屋，其余中小地主的土地一律不动，对有困难的小地主连财物也可以多留些。就是大地主，留下的土地和房屋也要比全村的平均数高一些。大家听了我的话，开始不大同意。但经我反复解释，说如果团结不住大多数村民，如果大批地主都进城去当了汉奸，我们要打败日本就增加了困难，我们减租清算的果实也很难保得住。这里的农民有经过起义而又失败的教训，他们对我的解释终于理解和同意了。有一个老农（积极分子）拉着我的手说：老李同志，你真好，你真是在为我们操心呀。

农会在分财产的时候又发生了问题。东西头得到的财产相差很多。多的一头反对全村平分，少的一头不同意。开始是争吵，后来几乎打了起来。由于这种矛盾，民兵对地主的监视也放松了。那户最大的地主乘机逃跑，工作组领着民兵去追也没有追回来。于是立即召开农会会员大会，说明天下农民是一家，怎么能一个村还分两头呢？从前东西头矛盾是地主在争权，现在再闹东西头，要不是地主在那里挑拨，就是我们农会会员觉悟不高。我们农会会员可不能听地主的话呀，地主怕的就是我们农会团结。我们自己也不要太小气了，见了东西就眼红，总想多分一点，这样地主可要笑话我们啦。经过讨论，决定无论东西头都一样分，贫雇农分得多一些，中农也应按照帐目多负担的部分退还给他们，因这是从地主那里退赔的，我们贫雇农不应该去占中农的便宜。这样分配的结果，大家都感到满意。随后又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说明减租减息是孙中山的主张，中国政府早有明令，现在抗日民主政府

是要坚决实行的。这不仅对农民有利，也是为了打日本，你不能让人饿着肚子抗日嘛。这是对全中国人都有利的，对地主也有利呀。中国亡了，地主不是一样当亡国奴吗？因此反对减租减息是不对的，不利于抗日的。地主接受减租清算是好的，逃跑是对减租息的对抗。如果赶快回来，还可以原谅；如果不回来，就要受到应得的处罚；如果进城当了汉奸，那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罪人，人民政府是绝对不能饶恕的。村民大会后，还分别向各地主家告诫，以后就再没有地主逃跑了。对地主的逃跑，农会会员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农民必须加强团结，防止地主有任何报复的活动。从此，农会更加巩固了，民兵的警惕性提高了。连妇女会、儿童团也更加活跃。

由于运动一开始就注意培养贫雇农积极分子，所以在运动中能逐个地发展党员，不到三个月全村就有党员十几名了，于是建立起支部，并通过党支部去领导全村工作。运动后期，又在全村展开了民主运动，由全村公民来选举村长。选举时，不但农会会员们积极参加；没有参加农会的农民（主要是富农）也表现得非常积极；就连地主家，也都不分男女，只要是成年的全都来参加了选举。全村的妇女救国会也重新经过选举，一个姓任的老党员当选为妇救会主任，她在村里很有威信，人们都叫她任大姐。对民兵的审查很严格，不仅全部都是农会会员、贫雇农；而且几个合格的党员都参加了进去，并由一个身强力壮的支部委员当了队长。

大李庄的群众，经过减租运动是发动起来了。因为我

不久就离开了杞县，这里的工作是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我一直很担心，很想有机会再去作一番调查，可惜至今未能如愿。

九、抗战胜利

我这次到豫东，估计我们总得经过一两年的艰苦斗争，抗战才能取得胜利。到那时，我们在平汉路西和路东的两条长堤都修好了，蒋介石被我们挡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华东和华中的大部分都将被我们解放，华北和东北更不用说了。这样，中国革命将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同时取得基本上的胜利。谁也没有想到抗战胜利来得那样地快，以至一听到胜利消息，不但感到无比的欢欣，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惊奇，而且还有些忐忑不安。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得到了百倍的加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口号，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没有实现，有些工农干部泄气了，但我们这些比较有国际知识的干部，仍然坚信日本必败无疑，只是要看苏联反攻德寇和美国反攻日本的时间何时到来，以及其发展进程如何。等到1942—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大胜和美军在太平瓜岛（瓜达康纳尔）反攻胜利后，日本战败的形势已定。希特勒败亡后，大家都认定日寇的末日即将到来。一听到雅尔塔会议的消息，特别是波茨坦公告的发表，更认定日寇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人们这时对时事特别关心，每天都盼望着有新的消息。

从开封出来的两位女学生，身体病弱。我到大李庄坐村时，她俩要求同去。考虑到她俩难于同贫雇农同吃同住，我劝她们先回开封去为我们在城市中工作。开始她们不同意，后来同意了，而且很感动，坚决把一个很好的照相机和不少胶卷送给了我。我根本不会照相也不爱照相，恰好一位刚从水西过来的军队干部很喜欢它，我于是转赠了他，他便把一个收音机送给了我。这个收音机很好，是反顽斗争的战利品，美国货。这下我可高兴了！每天能收听敌伪电台和重庆电台的新闻，天气晴好、夜深人静时还可以收听到延安的广播。听到美机轰炸广岛的消息，我们兴奋极了！接着是苏联红军参战，美机再炸长崎。我们每天都要听到深夜，务求从延安的广播中证实重庆中央电台传出的消息是否可靠。

8月15日，我们也是首先从重庆电台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抑制住心里的兴奋，一方面让村干部和民兵准备庆祝；一方面拟就宣传品的文字，派人拿回县委机关大量印刷，准确随时可用。不一会儿，我们从延安电台证实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时，人们兴奋极了，所有的锣鼓响器都敲打起来，所有的爆竹、火炮都放开了，无论男女老幼都走出了家门，在口号声、欢呼声中，人们无不兴高采烈，以至热泪盈眶。周围各村也都得到通知，跟着和大李庄一样地狂欢起来。就在这时，军区、军分区、行署、专署都发来了正式的宣传品，于是，我们也把早已准备好的宣传品到处散发。第二天，各村墙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和传单，到处都有人群集合呼口号，唱抗日歌曲。有

的村庄还开始唱大戏，比逢年过节还要热闹。这样热烈的庆祝活动一直延续了好几天。

在这一片欢腾的日子里，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当时写了一首诗，记录下了这一难以描述的心情：

爆竹连天天未倾，
杞人今日尽欢声。
八年流血山河赤，
忽忆英雄泪满襟。

当延安获悉苏联对日宣战后，8月9日，毛主席号召全国军民立即对侵华日军实行战略大反攻，争取抗战的全面胜利。8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总部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民展开全面反攻，限期要日伪军投降，否则予以坚决消灭。根据这些命令，我冀鲁豫主力部队准备进攻开封。杞县的日军偷偷地撤离了杞县，但伪军却拒绝投降。我军区和分区遂决定以杞县等5个县大队和各区队数千人围攻杞县城。但杞县城池坚固，围攻了10天也未攻克。这期间，蒋介石于8月11日竟发出电令：“中共十八集团军部队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8月13日，我朱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持拒绝了他的错误命令。并于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致电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他命令被我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军停止抵抗，向我解放军投降。

正当延安和重庆争取受降权的时候，我党中央得知苏美之间已达成“红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的协议，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已电令蒋介石，要他接受中国战区的日

军投降。这样一来，我军解放平、津、京、沪以及武汉、开封等大城市已经不可能了，中央因此电令各解放区立即改变方针，努力攻取中小城镇，占领广大乡村，并破坏便于敌人进攻我解放区的那些铁路。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北方局，分别成立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同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等21人为委员，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滕代远、王宏坤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薄一波、张际春分任第一、第二副政委（张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这样，平原分局、豫东区党委就自然取消了。

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后，根据中央的方针，放弃进攻开封，转而夺取中小城镇，杞县城便成为我豫东军攻取的首要目标。在包围和进攻杞县城期间，我每天骑着一匹快马，来回奔走于指挥部和赵庄、大李庄之间，忙得个不亦乐乎。至于本地干部，他们为解放县城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其辛劳比我更甚，不过，他们的兴奋之情，当然也超过我许多。8月26日，我冀鲁豫军区十五团、三十团和二十九团互相配合作战，一举攻克杞县城，全歼守城伪军，杞县城终于解放了！

打开了杞县城，全县人民的高兴就不用提了，我们县委、县政府和所有的干部忙得几天几夜不睡觉，但谁也不感觉疲劳。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毛主席到重庆去参加和

平谈判和党内关于和平谈判的通知，似乎国内和平大有可能之势。但这时陇海路上，国民党军队不断从西面开来。很显然，我们“筑堤防水”的计划落空了。豫东在陇海路南，人们深深地感到国民党要打内战的威胁。所以尽管重庆在开谈判议和平，我心中始终忐忑不安，对和平并无厚望，而且担心杞县的工作，能否在国民党大举进攻时经受得住考验。

十、重返太行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在了解到东北的情况以后，党中央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延安派出了大批的领导干部和干部队伍到东北去。从华北和华东除派出大批干部外，更重要的是调去大量的部队或部队架子（只有干部没有战士）到东北，决心把东北拿到手。我们在谈判中，不惜把陇海路以南的8个解放区让出，我们的解放军可以缩编到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和国民党军可以保持1：7的比例。

中央要我们从华北到豫东去的干部和部队都撤回到陇海路以北的冀鲁豫区，我们感到很为难。当我们初到豫东时，特别是我们在发动群众时，老百姓怕我们走，怕变天，问我们走不走？因为新四军在这里曾几进几出，老百姓希望我们老八路不要像新四军那样，要顶住国民党。我们当时为了取信于民，曾信誓旦旦地对群众说：我们要永远和他们共患难、同生死，要与豫东这块土地共存亡。现

在，我们到豫东不过半年，而且杞县城也打开了，在群众看来，正是大好形势，而我这个县委书记，大队政委，就可能要弃他们而去，我们怎么好说话呢？从区党委到县委，接到这个撤离的指示后都没有立即向下传达，甚至对县级干部中的本地人，也暂时不让他们知道这个指示。

但本地干部很快就知道了华北的同志要走的消息。他们来问我，我不好再隐瞒，只好如实地告诉了他们，并说我本人还没有接到要我撤退的通知。同志们都热情地挽留我，都说杞县人民知道我是个好人的，一定会用生命来保护我。我听了很受感动，于是决心留下来，如果在地方上实在待不住了，可以随新四军四师行动。在北方局南下之前，组织上就曾打算派我到敌占城市或回四川去工作。看来我到北方来打日本已完成任务，以后似乎应该在南方工作了。

当我把想留下来工作的意见向组织上提出后，这时中央又转来了对李先念撤离中原后当地应如何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的指示。大意是：国民党对撤离后的解放区一定会搞阶级报复，因此一方面要在艰苦的条件，坚持游击战争，一方面也要尽量争取合法，利用合法手段在白区坚持地下工作。因此，只要还不太红的干部，尽可以和群众一道去“自首”，仍然担任着原来或新委任的“公职”。只是不允许用党员的面目去自首，如果那样自首，就是叛变，就要开除党籍。

我向杞县的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央给中原局的这个指示；并表示我愿和大家一起在杞县坚持革命斗争。同时，

我还对在杞县这一段工作做了检查和总结。我说：我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也过于简单了。从全局来看，抗战胜利了，革命形势很好。但豫东地区，特别是我们杞县很可能变得更加困难。我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我们不该把长期保存下来的秘密党员都提成了干部，这就使他们很难在本村、本地继续工作下去。我们在群众运动中打击的面也大了一些，使我们丢失了一些朋友。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国民党再来，本地人也得考虑实际情况，不敢轻易就和我们拼命。在讨论到我能否在杞县工作时，他们都说明能够，认为我来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影响很大，名声很好，不仅基本群众拥护，就是在上层人士中印象也不错。因此在偏僻地区，找个学校当教员还是可以的，不走要改个名字，他们说外来人在杞县做事（当教职员）的并不少，还说我已会说河南话，口音和本地人差不了很多，在群众掩护下是完全可以在杞县站得住脚的。我听了这些话很高兴。因为我有一定的白区工作经验，所以我这时对留下来工作的信心更增强了，何况实在不行时我还可以打游击呢，而打游击我也是有经验的。

会后我便和几个县委同志做了认真的研究，哪些人太红了，必须随部队到华北去；哪些人换一下地方到附近区县安置；哪些人可以留下来，根据情况以农会会员、民兵队员以及乡村干部的面目去登记或“自首”；我们研究得很具体，随后就分别和他们谈话，征得本人同意。一切都按中央指示办，进行得还算顺利。谁知后来在“文化大

革命”中所谓“揪叛徒”的时候，造反派说中央给中原局的指示是刘少奇搞的，刘少奇是“叛徒”，李先念也是“叛徒”，应该揪出来。造反派也曾来追查我，想把我也打成“叛徒”。我料定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所以并未如实“交待”，只推说我离开杞县很早，后面的情况一概不知，他们追问两次，毫无所获，也就算了。

正当我在杞县布置好工作，准备迎接困难局面的时候，《双十协定》公布了，我党让出陇海路以南各解放区已公之于众。同时又传来了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消灭了阎锡山军队 13 个师 35000 余人。中央并指示说，只要能打好几个大胜仗，和平还是有希望的。我这时已拿定主意，不管和平也好，打仗也好，我要在杞县坚持下去，直到革命胜利。并且自以为这次工作布置得早，有预见，而且把困难估计得很充分，因此以后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束手无策。但就在这时，区党委转来了中央局要把王一心和我调回太行山的通知，说我们两人都是原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现在的中央局是原北方局改组而成的，而组织部的干部全都走了，要我们两人立即返回，不得延误，并且不必经过冀鲁豫区党委了。

这时的陇海路已被国民党军占据，必须随军队才能经过。恰好我撤回华北的第一批部队就要出发，于是决定我们立即随军行动。因这次军队的行动是秘密的，我的行动也必须保密。但在动身的前夜，我还是到大李庄去告诉了那里的 4 个老党员，要他们按县委的决定办，杞县以后虽然会很艰苦，但最后还是会取得胜利的。同志们一个个

都满脸是泪,但又不敢放声大哭,其情其景,令我毕生难忘。直看东方发白,他们才拣最僻静的小路把我送出村。这时两个警卫员牵着马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催我赶快上马,别误了部队出发时间,我这才挥泪和村里的同志们告别。

王一心和我一行6人(有4个警卫员),随冀鲁豫的部队过了陇海路,因部队别有任务,我们就只好单独行动了。在过去,几个穿着军装的八路军在敌占区公然行走是不可能的。可现在,日寇投降了,伪军虽然投靠了蒋介石,但蒋在国共谈判中被迫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因此,伪军很心虚,惟恐八路军去打他们。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大胆地穿着军装,带着臂章,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员大摇大摆地由南而北,直奔邯郸(中央局所在地)。我们经过敌人据点时,炮楼上的日寇都已走光了,伪军没有敢向我们挑衅的,有的还故意向空中鸣枪鸣炮,仿佛是向我们致敬似的。我们很快就到了大名,这时才知道邯郸地区正在打仗,中央局不在邯郸而在峰峰煤矿区,于是我们便绕道从磁县赶赴峰峰,找到了中央局。

我们到中央局时,人们正兴高采烈地庆祝平汉线战役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被俘,因为他们除3000余名伤亡者外,都未曾顽抗,我们便给他们取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称,叫做“放下武器”而不叫投降。一次中央局正在开会时,陈赓闯进来向负责同志敬了个军礼后,

假装气呼呼地喊道：“报告首长，我想当俘虏。”大家劝他先坐下，然后才问他为什么想当“俘虏”？他回答道：“当俘虏好嘛，受优待，有棉衣穿。当解放军有什么好处呢？活该冻着。”于是大家便讨论开了。觉得先把棉衣发给俘虏而让我们的战士们挨冻不妥，决定现有的棉衣平半分，以后做了新的也平半分，最后每人一套，这样最公平合理。由此并想到“优待俘虏”一词不如“宽待俘虏”一词好。在随后向中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议，中央采纳了。

关于王一心和我的工作问题，王一心因为离开北方局较早，他又坚决要求到东北去，这也符合当时的需要，所以组织上就批准他到东北去了。虽然我也要求到东北去，但这时北方局组织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中央局组织部长宋任穷对我开玩笑说：“我一来，你们原来的人，从部长到科长全去了东北（因为刘锡五已早去了东北），这叫我怎么办呢？是不是对我不欢迎呢？”于是我只好留下。不过，留下来以后，中央局组织部也只有部长一人（宋任穷）和科长一个（李新），一共两个人而已。

接着，中央局撤回太行山，撤到武安县的伯延镇。难忘的1945年就这样从太行山南下平原开始，又从平原回到太行山告终。

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萧 克

1949年底，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我在衡阳碰到了刚从北京来的黄克诚。一见面，他对我说：

“老萧，你可能要调动工作。”

我问他：“调到哪里？”

他说：“一是到总参军训部；一是到英国去。”

在此之前，我曾听人说，新中国建立后，要往各个国家派大使，英国是世界上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派人去。

我问黄克诚：“究竟去哪儿呢？”

他说：“朱老总的意见是让你去军训部。”

从个人心愿讲，我还是希望留在国内，留在军队。作为一个老兵，毕竟对军队、对军事工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向往之情。

1950年3、4月之交，我在汉口正式接到通知，调我到总参军训部任部长。

林彪夫妇在东湖为我和先佛送行。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也很少流露感情。那天，他说了些勉励的话。我到四野近一年，一直处于大进军作战中，军事上和林彪配合得

不错，看得出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个时代，全党“一盘棋”、全军“一盘棋”的思想很明确，我接到通知后很快就动身了。大约在4月初，来到北京。

4月的北京，春意浓浓。迎春花开着，柳树泛着嫩嫩的绿色。建国伊始，万象更新，街上的行人都显得朝气蓬勃，让人觉着兴奋、开心。

调四野前，我在华北军区工作，华北军区司令部此时驻在庆王府。这是一座很大的院落，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司令部的人多数是我熟悉的战友，我们相见，非常高兴，当得知我调任军训部长时，主要负责人表示，有困难尽管找他们，一定帮助。

我在华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总参谋部报到。总参谋长徐向前当时正在养病，由聂荣臻代理总长。聂总是我的老领导，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聂总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来得正好。军队建设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百业待举，担子很重啊。”

我说：“我想早点到军训部上班。”

聂总笑起来，说：“你以为军训部在哪里啊？就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手上。”

这时我才知道，任命我当部长的那个军训部，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办公地方，没有工作人员，一切都没有。

担子确实很重。

不久，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长和我，一起研究军训部的工作。周副主席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训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个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

讲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兴奋，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来。说的意思就是，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现在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人民解放军成为国防军，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能沿袭过去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和游击习气。军队要向正规化、现代化走，要由低级建军阶段走向高级建军阶段。

周副主席、朱老总和聂总都反复强调一个思想，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我记得朱老总打着手势说：“不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成。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

大家一起研究确定了军训部成立后的几项主要工作：一是制定全军军事训练计划；二是组织编写条令条例；三是筹备组建陆军大学，而当务之急是尽快地把军训部组建起来。

周副主席对我说：“具体方案由你提出，交荣臻同志审定。”

我从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一直在沙场征战，20多

年来，枪林弹雨，从南方打到北方，又从北方打到南方。如今，南下征尘未洗，又受领了新的使命。作为一个参加过人民军队初创斗争的老兵，我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这样神圣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说实话，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我缺乏现代化知识，担心不能胜任工作。

当我正想说出自己的顾虑时，见朱老总和聂总正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还在解放战争进行当中，我同朱老总、聂荣臻以及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接触时，就听他们谈起军队的训练问题。他们这些老军人，深知训练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那时就在为新阶段建军的训练方针和任务筹划着。有他们支持、帮助和指导，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在战争年代，我虽然主要是领兵打仗，但也有过主持军事训练的经验。红军时期，我三次带农民军，从立正、稍息、端枪、瞄准开始，硬是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训练成了能攻善守的红军战士。下井冈山后，我担任过红军教导队的队长；湘鄂川黔时期，兼任红军学校的校长；全国解放战争中，兼任过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对于军队训练工作不算太生疏。特别是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读兵书，注意古今治军经验，对于训练军队有些想法，想到这些，我坚定了信心。

组建军训部，一切要白手起家。第一件事是找“落脚点”。好在当时房子并不紧张，军队进城时，占了一些旧兵营和官僚的房产。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与我看了几个

地方,最后选中东四七条的一座院落。院子不大,房子也不多,但环境僻静,适宜办公。人民军队胜利后第一个军训部便设在了这里。

有了办公地点,紧接着就是选调干部。选人比选房子要复杂得多。我们定了选调干部的三条标准:一是政治强;二是有作战经验;三是有文化。当时从华北军政大学选调了一部分懂训练的人员,还从各方面选调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李钟奇、刘光弟、吴伟、叶楚平、陶汉章、蔡铁根、蹇先佛等,他们勤奋实干,成为军训部初创时期的骨干。

干部调齐后,根据工作任务,建立了部办公室和训练局、军校局和出版局等。几个局大都是新建的,只有出版局是原有的,它是由在延安时期建立的军委四局改称的。局长是童陆生,是一位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和中外军事典籍都有涉猎的人,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组织人陆续翻译一些苏军的教材和收集中外军事资料。军训部成立后,更系统地翻译了苏军的条例、条令。此外,他还组织人员广泛收集各种军事图书资料,包括国民党的操典、条令,还有日本、德国的操典等。后来军训部编写条令,大家都到他那里查阅资料。

经过近5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终于搭起来了,各项工作也准备就绪。6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我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9月,我们召开了一个大会,宣告军训部正式成立,公布了全体干部的任职命令。

这里要特别提到,当时军训部的编制中,还有个高级

研究室,也叫参事室。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的,主要是安置国民党起义将领和解放的高级军官,如周亚卫、高树勋、廖安邦、翟建新、马鹏飞等,都在这个研究室,这也是当时军队中唯一具有统战性质的机构。军训部初建阶段,这个机构曾起过一些咨询的作用。当时的主任周亚卫,曾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我请他写一份介绍日本陆军情况的材料,他笔头很快,几天就搞出来了,其中关于“野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预备役部队)部分,我感到很有参考价值。他们虽然不参与决策,但经常介绍中外军队的一些情况,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也打开了思路。

军训部成立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抓编写条令、制定全军训练计划并组织实施,以及筹建陆军大学。这三项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任务十分艰巨,调来的同志齐心协力,都想把工作搞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一要求自然地成了建国后军队建设的纲领。当时提出四个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过去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战,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统一的,但从指挥上、制度上、编制上、纪律上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的传统习惯制定的。当时五大军区都颁布了自己的条令,这在战争年代十分必要。但在建国以后不久,1951年军委制定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建军方

针,就是适应这种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五统四性”,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并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可以说,这些就是当时我们编写条令以及组织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

编写共同条令,是实现全军统一的首要措施。记得1950年的夏天,我们在东单大华电影院(当时军训部没有礼堂,开大会只能租用地方电影院)开大会,我作了动员。会后组成了精干的班子,专门负责编写条令。开始就是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我们编写条令,除了参考各地的材料以外,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条令。中国军队只有国民党时期有较为完备的条令,我们当然不能以他们的条令为蓝本,主要是参考苏军的条令。苏军的三大条令这时都已经翻译出来,又结合中国历史上一些好的军队管理办法,加上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拟出了初稿。夏天开动员会,冬天便送审了。

周恩来总理当时指定由刘伯承审定三部条令,总理对我说:“只要刘伯承点了头,就算通过了。”刘伯承此时还在西南,我们编写出一部分,就派专人送去给他审一部分。12月22日,刘伯承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内务条令已研究完了,讨论中所提的问题均由张戈同志面告,总的原则应该是:1.以苏军内务条令为蓝本;2.以我军优良传统及其好的历史习惯为基础;3.一般的应简明

易行；4. 适合现在，照顾将来，特别加强陆、海、空军的建设及备战的观点。”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给我来信，写道：“对纪律条令之草拟，我们意见：1. 应以苏军纪律条令为蓝本并照顾我军优良习惯与作风；2. 条令内应注重教育，多讲理少惩罚。”

根据刘伯承同志的指示，我们又反复讨论并向五大军区军训处长和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征求意见，草本先送一九六师去试验，他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摆排。精心修改后，又送到刘伯承同志那里审查。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刘伯承同志。此时，他已调军事学院当院长了，一见面他便对我说：“你不要急着走，等两天我就全部看完了。”

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修改稿送给他也就几天时间，厚厚的一摞，他竟快要看完了。开学典礼后，我到扬州走了一趟，回来后，刘伯承同志捧着三部条令的稿本对我说：“好了，可以拿走了。”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刘伯承审过的条令，送给总理和聂荣臻，他们都表示伯承同志审过了就可以定下来。这时，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我又把几个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我对他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来，给你演示一下吧？”

他说：“好！”

我就从华北军区调了一个连，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项地演练，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了。

彭总看了很高兴,说:“可以,就这样!”

2月1日,总参谋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毛主席在颁发三大条令的命令中指出:“全国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一致要求。”条令颁布的那天,我真是高兴啊!人民军队几十年风风雨雨,艰难奋战,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军队建设的准绳。后来,这三部条令草案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颁发执行,但基本内容没有变。

三大条令颁发后,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贯彻条令也是正规化的教育养成,从军人一举一动,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入手,培养军人和部队严格正规的良好作风。从贯彻三大条令开始,全军各部队逐渐走上统一的轨道。

在编写条令的同时,第二项工作是部队训练。军训部成立后,一直把部队训练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我曾指定陶汉章负责组织编制一个全军的训练大纲。在此之前,全军没有统一的训练大纲,各军区各搞各的,为了便于将来统一指挥和统一管理,军委指令制定全军的训练大纲。1949年和1950年部队大部分在执行消灭蒋介石残部的战略追击任务;1951年和1952年又赴朝参战,作战任务仍很紧张,没办法全面实施正规化训练。我们从实际出发,前面仗怎么打,后面兵就怎么练。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战争规模大了,武器装备也更加先进了,特别是炮、装、工、通、化、铁道等兵种,还有空军

都参战，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成为新的作战方式。这就对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制定训练计划和组织实施训练时，就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

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训练教育大政方针的。我在会上讲了两次话，对全军的训练方针进行阐述。这个讲话事先搞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又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任务、特点进行研究，写成稿子报到军委审定后才讲的。

记得会议开始前，周总理找我去，要审查这个讲话。那天，我到了中南海总理的办公室，只见那里已等了许多人，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总政的……，大家都有事情要向总理请示，就排队等候。轮到我时，已是夜里12点了。我先把讲话稿念了一遍，总理很认真地听着。念完，他又把稿子拿过去，一段一段地看，一句一句地推敲，真是字斟句酌啊！我们对训练方针的制定，是很认真的。除事先与北京有关方面商量外，还多次请示刘伯承，概括如下：“在解放军现有素质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作战，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我对总理说：“这是比较完整的表述，有些复杂，不大好记，我概括为两句简单的话，‘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

这两句话,前一句着重于技术方面的学习。后一句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学会诸兵种协同作战。

总理听后,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点点头说:“行,就这两句话吧。”

当我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才觉得有些倦意,而周总理从白天到黑夜已经整整干了 20 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都要总理亲自处理,他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也常常加班加点。虽然紧张劳累,但心情却异常兴奋,也十分舒畅。几十年艰苦奋战,终于打下了江山,大家都抱着要好好干一番事业,造福于国家和民族的心愿,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累?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之后,我又根据在会上的总结讲话,正式写了“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建设问题与部队训练会议向军委的汇报”。总理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1951年4月19日,他在报告上批示:“已改好,照发。”当天下午,军委正式批复:“军训部萧克部长:送来1950年12月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及全国部队训练会议的报告阅悉。我们同意这一报告所提的各项原则,望由军训部将此报告印发给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各师、各特种兵部队及各军事学校研讨施行。会议中所决定的三类文件:(一)军事学校教育类;(二)部队训练类;(三)军事出版类,亦望由军训部印发全国部队及军事学校试行。”

从此我军部队训练和学校教育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依据。

1953年6月以前，部队训练主要还是以学技术、学文化为主。当时苏联援助了我们许多武器装备，我记得大概有××个航空兵师、××个步兵师的装备，还有××艘舰艇等等。我们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一下子提高了，但是，部队广大指战员多为文化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农民，掌握这些武器装备就发生了困难。先进的装备不会用，就等于一堆废铁。所以，学技术、学文化就成了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1950年我们在全军掀起以学技术为主的技术训练热潮；1951年总政治部又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提出向文化大进军的口号。

当时全军广大指战员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了，在政治上翻了身的人们，更希望在文化上翻身，以便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军队的主人翁。正是这种精神动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提高很快，许多指战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难度较大的技术。记得有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期，苏联曾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个坦克师。过去我们没有坦克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经验，苏军在提供装备的同时，还派人来帮助我们培训人员。由于指战员刻苦认真，仅用半年时间就把装甲部队的战术技术基本掌握了。苏军教官很惊讶，也很满意，直伸大拇指。他提前完成工作。有许多教官比预计的时间提前撤回国。

当时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那时世界上真心真意

帮助我们的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50年代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苏联给了我们物资和军事装备援助,我们只能学苏联。当然,任何一件事强调过了,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有的同志主张“不走样地学”,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照搬苏联,这都是不足取的。那时,各个单位都请苏联顾问,部队的特种兵学校和师以上单位都有顾问,有些顾问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意见也难以实行。但总的来说,那时对于学苏联的问题,我们是把握得好的,苏联顾问大部分起了好作用。

提起苏联顾问,我十分怀念曾一起共过事的格拉兹诺夫。他是我们军训部的首席顾问,我刚到北京时,他就来了,住在一个旅馆里。那年他已经57岁了,是苏军的一个中将军长。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见他在伏案工作。旅馆的条件不好,连个写字台也没有,他就趴在茶几上写教材。他为人坦诚、忠厚,我们常在一起交谈,我曾问他:“您在哪里读的书?”他说,他是雇农出身,只读过小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十六七岁,沙皇征兵把他征去了。在寒冷的战壕里,他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声,当时列宁号召所有的沙皇士兵扔掉枪回家去,他响应了。回家后又出来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文化和军事知识都是在红军中学的。

听了他的话,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小雇农,当红军后,派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毕业当了高级将领,还来中国当军训部首席顾问,真值得人们学习。工作中我们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

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当时，我们与苏联顾问彼此都很真诚，一方真诚地学，一方真诚地帮。在南京军事学院时，陈毅和刘伯承也曾对我说起苏联顾问的事，说军事学院的教材都是他们编的。陈毅与那位 60 多岁的首席顾问谈话，认为顾问有知识，是认真地顾和问。

1952 年 12 月，第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确定了从 1953 年 6 月开始全军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训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计划。

在这期间，我们着重抓了高级干部集训和机关演习。记得 1951 年在河南明港由军训部主持搞了一次加强步兵团演习，这是军训部第一次抓的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规模虽然不算大，但为即将展开的正规化训练做了示范。1952 年在南口又搞了一次战术演习，也为 1953 年的训练创造了条件。类似的演习以后就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像 1954 年 11 月由军事学院在山东半岛主持的抗登陆演习，1955 年 11 月在辽东半岛由叶剑英主持的抗登陆演习，都是全军性的。和平时期练兵，就是要搞好演习，因为这种近乎实战的演习，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和检验。我们开展正规化训练，必须下大力抓演习，在这点上，军训部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为各部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53 年底，我们在年终总结时，对这时期的工作做了这样的评论：“1953 年下半年我军按正规统一计划进

行部队训练,这是我军走向正规化一个重大的成就和正确的措施。”我认为,这个评语反映了我们这段工作的实际情况。

组建军事院校是我在军训部期间做的第三件大事。最初是筹建陆军大学(1950年11月军委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全国解放前一年,军委在华北曾建立了一所军政大学,叶剑英任校长,他说,要注意收罗有知识的旧军人。朱德总司令来校巡视,曾说,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办高等军事学府。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为此做了些具体工作。

从人民军队创建那天起,我们就希望有一所自己的高等军事学校。因为我们这些老军人深知治校对于治军的重要性。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过几所很重要的军事院校,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还有云南讲武堂等,中国一大批有才华、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出自这些军校,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一批来自这些军校,像叶挺毕业于保定军校,徐向前、林彪是黄埔生,朱德、叶剑英来自云南讲武堂,彭德怀、黄公略来自湖南讲武堂等。

在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条件办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虽然各时期、各地区都创办了一些红军学校、抗大、军大等,但并不正规,学习内容也多以政治为主,学军事学得比较简单,不系统。新中国一建立,中央军委就在筹划创办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了。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对这事最热心、最认真。

记得我到军训部不久,成立了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

指定我为筹委会主任。有一天，朱老总听说我们要为陆大
选校址，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看。”他和我坐车先到府
佑街附近原北洋军阀陆军大学的旧址，一看，过去的建筑
不大适合于现代教学，同时，房子太破，一下子修不起来，
不行；又到五棵松一带，还不行；后来又跑到现在国防大
学所在地红山口，一连跑了四五个小时，他老人家还兴致
勃勃，边走边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看地形的笑话。

开始，朱老总主张军事学院办在北京，但一直没选到
合适的地方。后来我到南京去，发现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
址比较好，就提出军事学院的校址设在南京。这时，军委
已决定由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

提起这事还有段故事。当时，刘伯承在西南军区当司
令员，谁都知道，这是个有职有权的岗位，但他对军事教
育事业却情有独钟。一次，他来北京，见到总理和朱老总，
诚恳地说：“我年纪大了，想教教书。”朱老总早就想请刘
伯承来当军事学院院长，但还没有提，刘一说，他非常高
兴，连说：“好，好，你来当校长。”早在二三十年代刘伯承
就留学于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地
学习和研究了西方的军事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
我们党内文武兼备的大军事家。现在请纓办军事学院，完
全是为了我们军队的建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精
神确实令人钦佩。

我和刘伯承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当我提出在南
京办军事学院时，他欣然地说：“这事你定就行了。”那时
我的思想上很少有顾虑，有什么想法直接就向总理、朱老

总、刘、叶、聂几个老师提出，他们很快就拍板决定。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听说要在南京办军事学院也很热心，对刘伯承说：“你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我当后勤部长，后勤保障的事我包了。”后来确实如此。

校址选定后，接着就是选教员。除了从部队调一批有作战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军事指挥员外，主要是从华北军政大学调教员。我们早就准备了一批教员在那里。前面说了，1948年朱老总就对叶剑英说过，要准备将来办军事院校的教员。我们那时打胜仗多，俘虏也多，就派人到各地去物色解放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找了200多人。

在利用旧军人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怎么能让打败仗的人来教打胜仗的人呢？也有人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向旧军人学习呢？

我认为军事理论、军事原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党派，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比如争取主动的原则，集中兵力的原则，重点防御的原则等等，任何一支军队打仗都要坚持这些原则。正因为这样，一部《孙子兵法》，古代人学，现代人也学；中国人学，外国人也学，超越了时代、阶级和种族的界限。

1928年湘南起义时，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同许克祥的部队在砵石打了一仗。当时，革命军用的是段祺瑞政府的《步兵操典》（北伐军即用这个操典），而许克祥用的也是这个操典，结果，我们以一个团打垮了他一个师。那时我就想，一本操典，北洋军阀用、北伐军用、国民党用、共产党也用，战争结果却不一样，说明军事原则是相同的，

关键是看什么阶级、什么人领导和运用。

1930年8月打长沙时，我那个部队缴获了五、六挺机关枪，组织起一个机关枪连，但没有人会使用机枪，我就让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机枪排长来当连长。这位解放过来的排长，经我们一宣传，就报名参加了红军。他技术很好，经他训练，部队掌握了机枪的射击技术，很快投入战斗，起了作用。当时我还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只是感觉战争需要知识和技术，既然这位排长有，为什么不能用呢？当然，是在改造教育的基础上使用。1935年，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战场俘虏了国民党中将师长张振汉，我在同他多次谈话中，看到他战争经验多，有军事知识，请他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讲军事课，那时的思想就比较自觉了。

有时候我也去听课，一为让张放心讲课，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我是当时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听课时也和一般学员一样，以“师礼”对他。另为使听课的学员，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在这位俘虏来的老师面前，不以胜利者自居，而要虚心听课，从他那里学到知识。我还虚心地听课，我的部下就更虚心了，起点学习带头作用。当然，我在听课之前，也考虑过听他的课，可以看出老师的水平和态度。

筹建军事学院时，这个思想更明确。当时周总理、朱老总以及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等都是这个思想。我听朱老总多次这样讲：“过去我们没有条件学习，而国民党则不同，他们有条件，很多人经过正规学习，有理论、有知

识、懂技术，我们要利用他们来教学。”刘伯承也讲过：“旧军人经过改造，就可以来教我们，因为军事原则，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大体是相同的、一致的。”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了。学员是由总干部部负责招收的，由军委批准。我军一些著名的将领像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陈再道、杨勇等，当时都是第一期的学员。军事学院的学习正规、严格，学员不论职务多高，一律按统一要求，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按规定的教材上课，参加考试。有一些老干部适应不了这种严格的学习生活，他们从游击战争的环境过来，习惯于带兵打仗，坐不住，特别是到考试便叫苦。他们向刘伯承院长反映，说这样学下去受不了，刘伯承院长很幽默地说：“天底下只有饿死的，没有学习学死的。”他们都照刘伯承的指导，继续努力学习，也学好了。

从思想上说，这些同志倒不真是怕苦，长征那么苦都走过来了，学习上的这点苦怕什么？主要原因还是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骄傲情绪作怪，认为过去没有学习，也打了胜仗嘛！这种想法在当时比较普遍，也是影响正规化建设的主要思想障碍。

我总认为，军官必须要有知识，高级军官，知识要更高些。古今中外那些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是有知识的，孙子如没有知识如何写得出千古不朽的兵书？蔡松坡（蔡锷）如没有知识，又如何写得出脍炙人口的曾胡治兵语录？凭经验能不能打胜仗呢？能，但不会总能。经验毕竟

是有限的,不自觉的,比如,不懂得电子技术,又如何能指挥现代战争?所以,我始终认为,军队干部必须学习,要成为有知识的人。当时,我们军训部配合军事学院,针对有的干部不爱学习的思想障碍,做了一些工作,慢慢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习空气。

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学习就当不了干部。这也使全党全军学习蔚然成风。

在筹建军事学院的同时,军训部还抓了全军其他各级各类院校的组织工作。建国初期,我曾对全军院校排队,发现陆、海、空军和防空军都有院校,陆军中的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也有院校,只有化学兵没有院校。我认为化学兵是个重要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不能缺少,而当时又特别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就向军委建议组建化学兵学校。

组建一个学校首先要选校长,我马上想到了张乃庚。张是北京某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抗战初期到晋察冀参军,当过教导队队长,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我向聂荣臻代总长建议,聂也知道这位同志,我一说他就同意了,我便给总理写报告。很快,报告转到主席那里。1950年11月29日,毛主席批准了我的报告,又过了一个多月,化学兵学校在四川江津成立,以后迁到北京的南口。

随着部队正规化训练的全面展开,军事院校也不断发展,各大区、各军兵种还要创办各类院校。为了统一规

划，我组织军训部的同志分赴各大区，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认真调查，对院校的数量和分布进行科学论证。当时我们摸清了三个情况，一是全军有多少个排长；二是有多少干部要提升；三是有多少干部要转业或退伍。这样也就摸清了全军共需要各级各类院校的总数和各类院校的规模、招生数额等。我们把全军院校分为“三级制”，即培养初级指挥员的基层军事学校；培养中级指挥员的军兵种高级军事学校和培养军以上指挥员的全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后来我们又提出，基层军校培养的排长、连长、航空员等要达到大学水平，上可以一直提升到国防部长；如果退伍回到地方，其文化水平也可以当教员、当经理、当厂长等建国干部。

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是从当时的国情和部队干部队伍长远建设出发的，我认为把院校招生同干部的进退结合起来，把干部任命和复转结合起来，军队院校培养出来的军官，既能治军，又能治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用人才”，就能使干部队伍像活水一样流动，保持生机。

为了建设好全军的军事院校，我们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院校建设调整方案。

我把这个方案拿给刘伯承和叶剑英看了，他们很满意。刘还说：“你去向主席汇报一下！”

我就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说：“我要向主席汇报工作，能不能安排一下。”

叶子龙说：“等我通知吧。”很快，叶子龙打电话来，说主席要我去汇报。

我拿了早就准备好的五张大表，到主席那里，我说：“主席，我要在你的墙上挂几张图。”主席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样可以一目了然。”主席说：“那好，你就挂吧。”

我把图挂在毛主席面前的墙上。这五张图把全军军事院校的布局、纵向和横向的关系以及教学内容、训练计划等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一边看，我一边解释，他随时提问，我指着图一一回答。很快，他说：“你要汇报的问题我已经清楚了。很好，很好！”那天，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临走时还对我说：“你以后再再来嘛！”

1952年6月，毛主席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全国军事学校进行统一调整的方案，将全国五所高级步兵学校缩编为一所总高级步校和两所高级步校，将17所步兵学校缩编为9所，并决定在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培养陆海空军高级技术人员。经过调整后，全军共有各级各类院校91所，各院校的训练对象、学制、训练计划、教学内容等，都趋于正规化。

1952年11月，军校部成立。从此，全军院校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领导。

从1950年6月到1954年11月，我担任了4年多的军训部长，主持全军的训练工作。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无论从我们党、我们军队还是从我个人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是一个真正齐心协力搞建设，全心全意干事业的时期，大家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到处充满了朝气。

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李 锐

两次郑州会议之间，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两个会是连起来开的。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开八届六中全会。两个会我都参加了。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1958年11月，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我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去苏联。等到回国后赶到武昌开会时，已经迟到了两天，23日才开始参加会议。记得晚到的还有田家英、张平化、张春桥等。毛泽东在第一天的讲话，是会上听传达得知的。

参加武昌会议的除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书记处的部分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常委除周恩来、朱德、林彪外，都参加了。会议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工农业生产指标问题，目的是继续第一次郑州会议

的精神进行降温。21日和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1958年秋，“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乱子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暴露。武昌会议前，毛泽东批阅过的反映农村问题的几件材料，就反映了“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混乱情况。如11月10日，批转《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11月14日，批发了新华社《内部参考》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症也有发生。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所未有的，已波及到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食堂办得不好，社员得不到休息，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这些文字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广泛得多。毛泽东认为，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急急忙忙往前闯，有必要使头脑清醒起来。

21日，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毛泽东就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23日，毛泽东又说：“我说把空气压缩一下，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变，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他强调，路线还是那个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三个结合，还加上土洋结合。在毛泽东看来，“空气”只是过于膨胀了一些，压缩一下就好了，不是减少“空气”，更不能改换“空气”，总路线还是要坚持的，三面红旗必须高举。

毛泽东在讲话中承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大概是“冒失鬼”。开会的前几天，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提出苏联未来十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毛泽东要大家看看这个提纲：苏联已经四十一年了，还准备搞十二年（按应为十五年）。看它的思想是想过渡，但并没有讲过渡。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经有了5500万吨钢，1亿吨以上石油，他还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倒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干部，就是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照顾得不够。这时，毛泽东批评北戴河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到共产主义，是个缺点。他说，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现在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

但是，会上有不少人的意见仍然是快些过渡。如刘少奇说：达到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由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

为：每人到 150—200 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

对这种意见，毛泽东似不以为然。他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 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我看不可能。即令十年，到 1968 年我们已准备好了，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两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这样的意思毛在两次讲话里都说过。在第一次讲话中，他就说：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面，现在他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过渡了，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就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

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有所退却。北戴河会议提出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即可过渡，这时的估计比北戴河会议的说法延长了，而且说这个时间“难以设想”。这就遏制了“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势头。当

然要看到，毛泽东仍然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难以设想”，比如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三十年，而没有认识到从现在起到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这是按当年应当具有的理解说）。还要指出，毛泽东一方面承认苏联的基础比中国强，另一方面似乎又以为中国有可能先进入共产主义，从国际影响考虑，要“逼”苏联先过渡，思想上还是有急于求成的情绪。

同第一次郑州会议一样，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的主张。他说，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愈少愈好，时间愈短愈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了，这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期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至少也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坏处呢？他还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彻底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要破，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有用，这就要保护它，使它为我们服务。毛泽东在这里所讲要破的那一部“法权”，其实是干部作风和干部制度问题，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并无关系。不过破除这一部分东西，应该说是对的。他提出要保护工资制，是对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取消薪水制主张的改正。至于提出“商品时期搞长一点”，则否定了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价格的“共产风”主张。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降低过高的指标。这也是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北戴河会议曾确定 1959 年钢产量 2700—3000 万吨，这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要不要这么多钢、搞不搞得出来这么多钢的问题。他说：钢 3000 万吨，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邓小平说：“明年任务，各省自议。3000 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定 3000 万吨，是应该考虑的。”薄一波也认为值得考虑。薄是经委主任，对工业生产的情况比较熟，他说：今年 1700 万吨铁，是 6000 万人搞出 1000 万吨来，实际有 700 万吨是估出来的，但能炼钢的高估也就是 200 多万吨。说钢 1100 多万吨，数量上可能有超过，分析内容，情况大变，好钢不会超过 900 万吨，可能是 850 万吨好钢。如到 3000 万吨钢，就要翻 2.5 倍。薄的估计接近事实，1958 年经过核实的好钢只有 800 万吨。毛泽东于是说：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只翻一番，今年 1070 万吨，明年 2140 万吨。他还谈到，北戴河会议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搞了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了相当的经验。总要有实际可能才好。

毛泽东承认：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真正掌握客观规律，要熟悉地掌握与运用它，整个说来，还是个问题。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关于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 40 条》，毛泽东不主张作为武昌会议的重点。他说：40 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但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提出来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再议下去，没有把握，也议不出名堂。需要不需要 4 亿吨钢，

能不能搞到？王任重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的问题，需要不需要，没有回答。毛泽东点王任重的名是有来由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40条时，王提出10年内工业主要产品按人口产量赶上或超过英美，钢在1967年达到4亿吨产量，机床达到1000万台。对毛泽东的发问，王无言以答。倒是最早提议搞40条的曾希圣说：全国4亿吨，安徽就要（生产）3000万吨。毛泽东追问说是不是可能？是不是需要？曾也承认：连明年120万吨钢也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接着说，40条如果传出去，很不好，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

毛泽东提议，把1959年产钢3000万吨降为2200万吨。但他心里仍无把握，当晚半夜里，又找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等人谈指标。他认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22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薄一波建议定为1800万吨，对外公布1600万吨。第二天晚上11点钟，毛泽东找各大区负责人谈钢指标，对1800万吨也表示怀疑。23日的大会讲话，毛泽东说：昨天和大区同志吹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要能说服，才能打通。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远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并为此而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将来又搞“马鞍形”。过去是人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是我反别人的冒进。1800万吨，我觉得现在还是根据不足。如果没有充分根据，还要减到1500万吨。

从钢铁生产，毛泽东谈到了有计划、按比例的问题。他说：钢铁上去，各方面都要上去。64种稀有金属，都要

有一个比例。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然后去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他对轻重工业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铁拐李”。现在我们摸了一点比例，是搞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我们搞三个并举，就是使腿长得差不多，使农业的腿长一些。

除了提出压缩钢的指标外，毛泽东说，还有什么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会前，谭震林、廖鲁言向中央提交了有关农业生产安排的报告，提出1958年冬1959年春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要搞1900亿土石方。这个工程量相当于1957年冬1958年春的近4倍。毛泽东认为，1900亿土石方多了，要减轻任务。他说，你要人家睡足觉、吃饱饭。“睡足觉、吃饱饭”，是要求各级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批发了云南省委的一个报告。1958年春夏间，云南发生了因病死人的严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对持续紧张苦战中的群众生活关心不够，造成发病多，死亡率高。毛泽东在批语中批评一些干部：“不善于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同时指出，这“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提出两条解决方法：“（一）任务不要压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高指标的产生，同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有直接关系。毛

泽东在讲话里特别批评了作假之风。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要出名，就管他作假不作假。没有那么多东西，就要作假。我建议同县委书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嘛，不要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相信。从中央、省委、地委到县委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了。

作假的原因不只是在于上面相信，更主要的是上面压任务、上面好浮夸导致的。其实毛泽东本人就有直接责任。为了完成他提出的钢翻一番的指标，他在北戴河宣布六条纪律，泰山压顶，谁敢少一吨。

北戴河会议之后，我忙于自己的业务，到甘肃和青海出差，参加刘家峡水电站的开工典礼，查看黄河最上游的龙羊峡坝址，并到青海北部看当时的“引大(通河)工程”。随后，11月又率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截流工程。由于北戴河会议前我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反映了华东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电力难以相应保证计划的完成等情况，可能同当时的狂热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所以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武昌会议时情况起了变化，即狂热已过，开始降温。有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毛泽东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方我是非常熟悉的，不仅珞珈山与东湖分不开，而1952年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

式的平房，就在东湖之滨。毛泽东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解释。谈话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谈到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得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反而会影响到用户，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我最后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接触，联想到水上流失。这个问题未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但当时毛泽东恐怕主要还是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有7500亿斤。对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来经核实，1958年只有4000亿斤）。

我的《龙胆紫集》中，“戊己诗”九首组诗中，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召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泽东确实比较清醒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布7500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又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他在讲话中谈到消灭阶级时说：消灭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上的，容易消灭，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但是作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由此他又说：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消灭。如果宣布消灭，地主都是农民了，资本家都是工人了，有利无利？记得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概念时，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是隐含在他作出这个判断的过程之中的，这两个标准还没有显性化，更没有归纳成为明确的概念。武昌会议则沿着成都会议的逻辑轨迹，将隐含在“两个剥削阶级”概念中的政治、思想标准显性化了，并且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明确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错误，我在《大“大跃进”亲历记》上卷作过分析。一是没有正确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把已经消灭和正在消亡的地主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依然作为存在的实体。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学说，把非经济标准（政治、思想

标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偏离。

在这里,我想说这么一点意思,就是经济上的“左”的错误,实际上也推动政治上“左”的错误发展。反过来,当然也一样。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到武昌会议又有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波助澜,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人以“大跃进”是搞经济为理由,否认这中间有政治上“左”的错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从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武昌会议,直到后来的庐山会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与认识,总是伴随着经济上的冒进错误同步发展,每一步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系统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一个环节构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链条,即经过一步步发展,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是理论推导,而是历史事实。不管承认不承认,它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存在。

武昌会议期间,对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的决议草案和1959年经济计划都进行了讨论,然后将两个文件提交给八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审议。

八届六中全会的开始和小组讨论

武昌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1月28日,接着举行八届六中全会。没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

补委员纷纷赶到武昌。周总理和朱老总也来了。

会前,11月27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六中全会拟于十二月二日开会,由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到十二月一日止,在这四天内,请同志们阅读文件。”全会按大区分组,一共七个组。华北组组长林铁,副组长陶鲁笏、张苏;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曾希圣、江渭清、廖鲁言;华中组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吴芝圃、安子文;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刘建勋、叶季壮;西南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宋任穷、谢富治;西北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王恩茂、王震;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黄火青、李葆华。

28日晚七点钟,邓小平主持全会的预备会议,讲了会议的日程安排和全会的任务。从29日开始,每个小组阅读了4天文件并分组讨论。这个期间,1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谈过一次话,可以看作是在全会正式开始前的吹风。第二天,各小组作了传达。

——今年夏、秋两季,我们国家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郑州会议感到紧张,现在搞出些章程来,心情就比较舒坦了。21号开会,10天了,也比较紧张。斯大林的书过去看过,不感兴趣,现在感兴趣了。人民公社的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工业问题也有所准备,但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中央没跟地方结合,条条没跟块块结合。块块第一书记,过去你们不是干劲冲天吗?华东现在就走下坡路嘛!过去没有经验嘛!

——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工业与农业不同,

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项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牵制也有,但比较少一点。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要接受1956年的教训。我现在代替了总理和陈云,你们在北戴河反我的冒进,现在不一样。那时反冒进就是不对。

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3000万吨钢,那时谁听了3000万吨钢不喜欢?现在看来,当中至少有1000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并不简单。小平插话:钢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国家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通按第二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方案)。

1959年农业生产的指标,究竟提多少?今年粮食是7500亿斤,明年增产3000亿斤,达到10500亿斤,每人平均1500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2000斤。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的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6700万担,明年1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稳当。现在还未收完,还要看看,这次会议不公布最后数字。明年人代会上再公布。

——少种多收。粮食原来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就翻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山西石楼县的经验很好。要深耕细作。这是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创造出来的经验;试验田、高产,是人类的一大解放,是人类的自然界认识的大解放。三三制,这个提法,舍不得丢掉。

我已经打了许多保险系数。这一条还是写进去好，时间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关于粮食产量，毛泽东当时还是极其乐观的。会上印发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中说了这样的话：“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但可以等候一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听了思想很混乱，要作酝酿，要使人懂得，要把问题讲清楚。

——军事化、民兵，展开一下，讲的理直气壮。

生活集体化，以家庭问题为中心，展开回答。杜勒斯攻击我们，一有机会就整我们的人民公社，说我们一是奴隶劳动，一是破坏了家庭，这要回答。其实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消灭了家庭，完全是金钱关系……我们现在是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工资差额问题，要开展一下。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些。因为农民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工资过于悬殊，他们不赞成，但也不能没有差别。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谈。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地发生了一些强迫与作假。造假比强迫的害处轻一些。比如，枣阳县，文盲一个未消灭，县委一布置，限三天消灭，结果县委登报说文盲消灭了，伟大的胜利。但为什么造假比强迫好些？无非是文盲未消灭，四害、蚊子未消灭；强迫就要打人、捆人、劳改。要专门将这个问题谈一下。

分组讨论从11月29日开始，一直进行到12月8

目。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二是关于1959年经济计划安排问题。这里分为几个问题对讨论内容作些介绍。

一、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

在公社化运动中，急于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股风。刘少奇在华中组第一次讨论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到底怎样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怎样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时就是开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日，这中间没有一道鸿沟。有人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按人口平均，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当或超过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农民每年收入达到150—200元。另一个是收入稳定，在此条件下由国家包下来，给农民发工资，就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

东北组有人认为，讲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应该把精神条件强调一下，甚至在决议中专门写一段。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现在一方面有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但也有人把物质条件看得很轻，因此还是以文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并提为好。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如何转法，华南组有人说，必须根据条件成熟的程度分批地转，但是，不能认为，在一个县、一个地区转了，就算建成社会主义。所谓建成社会主义，应指整个国家来讲。现在有的县的标语写着：“1959

年建成社会主义,196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对的。

二、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

讨论中普遍认为,决议草案强调在现阶段发展商品生产,是针对当前一些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出发的,这些是很正确的。有人提出,草案中“继续保留商品的外壳”这句话,用“外壳”仍然是回避商品生产的提法,实际上,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商品存在,所以不要“外壳”两字。

西北组有人提出,草案中“商品经济仍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给人一个很长的印象,可否改为一定时间。多数人认为原来的提法较好,可以不改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如稀有产品,不过这种商品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华南组也有人认为,商品是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而起不同作用,到共产主义社会,商品也还会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起它的作用的,但不一定叫它“商品”。

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些与现实直接相关的问题。华南组提出,现在国家调拨的产品(主要指生产资料)算不算商品?有的人认为是商品,而且是实在的商品,不是“商品外壳”,如鞍钢的产品装备轻工业部的工厂,轻工业部生出的商品,在计算成本时包括了鞍钢产品的价值。有人则认为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范围内进行产品调拨,不能算是商品,只有从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调拨产品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公社,才能算是商品。华东组还有人认为,在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后,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

社之间仍然实行劳动价值相等的新产品交换,商品就不止是“外壳”作用了。

三、关于人民公社问题。

对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比较普遍的意见是赞成“缓办”。很多人都提到,城市办公社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还相当浓厚地存在着,还由于城市经济情况复杂,究竟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和办法为好,都没有经验,需要进行试点,取得一套适合城市情况的经验。刘少奇在华中组讨论城市公社问题时说:城市要以市或区建立公社,不能以机关或工厂为单位建立公社,将来要下放一部分小工厂给公社,大工厂还是国家的,人员可以参加公社,机关、工厂不挂公社的牌子。城市公社要进行重点试验,取得经验。

对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有人提出,现在人民公社不能“包”得太多,因为每个人的需要和爱好都不一样,特别是因为当前产品还不丰富,如果“包”多了,就会使生活搞得简单化,就不能刺激生产的发展。对“吃饭不要钱”的提法,西南组有人建议把草案中“实现了吃饭不要钱的理想”,改为“做到吃饭不要钱”。华南组有人认为这个提法严格推敲起来,不够确切,容易使人误解为“白吃”,因农民自己劳动吃自己的,不是“不要钱”的问题。华东组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很准确,因为实际上是要了钱的。但不少人认为这句话很重要,不改为好。

对公社的规模,华中组有人指出,草案说“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这里面有社大、社小的问题。根据

北戴河会议的意见，一个公社以不超过两千户为宜，但现在的情况是一一般都超过了此数，这样队就大了，因此考虑队以百户左右，山区四十户至五十户，一个公社下属十至十五个队为好。

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华南组有人认为，在现时提出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社会的必要分工同等级制度混淆起来，加以反对。

四、关于农业生产问题。

对实行耕作“三三制”，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因地制宜，根据本地情况有所变通。西北组有人指出，草案要补充这样的意思：应根据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所不同的步骤和办法，如地少人多的地方，种树、种草和休闲地可以少于三分之一；而地多人少的地方则可以各三分之一，或多于三分之一；并且实行的时间可以有快有慢。华北组讨论中，大家赞成写“三三制”，但是为了避免下面机械地硬套，修改时可以把这个问题写得灵活些，说明“三三制”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各个地区应当根据耕地的好坏、山地、平川、人口多少等具体情况，进行统一的规划。华中组许多人认为，“三三制”是在单位面积高额丰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实行这种制度，需要经过若干年在农业生产上的努力，但这是耕作制度改革上的一个方向。华东组的意见，认为农业“三三制”在全国范围这样提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南方某些地方地少人多等情况，做起来恐怕有困难。在执行中应该根据南方北方、平原山区、地少人多和人少地多、复种指数高低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在人多

地少、复种指数较高的地区，首先是降低复种指数，水利、土壤条件较差的地区，暂时还不要过多缩减耕地面积。还有人认为“三三制”这样固定化的提法，还值得研究。华中组也有人认为“三三制”、“十八亿亩”、“两千斤”的数字在草案中讲的死了一点，可否修改得灵活些。华南组有人说，根据有些地方的条件，实现“三三制”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办到的事情，故建议在决议中对如何搞好当前农业生产、认真贯彻“八字宪法”问题，强调一下。

华东组有人提出，亩产万斤粮、千斤棉，在部分地区是可以办到的，但普遍实行不易做到，在文件中不具体提为好。对1959的农业生产，不少人感到工业生产的安排，财力、物力都很紧张，将化肥、排灌机械、农业用电等支援农业的项目，几乎挤掉了，对这方面要作适当安排。

五、关于干部作风问题。

许多人都指出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有些地方很严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压”、“逼”、“拔”（拔白旗）、“辩”（辩你一下）等办法强迫群众；有的地方对群众体罚很严重，甚至使用了吊打等刑法；个别地方组织了“劳改队”、“督战队”等等。浮夸、虚假不仅表现在谎报粮食和钢铁生产成绩上，在扫盲、商业、税收、地质调查，以至公安部门的破案中都有。弄虚作假已经带来不良后果，有的群众对放“卫星”这样说：“不怕办不到，就怕说不到”。

关于发生强迫命令、弄虚作假严重现象的原因，大家作了分析，比较一致地认为，除了干部本身的问题外，同

各级领导有直接关系。东北组许多人认为，造假和强迫命令现象，除干部品质问题和个别地方组织不纯外，也是同有些地方领导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如给下面的任务太重，超过实际可能，完不成又要批评为“右倾”，要“拔白旗”。有的只喜欢听好的一面，只看到“红旗招展，遍地灯火”，而看不到“十面埋伏”的真相。下边干部往往看领导颜色行事，有的形容说：下边干部汇报时两个口袋装材料，一是“左”的，一是“右”的，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材料。这个组的讨论特别指出：现在有一种情绪，一提纠正缺点就被认为是泼冷水，抹杀成绩，“右倾”。这种连一个指头的缺点也不让批评的现象是危险的，应当警惕。不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纠正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是不容易的。

西南组讨论认为：强迫命令和虚假倾向的滋长，除了部分干部思想作风不纯外，各级领导都有一定的责任：领导头脑太热，不善于冷静地分析情况，布置任务超过了实际的可能，布置任务时又没有充分教育干部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与关心群众生活。这个组还指出，由于这种不良倾向是在一种“左”的幌子掩盖下滋长的，有些干部误以为一提纠正缺点就会“泼冷水”，有的人明知有问题也不敢提出，怕戴“右倾”帽子，不少基层干部甚至地、县委干部不愿和不敢暴露问题。

西北组有些人指出，“大跃进”以来各方面的成绩很突出，另一方面却也滋长了讲形式、图表面的风气，有的检查团下去时，到处扎彩棚，贴标语，过分铺张。也有干部

滋长了骄傲情绪,只讲成绩,看不到缺点。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也只表扬,没有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作风。

华东组总结了发生干部作风问题的六条原因:(1)有些干部的思想不纯;(2)省地县级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不够;(3)上面交下面的任务重,弄得下面干部为难;(4)干部对党的政策、方针理解有片面性;(5)干部听正面的话很愿意,听“九个指头”的话很有劲,而听“一个指头”的话就听不进去;(6)报纸宣传不冷静。

对纠正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大家认为关键在于领导,首先在领导布置任务时,必须实事求是,无论布置任务或听取反映,都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还有人特别提出:进行各项工作时要让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允许人们讲不同的意见,不能认为讲反面意见不利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同群众有共同的语言,才能造成广大群众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

讨论中也有一些人唯恐出现对三面红旗的怀疑,认为高产“卫星”总还是真的多假的少;还认为对干部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有确切的估计,要认识到这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否则,反对弄虚作假的口号一喊,有些人就会误认为什么都是假的,很可能把成绩和缺点真假不分,把“大跃进”和群众路线也反对掉。

六、关于 1959 年经济计划安排问题。

如何安排 1959 年计划,首先有个如何估计和总结 1958 年经济建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般维持在

基本肯定的基调上,但也有些意见较为尖锐。华中组有人指出:1958年以钢为纲的方针非常正确,取得了异常巨大的成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国找到了一条利用群众路线的办法发展工业的新道路。但是,在办钢铁以来,也出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某些失调现象,致使有些人又回顾到1956年出现的“马鞍形”,中央各部也感到“元帅”升帐以来有苦有乐,所以大家都想搞运动,都讲第一书记挂帅。这样一来,其结果是压力太大,处于过分紧张的状态,相应也带来各种物资供应不上,长久下去,群众会反对我们。这个组认为:我们不是“唯条件论”,但是必须注意和考虑到客观条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东北组在讨论中,有些人认为决议草案以1070万吨钢为例,说明“经济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似乎是说这个任务没有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因而不主张举这个例子。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决议草案的写法是适当的,1070万吨钢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既可能又太紧张这两个方面,我们正是从这里得到了文件中所提的经验教训的。

对1959年的计划,西南组建议将决议草案所说“为1959年钢、铁、铜、铝、机床、发电设备等产品的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项目,分别加以斟酌,确能赶上的才列上去。东北组谈到轻工业和重工业,工业与农业,煤、铁、木材内用和外调等等矛盾。由于东北电力不足的影响,不少轻工业工厂已经停产,这样势必影响今后轻工业品的供应。

在讨论计划的具体安排时,各方面的矛盾还是较大的,降低指标也不很容易。东北组感到全国任务指标降了36%,投资也降了36%,但东北各省的任务减得很少,有的不但没减,反而增加了,但投资却减了36%,因此在计划项目的安排和投资、材料供应上还有矛盾。西北组认为,投资安排西北困难更多一些。因为西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钢铁、机械元帅没有升帐,钢材指标的削减,就会影响西北的基本建设,如石油、石油机械、有色金属、军工、铁路占了很大部分,这些方面的项目和投资都不会消减很多,这样就势必削减地方基建项目。在讨论中,部门也有类似意见。机械工业部门反映1959年计划生产重型设备155万吨是不够的,按各方面的需要是200多万吨;机床13万台也是不够的,按各省最近提的要求计算是60多万台。

情况其实是很清楚的,造成指标难降的原因,主要在总路线、“大跃进”仍然是旗帜,高指标产生的根源没有消除。此外,由于前一段已经造成各方面比例失调和关系紧张,一下子降低指标势必继续导致各地方、各部门的重重矛盾(比如一些在建工程就要停工下马),这些矛盾短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从上面概要介绍的分组讨论情况,可以看出,经历了近一年、尤其是经历了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大跃进”运动,不少人感到出了许多乱子,照这几个月的搞法还会继续出乱子,所以开始从狂热中有所降温。有的还作了某种萌芽性质的反思(如指出不良倾向是在“左”的幌

子掩盖下滋生的)。“大跃进”的一整套路线、方针以至做法,在实践中碰了壁,撞了南墙,人们才往回退却。但这只是一种实践本能的反映,还不是一种意识的觉醒。退却和降温都只是量的减少,远远不是对质(即“三面红旗”)的改变,因此它不能纠正全局性的错误,也难以遏止更大灾难的发生。我知道一件事情,是胡乔木讲的,很说明这种退却的局限性。武昌会议通过有关公社的决议后,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王不敢向毛泽东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泽东发了脾气。关于7500亿斤粮食,持怀疑态度的人是不不少的,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征购。会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时,就担心征购多了影响农民的生活,要给中央打电报。关于耕种“三三制”的问题,毛泽东仍然坚持,许多人倒是发表了不同意见;照此办的地方,后来吃了大亏。

毛泽东的讲话和全会决议

除了11月30日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的谈话,在正式的全会上毛泽东只作过一次讲话,时间是全会结束前的一天,即12月9日。

毛泽东一共讲了十二个问题。这里概要叙述一下。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3月成都会议没有料到,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其实4月间这件事已在河南出现,我们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

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二)关于保护劳动热情问题。没有对90%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劳动热情，也会挫伤劳动人民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之后，给以轻重不同的处罚，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因为他们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有些特别严重的要作刑事犯处理。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处罚极少，保护极多。

(三)有一个口号问题。“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办不到？农村也许能够办得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3年之内，能搞多少钢？大概能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就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了吗？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如果这就算改变了全国面貌，今后就没有改头了。这个口号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经在大宣传了。或者提5年基本改变，10到15年彻底改变；或者说超过英国，算基本改变；超过美国，算彻底改变。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但是这样的机会主义，当了很有味道，我愿意当，我说马克思会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们的。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的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

有各种议论，国际上也有议论。主要就是说性急了一点。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是对于国际的、历史的情况，对于内外局势条件，缺乏分析，过早地纷纷宣布自己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关键的这一方面讲的。可能有几千几万干部，他们是很好的同志，忠心为党为国，他们怕我们搞得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帐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是同我们商量问题的。各省都有，有的不讲出来，实际上他们内心是有忧虑的，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的。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也给了观潮派、算帐派以答复，他们则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国内外局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并不是不成熟的问题。

我提倡读斯大林的书，提出了两个过渡。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个问题过去不可能答复，比如，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就没有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现在可以答复了，就有可能在12月这次会议上作出这个决议。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初级、高级。现在全世界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都要我们答复。杜勒斯也在议论，一有机会就讲一篇，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议论纷纷，各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外国的同志出来替我们辩论，替我们答复。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

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果不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就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要防止太急，一方面要答复这些问题。

(五)讲一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的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小平同志他们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一提法很好。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都是属于对立统一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内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8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现在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在高产条件下，减少耕作面积，实行“三三制”，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

再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结合，是对立的统一。公社，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徐水、遂平都看到此点。

武昌会议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制定 1959 年的计划，订计划时要有热有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明年搞 3000 万吨钢我也赞成过，一到武昌后，就觉得有点不大妙了。过去，我也想过 1962 年搞到 1 亿或 1.2 亿吨。那时我只忧虑这些钢谁用，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題，那时我还没有考虑可能性的问題。现在看来，还有能不能生产这些的可能性问題，今年搞 1070 万吨，把大家累得个要死。因此对可能性发生问題，明年 3000 万吨，后年 6000 万吨，1962 年 1.2 亿吨，这种可能，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提高客观可能性，不提搞 3000 万吨，把这盘子放小，只搞 1800—2000 万吨。是否可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情况，2200—2300 万吨都可以，甚至更多点，行有余力则超过嘛！提出的计划低点，让实践去超过。

现在我们有些人、有些县总是好抢先，提出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一个是对国际主义不利，中国比苏联先进，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再一个有没有可能也是个问題，值得研究。

（七）十五年纲要。在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会议上搁下没有谈。15 年搞 4 亿吨钢，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没有充分的根据，而且连初步的根据都没有。所以，目前不定这样的计划纲要。

（八）1958 年我们的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

结合的制度,应该说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想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東西。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托儿所,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可能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是对立的两面,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我们这个决议是为了让它巩固,但是如果不垮几个,就不会巩固。总趋势是巩固、发展。

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精神上要有准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我们的工业基础,使我们国家比现在巩固。我们现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1070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大。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报纸一登,打开报纸一看,尽是说的大话,尽是说干劲冲天,就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了。

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借机到处讲一讲倒霉的事情。无非是托儿所垮台,公共食堂垮台,人民公社垮台,党内分裂,脱离群众,或者被美国占领,国家灭亡跨台,只剩下一些游击队打游击。但是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管住了,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一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一天好起来。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它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它们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它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它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是我们的好时代。我们社会主义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曲折,还有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可能要打大仗(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充满了豪情壮志,大大鼓舞了与会者的情绪)。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一些过高的指标有所降低。比如,1959年钢产量计划,由2700—3000万吨下降到1800—2000万吨;“三年改变基本面貌”的口号,延长为五年以至十年、十五年;对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风浪头,也批评“性急了一点”。他号召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还认为《十五年社会建设纲要》缺乏起码的根据,主张目前不定这种计划。

然而,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许多由衷的肯定,认为人民公社是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实现两个过渡,便于办很多事。他以徐水、遂平为例,说明人民公社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

素,并认为人民公社总的趋势是巩固、发展。毛泽东确实对人民公社极为欣赏,因为同他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一致的。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他先后写了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说到:“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是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了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第一个批语的铅印件,毛泽东用墨笔划去,另写了一篇,即第二个批语,印发给会议。这个批语主要是介绍汉末张鲁行“五斗米道”的情形:“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在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

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显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不仅被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当作旗帜，而且一直影响到近代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

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既讲划清两个界限，又着力维护人民公社这面旗帜，恐怕还同国际上的反应有关。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国际上议论纷纷，有褒有贬。两方面的评论他都注意到了，其中来自西方的批评和指责更为注意。11月10日《参考资料》刊载合众社电讯称，美国官员说：“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位共产党中国领袖正在纸面上把社会组织成为最有效的生产单位”。14日和19日的《参考资料》，再次先后刊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的两次演说，其中指责了中国的公社化运动。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批示印发给了全会。

毛泽东是“挑战”与“应战”心理极为强烈的人，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自然是一概予以坚决回击。这就是他在讲话中说的，“要答复这些问题”。反对西方国家对国内政的干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问题是在解决国内问题时，他也带有这种心态，把国内的批评意见指责为“观潮派”、“算帐派”，认定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是不怀好意

的”。相反，即便是批评“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时，仍然肯定这些抢先的人，“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结果是自然给予这种“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以更多的维护，对急于过渡的批评则打了几分折扣。无怪乎，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公社的决议，一开始就是对人民公社的礼赞：“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全会于12月10日结束。这天的会议通过了四个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首先肯定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整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产物；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带来的显著利益；并认为它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道路，三大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并将成为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决议》提出，全国人民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议》说，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同时指出，由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企图在农村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是不适当的，也是不成功的；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决议》还指出，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决议》又说，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

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决议》还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要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必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敬老院、中小学和成人教育。《决议》要求公社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对社员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资产阶级的作风来对待群众。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主要是对北戴河会议通过的1959年计划作调整，降低一些过高的指标。毛泽东在12月9日的讲话中说，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到明年三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再发表好一些。所以会后没发表这个《决议》。但是新华社发表的全会公报，还是公布了钢、煤、粮、棉四大主要指标，钢为1800万吨，煤为3.8亿吨，粮为1.05亿斤，棉为1亿担。其中除了钢的指标下降了之外，煤的指标还略有提高，粮、棉指标没变；就是已经降低的钢指标，后来证明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经过调整的指标仍然很高。会议期间，陈云曾向胡乔木谈到，公报不要公布钢、煤、粮、棉指标和1958年7500亿斤粮食产量。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后来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乔木，说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反过来表扬了陈云，还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这是后话。

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是继第一次郑州会议之

后再次给“大跃进”降温的会议。对原定1959年的某些过高的经济指标，会议作了压缩；对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是，由于对总路线领衔的“三面红旗”从根本上肯定，因而降温只能在这个大框架内进行，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新闻界的冲击

穆 欣

绵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一场巨大灾难。这场被人们讥讽为“大革文化命”的大动乱，新闻界首当其冲。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就已遭到围攻；“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刚一拉开，《人民日报》也被夺了权。林彪、江青一伙在1967年1月掀起的全面夺权风暴，又是先向新闻机构开刀。从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开始，新闻界发生了一连串的夺权事件，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不幸的流血事件。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排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保住他们窃取到手的权势，极力控制舆论，大兴文字狱。他们采取狠毒卑鄙手段，诬枉构陷，罗织罪名，制造文祸，曾使无数新闻工作者遭到残酷的迫害，许多无辜者被投入监牢，不少优秀的新闻战士被夺去了生命。

这里所要记述的，仅是笔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经历和见闻。

一、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夺权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是人民日报社。当时，派往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1966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当日，经周恩来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为此联名向毛泽东请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最早派出的工作组。

然而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的事，是陈伯达、康生和江青一伙蓄谋已久，阴谋策划促成的。他们执意要派工作组，乃是他们控制舆论，在全国篡党夺权的开端。他们利用了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同志的不满，给《人民日报》设置陷阱：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致使人民日报社对政治动向不摸底，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艰难。

毛泽东在上海审定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全不知情。这篇文章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后，《人民日报》长时间保持沉

默，直到20天后——11月30日才根据中央第一线同志的指示，在第5版“学术研究”栏里转载。这事使毛泽东很生气，他对中央第一线同志不满意，对《人民日报》也不满意。他说：“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①

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曾对《人民日报》进行过一次比较严厉的批评。吴冷西说：

18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召开一个小会，到会的有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彭真、康生、陈伯达和我列席。会议结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评我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主席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

^①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①。

众所周知,《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代表中央指导全党全国的工作。按照一向惯例,总是其他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文章,但从这时候开始,人们看到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上述关系这时被颠倒过来了,在种种压力下迫使《人民日报》转载别的报纸的社论和文章。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就是这样;当时给“运动”定调子的文章,都是《解放军报》先登,《人民日报》转载。

这种情况,从《人民日报》创刊之始就在这里工作的李庄(其时任副总编辑、后曾任总编辑)忆述说:当时“为了摆脱险恶处境,《人民日报》抓紧利用一切机会‘自赎’。4月16日《北京日报》用3版篇幅刊登揭露《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人民日报》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152页。

立即发排,准备转载‘表态’。谁知接到通知不得转载。为什么?不清楚。于是继续在原有批判轨道上作功夫:增加篇幅,提高调门,多搞标语口号,‘大造革命声势’。但是听不到任何肯定之词。写了参加战斗的社论送审,一概没有下文。相反,透露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精神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家大报的社论于18日发表,《人民日报》赶忙在19日转载。另一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收录了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在当时是头等重要文章,也作为《解放军报》社论在5月4日发表,《人民日报》赶快在5月5日转载,由于作了删节,酿成大祸。以后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等等在当时给‘运动’定调子的文章,都是别的报刊先登,《人民日报》转载。政治动向不摸底,领导意图不清楚,全社工作人员都明白已被抛到一边,中央党报不在王府井大街了。”^①

就在工作组前往人民日报社夺权之前不久,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于5月10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写的另一篇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这是通过轰击邓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

^① 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67页。

作部部长)而轰击彭真和北京市委的一颗重磅炸弹。这天下午,刊载此文的一批《文汇报》空运到北京来,立即送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同时强令北京所有报纸在第二天全文转载。

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设立和它的成员名单还未公开宣布。5月10日下午,当刊载姚文元这篇文章的《文汇报》尚在空运来京途中,即由新华社通知首都所有报纸、期刊的负责人到民族文化宫礼堂开会,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传达强令各报刊转载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中央通知”。这是以后被人称作“狗头军师”的张春桥跻身“中央文革小组”后在北京第一次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有人描绘说,这天“张春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长长的接地的裤子,志得意满,睥睨一切地坐在台前。”^①人们到齐后,张春桥就在台上板起面孔宣布:

(一)、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所有的报纸明天都要转载,不准少一个字,错一个标点。少了个字,错了个标点,都由那个单位的党委负责。《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把内容作了重要的删节,不准删。除了北京的报刊,新华社今天也通知全国的报刊,注意不要删节。

(二)、《人民日报》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军报》社论,

^① 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84页。

把删去的地方用黑体字排出来,做自我批评。《中国青年报》也删了,今天重新登了,没用黑体字,要再登一次,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张春桥在这里说的《解放军报》社论,就是前面引录李庄文中所说的该报5月4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篇社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北京开幕这天发表的。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还经毛泽东审定过,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文章。

这篇社论当天经新华社播发全国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编辑部事先不知道这篇社论的底细,更不晓得是经毛泽东审定的,5月5日转载的时候,只在稍嫌重复的地方删去500多字(只是些套话和反复讲过的众所周知的形势分析之类,并不像张春桥说的“把内容作了重要删节”),不料却捅了“马蜂窝”,闯了一场大祸。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就把《人民日报》有关负责同志召到钓鱼台,由康生主持会议,“严厉指责、追究此事”,说什么“《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他在会上查原因,追动机,“大有把《人民日报》一口吞下之势”。这些同志回到报社,“认错再认错,检查再检查,就是通不过”。报社已将有关的同志调动了工作,他们还是不依不饶,还要报社公开登报检讨,使报社的同志感到极大压力。如今张春桥又在这种场合声色俱厉地要求“《人民日报》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军报》社论,把删去的地方用黑体字排出来,做自我批评”,正是本着康生、陈伯

达的旨意。多亏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国内特别是国际上的影响,决定该报不必登报检讨。才使报社的同志如释重负,《人民日报》免于公开“出丑”。

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后,陈伯达即与康生等商定名单,指定我也随陈伯达前去(以后我只去了一周多时间,因为钓鱼台的事情繁忙起来,还得照管《光明日报》的事,就不去了)。这个工作组成员共定8名,除陈伯达和我之外,尚有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的尚力科、朱悦鹏,《红旗》杂志的杨丁和尚未选定的上海2人(其后张春桥由上海派来的是鲁瑛、邵以华)。

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8号楼召集工作组成员开会。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一部分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但只陈伯达一个人讲话。陈伯达在会上讲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的原由,进而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滔滔不绝地大谈“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主张彻底破除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最后陈伯达说,今天下午要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的决定,今晚工作组即进驻人民日报社。他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这天陈伯达讲得很多,散会很迟。他在结束时说,明天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要钱抵千、尚力科、朱悦鹏3人起草,同时确定就把他的这番讲话整理出来,作为社论的内容。今晚改定,明天见报。

当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及首都各主要报纸负责人开会。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到会。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当场宣布了工作组成员名单)。他在讲话中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最后,他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邓小平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康生接着喋喋不休地讲了将近一个钟头。除了关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以外,并对《人民日报》大张挞伐,继续严厉追问删5月4日“军报”社论是何居心?顿时把会场的气氛搅得异常紧张,全场鸦雀无声。大家只得耐着性子听完他这一番声色俱厉的“训斥”,《人民日报》的同志特别感到不是滋味。

陈伯达在会上的一句话没说。会议在5时左右结束后,他即带领工作组前往人民日报社,完全不理睬邓小平在

怀仁堂“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勉励报社同志办好报纸的话，公然违背总书记关于“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的指示，立即夺了吴冷西和报社编辑委员会的权。后来陈伯达洋洋自得地说：“我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这是以中央名义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人民日报社在全国第一个被夺权。对于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无疑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有的同志说：“对《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记沉重的闷棍。”

这天晚上，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前往人民日报社上班，我也同车前去。到达报社后，陈伯达让我专就版面编排问题，根据他的安排跟报社夜班编辑部联系，他和王力、关锋以及其他一些人关起门来，修改钱抵干等人根据他在钓鱼台讲话整理的社论稿。社论初稿的题目原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审定时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且规定：社论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这篇社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标题。人们说，这篇社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也可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

社论宣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几亿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

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这篇社论完全无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已经存在了17年的事实，按照林彪5月18日那篇被称作“政变经”讲话的调子，竭力鼓吹“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的夺权主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它说：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

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社论不顾中国的现实，进而煽动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轻一代和将来一代。”

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他们夺权的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在它的煽动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了打砸抢、抄家的口号，全国上下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受到诬陷，遭受批斗，非法关押，有的被扫地出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恶果。

社论还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受其影响，社会上刮起“破四旧”的狂飚，迅速刮遍全国。无数红卫兵走上街头，从改街道、商店、厂校名称的“改名”开始，发展到剪衣服，毁文物，抄家，解散民主党派，乱斗乱打，直到打死人，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惨祸。

（其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0年11月20日起在北京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时，这

这篇社论成为陈伯达的一大罪状。陈伯达深知这篇社论所造成的恶果极端严重,当他看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1966年6月,陈伯达组织编写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时,曾经惊慌地说:“算这个帐,枪毙我也不反对,可能也太便宜我了。”还在开庭调查前,他就承认说:“社论是我搞的,并且是我出的主意,竟没有事先送请中央审查,罪恶是很大的。”11月29日,当审判员在法庭上问到这篇社论出笼的情况时,陈伯达在被告席上回答说:“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我拿笔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在法庭上宣读过证人有关炮制这篇社论过程的证言时,陈伯达又说:“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

陈伯达刚刚抛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康生又抛出了另一颗重磅炸弹: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夫妇的“杰作”,是他们在幕后策划组织的。5月14日,康生即派曹轶欧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带几个人进入北京大学,打着“要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旗号,秘密策动一些人起来造反,反对北大党委和市委;同时授意“从北大点火,

往上搞”。聂元梓等人就炮制了这张大字报，他们不顾前一天北大党委传达的中央关于贴大字报“内外有别”等项规定，悍然于5月25日把这张大字报在校园里贴出来。这张大字报歪曲事实，攻击宋硕、陆平等人传达的关于加强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华北局指示精神“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攻击当时中央提出的“内外有别”等纪律是“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立即遭到围观的北大师生员工的强烈反对，仅仅半天时间，他们就自发地贴出了1500多张大字报，对聂元梓等进行反击。这天午夜，当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来，重申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8条规定，并传达了周恩来的4点补充指示。周恩来特别指出，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就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他批评聂元梓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

康生唯恐他的阴谋被揭穿，慌忙找来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飞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写了如下的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天下午康生接到毛泽东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就在钓鱼台眉飞色舞地说：“聂元梓的大字报今天晚

上广播，明天见报！”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希斯尼·卡博、贝基尔·巴卢库谈话时说：这张大字报，“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

6月1日晚上7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感到意外。因为不知内情，大家愤愤不平。有些师生高喊“不要盲从！”“在3小时内把中央广播电台的气焰压下去！”校园里马上又贴出了许多驳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其他院校也有不少人到北大来观察。刚到《人民日报》夺权的陈伯达听到有人说：“北大秩序很乱”，想要亲自去看看。王力、关锋劝他不要去，留在人民日报社坐镇，由他们先去看看再说。王力、关锋从北大回到报社，宣称北大形势好得很，“哪有什么乱，完全是一派革命大好形势。”他们和陈伯达一起，连夜炮制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这篇文章把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诬陷陆平等人所代表的组织是“反党集团”。它以造谣诬陷、无限上纲的手段，抓住这个由头，煽动全国动乱：“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其后，毛泽东

曾于8月5日在刊载这篇评论员文章的《人民日报》上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抵制。”）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大标题（副题是《〈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在第一版发表了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陈伯达尚嫌劲头不足，同日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鼓吹我国正“处于触到人们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之中”。“这是触到人们灵魂的问题，也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社论告诫人们要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号召人们“要作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受其影响，什么“狠触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类的新词，就成了他们长期愚弄、折磨广大干部、群众的口头禅。

广播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的举动，不仅使北大师生感到意外，也使许多中央负责同志感到意外。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听到电台广播，就打电话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回答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电台向全国播出。当时在京主持中央工

作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事先同样不知道。听到广播，王光美去问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听到否定的回答后，王光美对秘书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①

这张大字报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成为“文化大革命”推向社会的标志。各高等院校以北大为“榜样”，揪斗校系领导，冲垮了各级组织，立即使北京和全国各地高等学校陷于混乱，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1966年9月8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向来京串连的学生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这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的事并未公布，但是细心的读者能看到，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已经完全改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是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夺权后抛出的第一颗煽动全国动乱的炸弹。从此，《人民日报》即以每天一篇社论的阵势向全国鼓动造反。6月2日，和北大那张大字报及评论员文章一起发表的社论，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3日至5日又相继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

①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

八”讲话的基本内容捅向全国,点燃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陈伯达一到人民日报社就当众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立即进行调整,推选新的部门负责人报工作组批准。由此彻底改变了《人民日报》的面貌,将它拖进“文化大革命”的轨道。“最高指示”首先在这里发表,重要信息经过这里发布,新鲜道理经过这里解释。从1967年开始,少数社论还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以示特别重要。转过年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于1月初相继夺权。1月8日,毛泽东在谈到这两个报纸夺权的时候,曾以赞许的口气谈到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的事: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当时,陈伯达还规定:每天晚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必须到人民日报社开碰头会,“统一宣传口径”,其他各报也都照此精神向《人民日报》“对表”;为了掌握中央三大新闻单位的运动,他还批准向总政治部要了20名军队干部,以记者名义分往各大新闻单位活动,他本人由此俨然成了“舆论总管”。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伯达这个“舆论总管”很快就由姚文元所取代。这张全国影响最大的党中央机关报的大权,最后终于落在江青一伙手里,就连陈伯达一手把持的《红旗》杂志也被姚文元“接管”了去。这大概是陈伯达始料不及的。

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当时还派了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并向全国广播。但毛泽东不久在派工作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6月9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都已派去了。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当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决定在运动中派工作组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组长。这时陈伯达见风转舵，于6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工作组，未获同意。其后派工作组一事被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责为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陈伯达幸灾乐祸，颇为自得地说：“我是第一个工作组组长，又第一个提出撤销工作组！”这句表现脸皮厚的俏皮话，恰好道出他是一个出尔反尔、“随机应变”的政客。

二、接连不断的报社夺权事件

自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开了头，许多野心勃勃的造反派，都把眼睛盯上了报社，各地报社被包围、被夺权的事情屡有发生。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不久，西安、南京和上海等

地，都曾发生过造反派包围报馆事件，其中尤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的事件持续的时间长，情节比较严重。

1966年11月间，“红革会”办的红卫兵小报《红卫战报》第9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11月27日，“红革会”要求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代为发行这一期《红卫战报》，并且要求与《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他们气焰嚣张，蛮不讲理，公然扬言：“《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

解放日报社和上海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按照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拒绝了“红革会”的无理要求。11月30日，“红革会”所搞的大批红卫兵强行进驻解放日报社，不准这个报纸发行。12月2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工人造反队冲进报社，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了。第二天，“红革会”与解放日报社谈判没有成功，他们便以武力封闭了报社。他们的行动得到“工总司”和外地在沪串连的造反组织的支持。报社门口和周围，被数千名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围得水泄不通。

造反派的这种做法，引起上海人民的反对。约有50万人涌向解放日报社附近，呼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站在“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立场的群众，与“红革会”、“工总司”展开街头辩论，并向封闭报社的造反派冲击，试图攻下报社。这样，

由争辩发展到争斗，两派群众的冲突持续两天两夜，双方各有少数人受伤。12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压力下，被迫承认“红革会”和“工总司”提出的条件。11日，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60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认定封闭《解放日报》的事件是“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严重地损害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威望和《解放日报》的声誉。

1967年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动下，上海造反派相继在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夺权，成为所谓“一月革命”全面夺权风暴的序幕。

1月3日，文汇报社造反派夺权，4日，《文汇报》发表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公开声明站到“革命造反派”这一边。5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也发表《告读者书》，宣布夺了权。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张春桥、姚文元这一天在上海接见造反派。6日，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

毛泽东在1月8日晚上召开会议，专门谈论上海两报夺权问题。他说，《文汇报》现在由左派夺了权，4日造反。《解放日报》5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对的。《文汇报》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

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来出。他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些话，不但对全国新闻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成为全国上下全面夺权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的谈话很快地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又将毛泽东的话写进《编者按》中：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夺权风暴（江青等称作“一月革命”）。而这场夺权风暴，首先从报界开始并不是偶然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伊始，怀着篡党夺权野心的林彪，就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又抓枪杆子，他们

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就是首先抢占舆论阵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舆论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野心勃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都把夺取舆论工具视为夺权的首要目标和夺权的主要标志。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各地区各单位群众组织结合，他们的口号都是所谓“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就有3个“造反司令部”，他们的“五大领袖”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等无不覬覦各大新闻机构的权力。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最先派他的“井冈山兵团”数百人进驻《光明日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都瞄准了《北京日报》，两员女将派出的人马相互争斗得难解难分；以“天派”领袖自诩的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则对《人民日报》垂涎欲滴。这些人同各新闻机构内部的造反群众组织的头头互相串联，沆瀣一气，极力制造混乱，致使直属中央的各新闻机构大受骚扰。首都红卫兵监督组，竟然进驻人民日报社“监督”；北京广播学院等院校一批造反派组织也涌进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也被造反派夺了权，总社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被抄了家。各省、市报社和广播电台夺权的事件，更是接连不断。

夺权风暴也刮进军报。1967年1月13日，肖力等8人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硬说“几个月来《解放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一直脱离文化大革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发布了《革

命造反派宣言》和《告全军书》。第二天又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主张“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和地方有所不同。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有所动摇。”他们在夺权后即上书林彪，请求批准和支持。1月17日，林彪复信说：“《解放军报》由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芳、武将、杨秉文、孙福小等八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又说：“‘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的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派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

林彪把这封复信先送给毛泽东：“主席：解放军报社的问题是否如此答复，请批示。林彪，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毛泽东，一月十七日”。

1月16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大学“红旗兵团”等单位进驻北京日报社并夺权。他们成立了“彻底摧毁旧北京日报、促进北京日报新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还

发表了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呼吁书》。他们要全面夺权“取而代之”，强调外面接管，排斥报社一切编辑人员。因此，即与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等造反派组织发生分歧，引起冲突。后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干预，决定《北京日报》停刊，才使进驻报社的大学生红卫兵撤离报社。

1月30日，毛泽东在谈话中针对广播事业局夺权所引起的相互争夺情况说：“中央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赞成。”

2月5日，毛泽东又针对由于外单位造反派插手，内战打得厉害的工人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发表谈话说：“《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的人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失控。毛泽东的话，已经不能制止住这种混乱现象。林彪、江青等人看到事态的发展违反了他们的意图，未免惊慌。广播事业局、新华社夺权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被迫宣布：这些单位都是中央直属的宣传机构，不得夺权和接管。同时派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以便防止这些宣传工具脱离他们的轨道。1967年1月11日及23日，接连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电台问题的通知》和《补充通知》，宣布各地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

应当立即退出”。2月21日，中共中央又根据同年1月28日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发出《通知》，重申党中央各部门、公安、外交、国防、金融等机构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通知》中还有两条重要规定，一条是：“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大中学校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条是：“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1967年元旦前后，在一次会上谈到报纸问题。毛泽东在讲话时抬起右手伸出两个手指说，报纸不必要这许多，过去影响大的是申、新两报（按：指全国解放前在上海出版的《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历史悠久、影响较大、销路较多的全国性报纸）。陈伯达接着他的话茬说，北京就留一个《人民日报》、一个《光明日报》，除军报外其他报纸可以停刊。当时还议论到，由于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争夺、占领省、市出版的报纸，影响到《人民日报》等报航空版的印刷、发行。1月3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

日报》正常印刷、发行。《通知》写道：“最近，有些省市的报纸，停刊闹革命，这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报纸停刊以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也停止代印，这就不对了。因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光明日报也是中央批准发行的报纸，如果不能正常发行，必然会使党中央的精神不能及时同广大群众见面，对全国文化大革命和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利的。希望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对红卫兵、工厂工人和机关干部很好地进行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已停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代印厂，接到这个通知后，请把它印出来张贴在工厂内。）”

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已在全国泛滥，这些以中央名义接连发出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以及有关的“最高指示”，并不能抑制造反派无法无天的行动。就在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发出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命令以后，武汉、青海接连出现本地和外地造反派联合占领报馆，并与当地军区争斗的事件。

1967年2月初，武汉发生造反派占领《长江日报》事件。当地和从北京南下的部分军队和地方的造反派，强行占领了驻在汉口“红旗大楼”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他们用《长江日报》的版面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后称《二·八声明》）。这篇声明鼓吹极左思潮，煽动动乱，充满火药味：说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

“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还有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2月9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下”接管的，制造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占夺《长江日报》的假相。与此同时，造反派在社会上到处冲杀，大搞打砸抢抓，还对不同观点的群众进行批斗游街。2月11日，造反派又冲击了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他们恣意横行的打砸抢行为，引起武汉军民的愤怒不满。2月18日，武汉军区应广大军民的强烈要求，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中的错误观点。同时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接着，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于3月17日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军区并于3月21日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促进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但造反派并不甘心，因有林彪、江青一伙为其撑腰，其后事态不断恶化，终在武汉酿成震撼全国的“七·二〇事件”。

2月23日，围绕对《青海日报》的争夺，在西宁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青海军区为了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成立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2月21日，中共中央要求军

队对报纸、电台实行军事管制。其时青海日报社已被西宁市造反派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所占领（得到北京前去串连的学生的支持和参与）。他们在报社内大搞打、砸、抢、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他们拥有一批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阻挠解放军实行军管，对向他们做工作的战士进行威胁。起初他们对解放军进行刁难，后来竟以暴力驱逐前来报社实施军管的部队人员。

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经过研究，决定对报社强行军管，由办公室副组长、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任现场总指挥，同时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2月23日，西宁驻军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退出报社，交出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占据报社的造反派向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还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一些人被当场打死，其余的人被驱出报社。这场冲突，造成群众亡169人，伤178人，部队亡4人、伤26人的严重流血事件，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林彪、江青一伙乘机把此事说成“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现，用以打击叶剑英等老帅。由于中央文革小组从中捣鬼，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4日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竟将此事说成是赵永夫等人篡夺军权，对“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林彪亲自出席3月24日的会议，并且讲话诬陷赵永夫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等领导人，赵永夫当场被捕，王昭最后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实事求是地重

新又对此案作了公正的处理。

当时红卫兵组织和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一面抢夺党报，造成混乱局面，迫使许多报刊停刊；一面利用这些报社的物质技术条件，大量出版各种造反小报。蜂拥出现的各种小报，造成新闻界的畸形现象。这些报纸，特别是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的几个“司令部”出版的报纸，大都为权欲强烈的野心分子所操纵。他们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步调，照着林彪、江青一伙的指挥棒行事，根据他们的意图任意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同时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争相表示“拥护伟大领袖”的忠心。往往以此作为“唯我独革”的标志，去赢得林、江一伙的赏识，也是适应其与持不同观点群众组织较量的需要，以求与对手打派仗中占上风。为了打倒一个人，他们往往采取造谣诽谤手段，栽脏诬陷。这些小报还常将其在打砸抢行动及在抄家时获取的机密文件、讲话、会议记录等档案任意公布，严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或者不负责任地传播各种道听途说的、无中生有的“小道消息”，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针对此类报刊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曾经发出《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了重要作用。现在根据这类报刊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林副

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

二、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军队。报刊上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对于他们的支援工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有的报刊，在中央作出明确规定之后，还发表公开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这是完全错误的。

四、必须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的报刊泄密现象相当严重，在一些文章、报道中，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以及经济建设、外交斗争、机要事务等等重要机密。这种现象必须迅速制止。

五、宣传要突出政治。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不要搞“黄色新闻”以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对于国际上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

七、在宣传报道中，不要传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马路新闻”，尤其不要轻信和传播政治谣言。

由于当时局面已经逐渐失控,随后就是7、8、9月的更大混乱,所以这一《意见》也同其他有关《通知》、《决定》一样,难以产生应有的抑制作用。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对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错误言行采取严厉措施之后,情况才变得好一些。

三、《光明日报》换新报头也有人找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有报纸坚持正常出版都不容易。形形色色的“造反派”,不断地向报社找茬闹事。一张报纸印出来,尽管没有什么大问题,造反派也会“在鸡蛋里挑骨头”,把本属正常的事情加以歪曲,无限上纲,到报社闹事,力图迫使报纸停刊。报社内部的造反派往往火上加油,力使事态扩大,以便乘机夺权。

例如,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急躁加温。有些造反派,常对各报版面上刊出的有关毛泽东的新闻、诗文和图片的位置高低,所占篇幅的大小以及印刷是否清晰等等,横加挑剔,上纲上线,动辄扣上“反对伟大领袖”的帽子;甚至在其所刊版面近旁印有造反派认为“欠妥”的图文,标题,或者毛泽东照片背面印有什么他们胡猜乱说的“不吉祥”的内容,都会有人到报社来“造反”。

那是一段天昏地暗,是非颠倒的岁月,人们想要打倒一个人,可以信口开河,随意罗织罪名,泼你一身污水。尽管各个报刊编辑部无不兢兢业业,小心翼翼,防止在版面上出现会被抓住“小辫子”的差错,还是难免会有灾祸降

临。俗话说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想要闹事，总能随便找到一个“由头”的。有一些造反派，当时对于我所主持的《光明日报》，就曾拿它的报头作文章——因为那时的报头不是毛泽东题写的。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造诣很高，功力深厚，是举世公认的。他的笔力苍劲洒脱，为国人所喜爱。建国以后出版的全国性报纸的报头，大都为毛泽东所题写，只有《光明日报》等极少数报纸例外。1957年秋天，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报社内外许多同志和广大读者，多次建议换用毛主席题写的报头。1964年夏天，我曾为此专门向毛泽东同志写过报告。开头他认为我们报纸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曾说：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给写。情况并非这样，郭沫若只题写了报纸上《文学遗产》专刊的报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

这时听说造反派要拿报头的事来“造反”，编辑部有些同志感到紧张。本来，我们换用毛泽东题写报头的愿望始终没有放弃。如能早日实现这个愿望，也就可以消除那伙人找茬的一个“由头”。但是，众所周知，当时毛泽东特忙，不想再为此事给他添麻烦。后见毛泽东1963年1月24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的末页，有“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字样。1966年12月下旬，就以其中的“光明日报”4字制成报头，并将所制的版样送请他审阅后，于1967年元旦启用。

这原是大家盼望多年的事，报社同志和广大读者看到换了新报头，都很高兴。其后不久，林彪、江青掀起了

“一月夺权”风暴。早已失控的动乱骤然升温，那些已被强烈权欲扭曲了灵魂的“造反派”头头，无不急起“紧跟”。报社内部某些造反派和报社外面觊觎舆论工具的造反派头头，如像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勾结起来，教唆那批造反“小将”就此事找茬闹事。不过其时的“由头”，却从“为什么至今还不换毛泽东题写的报头？”变成了“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改换报头？”硬说其间藏有什么“计谋”，是要拿这个去压造反派。他们炮制了种种谣言，有的说新报头是从毛泽东手迹中拚凑起来的，甚至说是背着毛泽东伪造的毛主席题字云云。什么样的谎言，都能从这些人的口里喷射出来。

其实，这些谣言捏造得并不高明。换用报头的情况，原是报社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全都知道的，所谓从毛泽东手迹中拚凑起来的胡说不攻自破；变换报头乃是报社同志和读者多年的夙愿，并非一时的“计谋”，也是众所周知的事。而且，报头是每天都在报纸最显眼的地方刊出的，笔者先还曾为题写报头的事给毛泽东写过报告，改换以前如未取得他的同意，岂有不被发现的道理？他们如此胡搅蛮缠，毕竟不得人心；就此捏造的谣言，也无人肯信。因此，鼓噪一阵，也就偃旗息鼓。但也有一些人并不就此罢休，一有机会，又来兴风作浪，致使本属正常的事情，却给人们留下一团迷雾。

好在笔者收藏的这份毛泽东所写《满江红》手迹还在。这份手迹的原件写在16开大小的宣纸上，共计12页，“郭词见……光明日报”是末页的最后两行。从1967年至

敬詞見無
有日光明報

光明日報

GUANGMING DAILY

1975年,笔者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曾被投入秦城监狱。8年冤狱期间,所有文件均被中央专案组搜去。及至笔者冤案获得彻底平反后,中央办公厅退还文件时向我说明:根据中央征集毛主席手迹规定,所有手迹均应上交,给一份复印件交收藏者保存。如将手迹末页的“光明日报”字样和该报仍在沿用的报头放在一起,加以对照,自能了解有关此事的真相,看出谣言的荒谬。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新闻界灾祸层出不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新闻事业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他们对我国新闻事业的最大危害,是把所有新闻媒介(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变成他们煽风点火、制造动乱的工具体,以错误的舆论导向毒害人民。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进行异常严酷的新闻统制,通过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强制造成空前的“舆论一律”。“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①”,千报一面,千篇一律,致使整个民族“万马齐喑”,招致新闻事业空前的灾难。因此,许多人干脆就把这场“文化大革命”称作“大革文化命”,把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题目,改成“牛鬼蛇神横扫一切”。他们在这个时期推行的错误的舆论导向,尤其是对党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不仅使当时的新闻事业倍遭摧残,还对以后的新闻工作遗害无穷,产生长久的恶劣影响。

^① “梁效”是江青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为“两校”的谐音。

博古与《解放日报》的四年

陈 夕

今年6月24日是博古诞辰90周年纪念日。

1946年4月8日,博古在去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工作后,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同机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罹难,年仅39岁。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历史时期。他由爱国而走向革命,并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犯过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他勇于修正错误,不懈地追求真理。在抗日战争的后期,他主持解放日报的4年中,呕心沥血,为党的新闻事业、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放日报》是1941年5月16日正式在延安创刊的。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最艰苦阶段,为了渡过重重难关,坚持抗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如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等。对新闻工作也作了重大调整部署。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停办《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创办一张大型日报。并责成博古负责筹备。

博古非常热心于党的新闻工作。在此之前,他在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时,曾目睹了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的迫害,致使《新华日报》不能有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能使人们获得国内外真实的新闻消息。回到延安后,博古常常谈到“要在延安创办一种日报和强有力的通讯社,以便毫无保留地将我党的主张传播

到全国、全世界。揭露独裁者的阴谋勾当，帮助全国人民，使他们的眼睛更加明亮起来，他们的力量更加团结和壮大起来”^①。当他和杨松接受中央决定负责筹办《解放日报》后，博古便以全力投入到筹备工作中去。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条件极其困难，既缺少房子又没有印刷机械。博古就和筹备组的同志一道四处奔波，最后将报社社址选定在清凉山。但是工作人员的宿舍仍无法解决，博古只好住杨家岭，每天一清早到报社上班，虽然往返几里路程，但他总是风雨无阻，满怀革命的激情^②。创办这样一种大报，经验不多，新闻工作干部和技术工人又很缺乏。筹备之初，只有一个从新华日报社来的熟练工人，编辑、记者也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超过25岁的都极少。大部分是新手，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博古不仅要指导编辑室工作，而且也经常深入到排字房指导排版，给新工人讲解技术要领，不辞劳苦地指导报纸排印的每一道工序。

由于博古和筹备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完成了筹备工作。在讨论出刊日期的时候，报社有人提出由5月15日起试刊3天，以顾及编辑部及排字部技术不熟练的困难。但博古崇尚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认为应克服一切困难尽早出刊。5月14日，博古主持召开了报社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博古、杨松、丁玲、张映吾、杨永直、曹若茗、王揖。总编辑杨松在会上宣布：《解放日报》明天（十五日）试报，后天正式出版。博古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有鲜明的立场，生动的形式，并就如何办好党报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指出：“党报工作者对党报重要性要有认识。我们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以党的立场来分析认识世界，这是方向。办好报纸，首先应随时注意敌、我、友的态度；其次，应注意与群众的联系，反映群众的生活情形。因为党中央是运用党报来组织群众、团结群众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在政治上把握马列主义立

① 《延安文革》下册，第935页。

② 《延安文革》下册，第936页。

场,以此来分析事变的演化;再次,我们要有充分的国际国内知识。我们不管是写社论、通讯或文艺作品,都是一样要注意我们的立场。各位编辑都应认识我们的报纸是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馆的工作是很苦的,每个人对自己的专门工作(尤其是编辑)应下更大的苦功,提高自己的业务技术。对国际国内的情形,编辑们应有清楚的认识,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我们党报的威信。

5月15日,中共中央就出版《解放日报》发出通知:“从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党的一切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同时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①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出刊,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发刊词和博古写的通讯。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阐明了《解放日报》的宗旨和任务,指出:宣传党的路线是《解放日报》的使命。博古也明确表示,《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要有鲜明的立场,要把政治性放在首位^②。《解放日报》后来办刊的实践也证明在内容上始终把政治性放在首位,把反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自觉接受中央的领导。博古作为解放日报社的社长,对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有鲜明立场的宗旨是明确并坚决照办的。

《解放日报》创刊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诬蔑陕甘宁边区是“割据”,不仅破坏了抗日团结,而且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阐述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作用。《解放日报》发表了《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的社论。社论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第97页。

^② 《新闻研究资料》第26辑,第126页。

方面阐述了在近4年的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指出其主要标志是“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权。针对国民党右翼集团大肆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谬论,5月25日,《解放日报》又立即转载了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写给张季鸾、王芸生的《致大公报书》,文章以确凿的事实批驳了《大公报》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呼吁》的社论对“十八集团军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的诬蔑。

从报纸创刊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4年中,《解放日报》的国际版主要是报道战争新闻。当时战争的情况瞬息万变,国内收到的国际资料很少,但《解放日报》对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评论,都能见势快、分析准。

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邱吉尔宣布了要和苏联协同作战。不久,罗斯福也宣布了要增援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分析战争的性质,得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是十分重要的。6月25日和27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指出:“苏德战争已经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性质。”“今天战争的本质已经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全人类的你死我活的决斗。”7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一切为希特勒主义之死亡——论当前战争性质与行动口号》进一步分析道:“苏德战争使战局突变……苏德战争现在是决定一切的主流……苏德战争分明了全世界力量的分野,使从前在欧洲战争中存在着的民族战争,中国的神圣民族战争,都和苏联的正义战争结合起来。这样……正义的解放战争成了决定一切的主导潮流。而且,由于美国的对德战争与苏联的正义战结合起来的缘故,亦改变了它的性质”。在今天,虽然史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阶段的性质存有不同的论析,但《解放日报》在当时苏德战争刚刚爆发后所作出的评论,对人们认识战争的性质,及时改变斗争策略,推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苏德战争的初期,德国法西斯采取闪电式战术,几天之内深入

苏联境内数百公里,这使得一些人对抗战前途产生了悲观心理,有的人甚至怀疑党的路线。对此,《解放日报》在6月29日发表了《苏必胜,德必败》的社论,社论分析了德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指出希特勒的闪电战不可能取胜。7月22日又发表社论《苏德大战第一个月》,进一步从希特勒闪电战的破产断定了德国法西斯的最后失败。果然,为时不久,在8月6日至9月30日的德军第三次攻势中,虽然北、中、南三路继续深入了200至490公里,但平均速度已减到每日4至9公里了。事实证明,红军已粉碎了希特勒的闪电战。此后,《解放日报》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及时报道战争态势。10月21日,报社召开编委会工作会议,博古作了对时局的报告,要求写一篇全面分析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形势,驳斥悲观的论调,增强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10月25日,《解放日报》即发表社论《希特勒败局已成》,从军力、经济力的对比上,断言莫斯科保卫战必胜,并深刻揭露了法西斯的反人民本质,揭示了人民必胜这样一个真理,在抗日根据地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博古在领导《解放日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报道的东西要分析深刻,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他经常召集编辑部同志开会,指出报纸的分析性不够,就起不到指导作用。他亲自为报纸撰稿,他的文章理论性强,思想敏锐,分析深刻^①。

报纸如一面镜子,鲜明地反映出办报人的思想特点。博古早年留学苏联,受过德波林学派的影响,比较崇尚理论研究。《解放日报》创办之初,虽然在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态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政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党的机关报,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对党的中心工作宣传不力,报纸用近3/4的版面刊登国际新闻。版面安排也很死,不是按照实际斗争的需要进行宣传。博古当时曾主张《解放日报》要向

^① 1946年4月21日《解放日报》。

苏联《真理报》学习，每天要有一篇社论。他认为：“每张报纸必须有新闻、社论、通讯报道，缺一便不成其报纸。过去《大公报》、《新闻报》、苏联《真理报》都是如此，好像是天经地义不能变。”^①这一要求不仅导致报纸的社论、评论数量过多，有些社论不得不为凑数而形成，也使得博古等报社的领导人每天为写社论而绞尽脑汁，没有充分的时间深入实际斗争，从而使报纸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另外，有的记者对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基本原则和不真实的新闻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一些报道只追求数量，不注意质量，出现浮夸或失实现象。还有的记者不懂得文艺可以虚构，新闻禁忌虚构，把文艺和新闻混同起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解放日报》存在的问题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说：“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的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②3月中旬，《解放日报》编辑部召开会议，会上一些同志对博古的办报方针提出了批评，特别是批评了报纸向苏联《真理报》学习，每天发一篇社论的做法。一些读者也纷纷来信，批评《解放日报》“最大的毛病是立论空泛”，“和建设边区的实际相距太远”。这些批评，对博古的思想触动是很大的。他自早年投身革命以来，更多的时间是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而且参加过多种报刊的编辑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博古于1937年1月被任命为《新中华》报社的社长，1941年2月又开始担任《解放》月刊的编委。不久，开始筹办《解放日报》并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在长期

^① 陈坦：《回忆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第126页。

的新闻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写作、编辑到排版印刷,他都精通,常常是集写作、编辑、排版于一身。不仅如此,博古还十分热爱党的新闻事业,他常常对人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①。而且“为了这‘终身事业’,他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亦倔强地拒绝休息”。然而,《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却未能发挥出党报应有的作用,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广大的读者都不满意。这使博古不得不进行认真的痛苦的思索。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70多人召开座谈会,请大家对报纸改革发表意见并座谈《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博古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报纸没有能够尽到它应尽的责任,对党的路线没有贯彻,登载群众的活动太少,没有起到组织者的作用^②。

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发表了博古写的《致读者》社论,社论对《解放日报》创刊10个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检讨,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其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的工作的改进”。并且提出党报要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对党的重要政策及党的重大问题,相对集中报导,形成了一定的宣传规模,对群众的各种活动,在显著的位置加以宣传,并尽量采用群众性的通俗语言。

《解放日报》改版后,博古从多方面入手,贯彻党的办报方针,使《解放日报》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首先,他带头深入实际,每天都坚持到报社各个具体部门搞调查研究,对《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亲自审阅,尤其注意报纸的社论,凡是空洞无实的社论坚决不发,社论与消息紧密结合。1942年10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

① 余光生等:《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194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

② 《新闻研究资料》第26辑,第145页。

键时刻，博古几乎每天都去新华社研究新收到的英文电讯。以后，像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苏联对日宣战这样的重要英文电讯，也都是他第一个见到电文，随后直接送中央领导同志。然后他亲自守在电台边，等待各方面有关动态性的电讯，及时进行分析研究。其次，建立业余通讯员网，创造了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好形式。陕甘宁地区大多是偏僻的地区，有利于信息的沟通。在博古的领导下，《解放日报》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业余通讯员网。在延属、三边、陇东、关中五个分区设立了常驻通讯处。并通过编辑新闻手册，定期举办训练班等形式，提高业余通讯员的业务水平。1942年，当一批青年记者被派往各分区《解放日报》通讯处工作时，行前，博古同他们进行了一次热情亲切的长谈。博古说，你们下去以后，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尊重地方上的领导，在工作中求得人家的信任和帮助，这是你们下乡工作的任务之一。接着，博古又讲了“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在平凡的群众里，去找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事物。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入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地把它反映出来。写作的形式和文字要打破老一套的形式，废除新闻八股，要写出老百姓的语言。但是，我们要反对庸俗化的通俗。最后，博古强调了培养地方通讯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仅是带了笔去写，更要培植当地的通讯员。只有依靠广大通讯员，报纸才能有群众基础。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本身业务。我们必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细心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除了现有的特约知识分子通讯员以外，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他打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上去采访，千万不要像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要像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他再三叮嘱大家，要做一个

新闻战士，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的新闻天职^①。

《解放日报》的改版，使博古对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原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博古具有很深的理论修养，源于他博览群书的习惯。“一有空，就是读书。在延安新华书店里，他是一个基本的主顾，凡是外面出的书籍杂志，不论什么，他的一本是少不了的。”^②他知识渊博，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新闻工作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以前由于他重理论而轻实际，思想方法不正确，而当他一旦认识了这一弱点，注意深入社会实际的时候，精通理论的优越性就充分显示出来。这使他能够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上，深刻认识社会实际，更好地总结经验。在《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工作中，博古运用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去指导实际工作，对于报社和通讯社的每一项工作，都能不时提出精辟的意见。在博古的领导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有了重大的变化：在版面的安排上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陈规旧套，而变成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随着《解放日报》的改版，编辑记者的思想作风也有了很大改变，“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成为报社的响亮口号。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赞扬了《解放日报》的历史性进步^③。

博古领导解放日报社的实践活动，特别是《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实践活动，对他思想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他一生思想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不久后在延安广泛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博古参加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的同志对他批评得很严厉，初期他感到压力很大，《解放日报》编委会和报社的一些同志十分关心他，主动接近他，做他的思想工作。博古也经常和报社的同志交谈，暴露思想，在

① 《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61—162页。

② 默涵：《悼念》，1946年4月21日《解放日报》。

③ 《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第18页。

同志们的帮助下,博古“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认识”^①。更加自觉地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从而使报社的同志们更加尊敬与爱戴他。1945年4月至6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进一步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今后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小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②。

1946年2月,中央决定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协宪草的审议谈判工作。行前,报社在延安中央印刷厂礼堂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博古在会上就将来如何到大城市去工作,《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如何准备将来发展成全国的报纸和通讯社作了讲话。他的讲话给报社全体同志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欢送会竟成为他和清凉山同事、战友的诀别会,这次讲话竟成了他留给清凉山同事、战友的最后遗言……

从1941年创刊到1945年,《解放日报》在博古的领导下,组建分社40余个,并形成了一支近3万人的通讯员队伍,使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网络和统一制度与机构。这为后来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 《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第19页。

②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 1975 年的整顿

程中原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在 1975 年整顿向面上铺开和深入发展的时候，邓小平亲自组建的重要机构。它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所作的工作，一方面支持与推动了整顿的展开和深入，另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阴谋，批驳了极左理论，因而为江青一伙所深恶痛绝。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被诬蔑为“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所以，了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活动和斗争，对于研究 1975 年的整顿，以至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都是不可缺少的。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酝酿和组建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于 1975 年 6 月中旬，但早在 1 月上旬邓小平就开始酝酿了。

按照毛泽东关于人事安排的决策，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 1 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 1 月 8 日至 10 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 1 月 13 日至 17 日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随后即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在中共中央 1 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1 月 6 日，邓小平就约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去谈话。其时，胡乔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审查，刚在 1974 年国庆节参加了招待会，还没有作组织结论。邓小平告诉胡乔木：正在

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他提了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还有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谈话中涉及的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还交代胡乔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受命担负党政军领导重任之际，在着手部署整顿的同时，已经考虑到加强思想理论工作的问题了，已经准备为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里夺回来而组织力量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明确提出了任务；亲自挑选了能够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四人帮”作战的领导力量，并要求组织一支队伍；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写出来的文章能够系统解答当前的重大问题，要有论证，能说服人。邓小平同胡乔木的这次谈话，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来讲，是一次重要的酝酿。不过，一切尚在设想和商量的过程中。名义、机构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任务也只是从成立写作班子写文章这一方面着眼。邓小平还没有提交党中央、国务院讨论，他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1975年6月上旬，邓小平抓住机遇，把组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提上了日程。这是因为，一方面，整顿发展到那时，邓小平迫切需要有一个政研室这样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已经进一步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成立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这样一个机构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当时的形势，可以概括为：

第一，邓小平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并在钢铁、煤炭和整个工业交通战线迅速推开。经过短短三四个月的整顿，国民经济面貌已经有了显著改观。与此同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进展，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

6月开始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总之,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

第二,在进行整顿的同时,围绕着所谓“反经验主义”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四人帮”进行了又一次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以反对经验主义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图谋,在这一次较量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鼓吹“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作了批评。4月27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批示,批评了江青等人。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再次批评江青等人,还又一次告诫他们“四人帮不要搞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又于5月27日、6月3日连续开会,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这两次政治局会议都由邓小平主持。这就为邓小平进一步的整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是,毛泽东虽然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评,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这又使得同“四人帮”的斗争十分复杂和艰巨。

按照邓小平的部署,6月以后,整顿要进一步向面上铺开和深入。这就势必要进入“四人帮”长期把持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宣传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无论是整顿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斗争,这两方面都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所以,到1975年6月,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战斗的写作班子,组建一个能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机构,是整顿继续推进的迫切需要。

第三,毛泽东重新起用胡乔木,成为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个契机。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于1967年“五一”劳动节路过胡乔木家,令停车想去看望胡乔木。此事虽然因故没有实现,却从此使胡乔木避免了再受群众揪斗之苦。但康生、江青等人并不

甘罢休，仍然以要搞清胡乔木 30 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为由，把他列入“周扬一案”进行长期审查。直到参加 1974 年国庆招待会，胡乔木才重见天日。其时，中央把继续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来，而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康生这时已病入膏肓，邓小平负责领导这项工作，由毛泽东批准胡乔木参加《毛选》的编辑整理工作。胡乔木从 1975 年 4 月 10 日起接受了第一批需要编辑整理的毛泽东的文稿。这样，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这样的机构，由胡乔木等作负责人，“四人帮”已经没有理由阻拦，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1975 年 6 月 8 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商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有关事宜。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考虑到工作方便，这个机构不设在党中央而设在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班子。关于政研室的组成成员，就是 1 月谈话时提到的吴冷西、胡绳、熊复和原来在整理《毛泽东选集》的李鑫等人。在商量时，邓小平同意胡乔木的提议，增加于光远，但是坚决不同意找“革命造反派”。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分管学部”，就是分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对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一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领导权，将可以同“四人帮”对垒的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

6 月 8 日同胡乔木谈话以后，邓小平即在 6 月 15 日向政治局正式提议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同日，邓小平还向政治局送上关于《毛选》编辑工作的建议，说明毛主席已批准胡乔木参加《毛选》编辑整理工作。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毛选》整理小组。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 6 人外，又增加了邓力群，共 7

人。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以编辑《毛选》为主要任务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政研室的日常工作由于光远、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中南海武成殿办公。

应该指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而是邓小平在整顿的全局上投下的重要的一着。这时整顿已经在好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在经济战线上，邓小平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经他提议，从6月16日起，国务院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揭露“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工作的问题，研究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准备。军队的整顿从6月起正式展开，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重点解决“肿、散、骄、奢、惰”。会议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地方的整顿也由点向面推开。中央于6月2日和7月17日先后批转了江苏处理徐海地区的经验和浙江处理“双突”问题的请示报告，推动了各地的整顿。关于科学技术的整顿，国务院也于六七月间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的报告，并于7月中旬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势所必然地，不仅在其自身担负的经常工作中有力地推动整顿的进展，而且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对1975年的整顿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1975年整顿中的作用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6月中旬成立，7月上旬正式开展工作，到1975年11月“打招呼会”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重点批判，前后虽然只活动了四个来月，但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现分四个方面简述如下。

第一，调查研究，促进文艺调整

就在政研室成立之际，7月初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邓小平从7月2日起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一是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对当时的文艺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还批示对“周扬一案”宜从宽处理。这样，政研室成立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同文艺调整的任务联系在一起。

1975年7月9日，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这是政研室成立后正式召开的第一次负责人会议。邓小平传达了几天前毛泽东同他谈话中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泽东对这些年来主管文艺的江青等人的不满，对恢复百花齐放的期待，溢于言表。邓小平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跃、更繁荣。他要求政研室给他作些调查研究，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方面有关双百方针的材料。因为当时政治局要讨论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而邓小平对这几方面的情况不完全熟悉。

为落实邓小平布置的任务，胡乔木在7月10日召开政研室负责人会议，议论调查研究的题目、方式、分工。认为调查研究大家都要做，工作方式目前主要通过个别联系，从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情况。邓小平交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光远、邓力群负责。会后即开展工作，首先在文艺方面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收获。

一、邓力群向政研室理论组布置调查江青等人鼓吹“三突出”原则，影响“百花齐放”方针贯彻的情况。理论组组长王子野带领小组成员郑惠等查阅1969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不仅整理出了鼓吹“三突出”、妨碍“百花齐放”的材料，而且整理出了一份“四人帮”自1969年11月以来，在报刊文章中有意不提“百花齐

放”，明目张胆地把“百花齐放”从文艺工作方针中砍掉的材料。邓小平在10月4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运用这个材料揭露和批评“四人帮”，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二、胡乔木通过贺捷生鼓励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上书毛泽东，反映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胡乔木又及时把张天民的信通过邓小平转送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还注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和来信人所在单位”。《创业》批示在文艺界迅速传播开来，引起连锁反映，推动了文艺政策的调整。

三、在邓力群帮助下，电影《海霞》编导反映受到“层层围攻”的申诉信经胡乔木、邓小平转送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30日邓小平、李先念等审看此片。当晚政治局讨论决定，《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又一次打击了江青一伙在文艺领域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与《创业》批示一起，在文艺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四、文艺界在学习毛泽东《创业》批示中，对江青等人在文化部的亲信扼杀《创业》，压制群众，排斥异己等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邓力群发现，中央音乐学院一青年教师据会上发言写出的大字报可以看作是典型代表。即交胡乔木送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由于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又连续对文艺工作者上书作出批示，文艺界受到鼓舞，直接上书毛泽东者不乏其人。在政研室负责人过问下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以下三件事：

一、在胡乔木、于光远的支持下，冼星海夫人钱韵玲于9月27日写信给毛主席，建议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举办人民音乐家

冼星海和聂耳的纪念音乐会。毛泽东表示赞成。1975年10月25日，纪念音乐会隆重举行，成为继《创业》批示后1975年文艺调整中的又一个高潮。

二、胡乔木于10月23日转呈了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写于10月19日），汇报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写作情况及存在的困难。毛泽东11月2日写下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由于毛泽东亲自关怀，姚雪垠即从武汉调至北京。粉碎“四人帮”后，《李自成》第二卷初版和第一卷修订版于1977年2、3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由此复业。

三、10月28日，周海婴写信给毛主席，反映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请求帮助，希望早日出版一部收入现存鲁迅全部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毛泽东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人们当时不知道，周海婴此举得到了胡乔木的支持。写信前，周海婴曾向胡乔木请教，得到胡的指点和支持；信写成后他又到胡乔木家中，请胡修改、润色。这封信最后也是由胡经邓小平呈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周海婴信的批示，使张春桥、姚文元等百般阻挠公开出版鲁迅全部书信的倒行逆施无法再继续下去，也改变了《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到1976年鲁迅诞生95周年之际，一部包括已经收集到的1381封书信的《鲁迅书信集》终于问世。此后又过5年，到1981年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时，在胡乔木领导、林默涵主持下完成的一部16卷本的《鲁迅全集》新的注释本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上述促进文艺调整，发生重大影响的事情之外，政研室在落实邓小平布置的调查搜集教育、科技、出版等情况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第二，代管学部，恢复业务工作，筹办《思想战线》

一，邓小平确定学部的组织领导关系

代管学部，是邓小平亲自交给国务院政研室的任务。“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时下设13个研究所，2个研究室，有工作人员2000多人，其中干部和研究人员1800多人。它原由教育部代管。“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是重灾区。整顿教育的任务十分繁重，再要代管学部，力不从心。所以，政研室组建之初，邓小平就提出政研室成立后要“代管学部”。他把这项任务交给政研室，可谓知人善任。6月29日，邓小平再一次向胡乔木明确交代，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他同胡乔木一起商量，确定了学部的组织领导关系。学部的业务工作由政研室管，分工由胡绳负责；政治工作由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厅管。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由政研室指导。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当时的主要报刊，如《红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都被“四人帮”控制。在一时难以夺回的情况下，要从思想理论上宣传“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和支持整顿，只有另起炉灶，创建自己的阵地。

邓小平6月29日同胡乔木商谈后，立即要中央组织部提出学部领导机构人选，同时委托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政工组、办公室和教育部等相关单位开会，把重新确定的对于学部的管理分工正式通知执行。

7月16日，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组发表学部领导机构名单，由郭沫若任主任，调林修德、宋仰峤、宋一平3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学部工作。国务院于8月30日对学部的组织领导、人事安排发出文件正式通知。

二、学部的工作方针和整顿措施

7月17日，胡乔木即召集3人小组开会，对学部当前状况作了分析，对整顿学部的方针、当前的任务提出指导性意见。胡乔木这次谈话的要点是：一，学部各个研究所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基本结束，已初步实现安定团结。二，工宣队、军宣队已基本完成任务，

现在就可以撤走。三,学部下乡下厂的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7月底全都回来。四,要逐步恢复科研。学部有一定的科研力量,专业力量较强,“文化大革命”以来科研工作已经停了八九年,要逐步恢复。五,科研不能再走老路,但对老路要有分析。六,学部原来出版的20多种刊物,要恢复,可首先考虑恢复和办好综合性刊物。胡乔木最后对领导小组3人分工提出了意见,要他们立即开始工作。

7月21日,林修德、宋仰峤、宋一平3人到学部任职。7月下旬,就把工宣队、军宣队送走,把下乡下厂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全都撤了回来。学部各个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逐步恢复。3人临时领导小组贯彻了邓小平关于整顿的精神和胡乔木关于学部工作方针的指示,在会议上,在实际工作中反对空头政治,反对片面性。强调政治是灵魂,但政治不能脱离业务,要渗透到业务中去。研究人员要掌握资料,掌握外文,下功夫读书。对学部17年全盘否定不妥,要一分为二,不要再讲和17年对着干。新路老路要看实质,开门办所要从实质上理解,与工农兵一起写书、编词典也是个极端。他们还在两个研究所进行试点,着手组织整顿,酝酿让知名学者参加研究所的领导工作。

在学部初步恢复正常后,国务院政研室主要通过让学部领导参加重要活动和政研室负责人直接指导的方式,推动学部的整顿,发挥学部的作用。

1975年6月中旬,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7月起分10个小组进行专题研究。政研室通知学部领导参加文教规划小组会议。这个小组按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研究了文化教育长远规划的方针、政策、综合平衡、奋斗目标 and 重大措施等问题,提出要从指导思想等方面解决不少单位不敢提智育、文化,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忽视基础科学,以及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等倾向。文教规划小组会议于8月15日结束。学部召开了各所、室负责人参加的务虚座谈会,传达了文教规划会议简报。8月22日,胡绳到学部讲话,他传达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精神,指出要以三项指示为总纲

来看形势、看任务，强调要安定团结，完成斗、批、改的任务。明确指出，“改”，就是要从事业务工作，恢复科研。科研要面向现实，联系实际。可以不提开门办所的口号，因为对这个口号不同观点会有不同解释，会造成混乱。经过8月务虚会，从上到下进一步明确了学部的工作方针。

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并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也通知学部领导成员列席。会后列席者立即向学部领导小组、办公室、政工组负责同志传达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讲要给科研人员解决房子、孩子入托、夫妻两地分居等困难，学部有关部门即开始采取措施逐步改善；讲应该关心支持专家学者，学部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讲刊物太少，就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恢复刊物。这些举措，使学部广大知识分子重新恢复了对科研工作的热情。

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国务院政研室开列了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名单。学部有21人出席，包括专家学者18人，领导干部3人。此举引起强烈反响，认为国庆招待会体现了安定团结的方针，体现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学部政工组将出席招待会的学者吕叔湘、任继愈、俞平伯、顾颉刚、冯至、何其芳、丁声树、吴世昌、贺麟、韩幽桐、傅懋勳、严中平等的反映整理成简报。胡乔木看后感到很有代表性，即报邓小平并建议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16日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一批语，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实。

三、筹办《思想战线》的指导思想和措施

对创办刊物，邓小平十分重视。6月底国务院政研室刚成立，他就提出了这项任务，以后曾多次催办。1975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科普杂志《化石》编辑张锋给他的信上加了“一封诉苦的信”的标题，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邓小平在9月19日就对胡乔木说：《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

性理论刊物还会不关心？再次催促胡乔木赶快把刊物办起来。

9月22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拟就创办刊物的请示报告。关于创办刊物的缘由，报告说：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哲学社会科学部已经逐步恢复业务工作。学部所属各研究所过去出版过的杂志，只有《历史研究》、《考古》、《考古学报》仍在出版，其余都已停刊多年。现在除准备按照需要和可能逐步出版各种分科的杂志外，打算先出版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名称确定为《思想战线》，性质是理论性、批判性、讨论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刊物拟于年内出试刊，1976年1月正式出版。胡乔木接到后，即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指示抓紧筹备，说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还要求《思想战线》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交中央和国务院审查。

这个请示报告经胡乔木改定后，于10月4日上报国务院并转报中央政治局。5日，毛泽东圈阅同意。6日，胡乔木就同学部临时领导小组3位同志谈话，专门讲怎样办好《思想战线》的问题。他要求把《思想战线》办成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理论性的刊物，办成能代表党的路线的、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文章的选题与质量，都应与我党目前在各条战线上的方针任务相适应。编辑部要与党、与各个实际工作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把他们工作中的问题，转换为我们的选题、文章。要把实际工作中、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来阐明，来解决，而不是无的放矢，废话空论。写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刊物的作者应当是全国范围的，要搞五湖四海，打破那种小圈子习气。群众并不要求那些一窝蜂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与其写不如不写。胡乔木的谈话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控制的报刊宣传，提出了同“四人帮”对立的办刊方针和方法。

当天下午，胡乔木又同负责办《思想战线》的同志具体谈了刊物的选题。在教育方面，他提出，要从理论上阐明列宁反对自发性的观点，阐明毛泽东的实践论的观点；封建主义的师道尊严要破

除,社会主义的师生关系要建立。关于科学技术,出了科学和政治、科学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题目。经济工作方面,提出要区别关于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技术至上的正确了解和歪曲了解,要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把生产搞上去等等。

学部在10月上、中旬召开各所、室负责人座谈会,讨论胡乔木的谈话。认为胡乔木10月6日的谈话,不仅对办好刊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当时的现实斗争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部的整顿应从创办《思想战线》这个头等大事抓起。这是整顿学部的突破口。在思想战线上树立什么旗帜,对当前思想战线上斗争的焦点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怎样解决,只有把这些问题认识清楚,正确解决,学部的整顿才能顺利进行,取得积极的效果。在十月座谈会后,《思想战线》的筹办工作加快了步伐。编辑部调集了60多人,提出了明年第一季度三期的选题计划,并落实了大部分选题的作者。试刊和第一期的稿子大多印出了清样。一个崭新的刊物即将诞生了。

就在这时,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在受到批评、攻击的情况下,还指示胡乔木要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但终于无法抵挡这股逆流。1976年1月17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不得不写报告给国务院,请求解除委托政研室“指导学部的业务工作”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思想战线》终于未能出世,学部的整顿也被迫中断,而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的3位领导同志,也就成了批判的重点。不过,政研室代管学部和筹办刊物的工作并没有白做。它在一定程度上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建及其在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三,协助修改《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提纲》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是1975年整顿进入通盘地

解决各条战线问题的产物,体现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策略。邓小平指导制定这两个文件,是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推动即将到来的全面整顿:一是在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条》指导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一是在科技文教领域,以《汇报提纲》来指导和推动科技以及文化、教育各部门的整顿。进入8月以后,协助修改这两个重要文件,成为国务院政研室的主要任务。

一,协助修改《工业二十条》

制定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是国务院召开的计划工作务虚会于7月提出的。要求国家计委在国务院领导下起草。起草工作先由主管工业和计划的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后来又由常务副总理纪登奎抓。《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初稿于8月初写成,共14条。

8月8日,邓小平要求政研室参加对工业条例的修改。在这之前,胡乔木等已经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企业领导体制和企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邓力群、于光远参加了计划工作务虚会,并且是10个专题小组之一的理论组的召集人。8月18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工业条例,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也出席了。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谈话。会后,这个条例的修改即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邓力群、于光远同计委的房维中等同志参加。

胡乔木在主持修改过程中,对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和邓小平在讨论会上讲话的精神,作了不少精彩的阐述和发挥。他强调这个工业条例要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整个文件要以现代化为红线,拿25年实现现代化的红线贯串起来。文件一开始要大讲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迫切性,要迫切陈词,说明同外国比,我们已经落后了几十年,一定要争时间,抢速度,浪费时间就是犯罪,说明加快发展既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要把现存问题的严重性摆出来,使人不能容忍,感到非整顿不可。胡乔木还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搞乱了的一些突出问题指出:要把加快资金积累同加快发展速度联系起来,放在文件前面讲,说明这不

是“利润挂帅”；学习外国才能加快速度，这个道理也要放在文件开头讲；整顿企业一条，要增加内容，要批判无政府状态，说明搞无政府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在体制方面要强调反对党委书记一长制，建立企业中独立的生产指挥系统；要理直气壮地说明一定要实行按劳分配，开展劳动竞赛；等等。

在胡乔木主持下，对条例进行修改。条例全文从原稿的14条增加到18条。增加的主要内容是：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采用先进技术，引进高、精、尖的新技术、新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矿产品的出口；坚持质量第一；坚持按劳分配。对原来已有的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严格管理制度等条都作了充实。例如，“整顿企业管理”这一条，加写了一段话，说明建立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和健全强有力的能够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和精干的职能机构，同群众管理结合，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党委的集体领导，不应当妨碍负责生产的领导干部行使职权，相反，一定要反对无人负责，反对无政府状态。”

修改稿完成后，9月交给在北京召开的二十个企业座谈会讨论，10月又拿到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12个省、市委书记中去征求意见，得到普遍赞同，都希望尽快成为正式文件下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适时的文件，符合实际情况。有了这样一个“章程”，进行整顿有所遵循，加快发展工业就有指望了。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房维中等，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又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和修改。于10月25日完成。全文共20条，简称为《工业二十条》。“四人帮”出于他们的用心，1976年8月拿出来作为“大毒草”批判的只是9月2日讨论稿的一个颇多错漏的本子。

《工业二十条》可以说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的继续和发展。它概括了计划工作务虚会的讨论成果和工交战线初步整顿的经验，提出了整顿企业、加快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

施,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造成的混乱和灾难的纲领性文件。这就势所必然地引起“四人帮”的不满和抵制。在10月29日国务院会议讨论这个条例时,有人提出文件太长,且没有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于是,胡乔木在会后又作了一次修改,于11月3日完成。本拟交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下发,但这时形势突变,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这个文件也就压了下来,既未交付讨论,更没有下发。但是,它的主要精神已经在整顿中得到一定的贯彻,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而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为指导工交战线的拨乱反正,于1978年4月20日作出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则是同1975年的这个条例一脉相承的。

二,协助修改科学院《汇报提纲》

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先是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1975年5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批准国防科委的战略导弹核武器规划时,就批评了七机部的派性斗争,要他们限期整顿。6、7月间,国务院提出了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7月中旬,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要求他们尽快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他们7月18日到任后,经过20多天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经过院内外广泛征求意见,修改了两遍,将第三稿上报。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稿不大满意,认为全文太长,思想性不够,文字过于尖锐,也比较陈旧。遂于8月26日找胡乔木商讨修改意见,要胡乔木同胡耀邦等一起议论一下,由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

(一)胡乔木对科学院讨论稿的修改

在这之前,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研室已经按邓小平的布置,对科技界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整理了首都科技人员、鞍钢科技人员情况等汇报材料。8月26日谈话后,就接手主持修改这个汇报提纲,吴冷西、胡绳参加。

科学院的讨论稿分六个部分,胡乔木提出的修改意见,主要有

这样三点：

1. 讨论稿第一部分“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要更为鲜明些。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科学院和科技工作的发展方向和任务。具体的提法是肯定建国以来，即1949—1975年以来“二十六年”的成绩。肯定了“二十六年”，也就把“十七年”包括在内了。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同“文化大革命”初期否定“十七年”唱反调，虽然用的是曲笔，也是非常大胆的。

2. 讨论稿已经引用了不少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有的是在第三部分“关于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有的散见于其他五个部分。胡乔木提出，要把毛主席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指示集中在一起，并重新编排，再补充征引若干，使之成为较有系统的10条，作为科学院工作和整个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

3. 讨论稿的第二部分“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第四部分“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第五部分“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第六部分“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归并作为一个部分，大加压缩，用整顿来统率。

胡乔木亲自动手，于9月2日改好，题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全文由六部分变为三部分。即：

1. 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在这一部分里，肯定“二十六年来”中国科学院“取得了很大成绩”，指出科研工作如不加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的速度，提出作为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里根本任务的三个方面：协同各有关部门，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

2. 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这一部分从十个方面引用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论断和指示，还辩证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

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说明必须系统地、准确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防止和克服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

3. 提出科学院整顿的5项内容:①结合实际,认真学习,揭露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②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③,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④,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⑤,整顿机构。

(二)国务院会议讨论后对《汇报提纲》的修改

9月3日胡乔木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面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比较满意,说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即印发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准备讨论。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汇报,讨论《汇报提纲》。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参加。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很多重要意见。他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前面,不能拖整个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整顿的关键是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班子要三套人,管党的、科研的、后勤的三部分人。邓小平对《汇报提纲》的修改还提了若干具体意见,说经过修改后送毛主席并印发政治局,若毛主席批准后,将用这个文件发动科技战线的群众。

按照这次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和讨论时的意见,胡乔木等很快又修改了一遍。主要是:

(一)关于队伍,把全国各专业研究机构五个系统(科学院、中央各部委、高等学校、地方、国防科工委)都计算在内,共约25万人。

(二)明确指出要选拔科研人员,特别是有水平的中年知识分子,担任正副所长等领导职务。

(三)明确科技大学要从优秀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

(四)整顿的内容增加了“整顿科技出版工作”一项。

(五)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段作了修改,在写明一定要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应该积极组织科研人员自觉地学习和运用辩证法的同时，明确指出：“不注意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有了哲学就可以不要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以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学实验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

9月28日，《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修改完成后即报送毛泽东审阅。这时，毛远新刚在9月27日同毛泽东谈过对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不满意的意见。对《汇报提纲》中引用的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毛泽东约在10月13日对邓小平说，他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而就在毛泽东对《汇报提纲》不满的时候，邓小平又于10月15日前后将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信转给毛泽东。形势由此逆转。等到毛泽东于10月下旬把《汇报提纲》退回，胡乔木再作修改，邓小平已经在政治局内受到错误的批判了。所以，《汇报提纲》的最后一次修改稿（第六稿）最终压在邓小平处没有再送上去。而1976年8月“四人帮”拿出来大张挞伐的，只是这个文件最初的一个讨论稿（8月11日）。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刚开始恢复工作，就首先抓了科学和教育两件大事，认为我国赶上世界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又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提出了建立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的任务。可以说这次大会制定的《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是1975年整顿中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1975年的《汇报提纲》则是科技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一个先导。

第四，撰写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一，酝酿和写作的经过

八九月间，政研室本来把注意力放在写评论《水浒》的文章上。9月10日，邓小平同政研室7位负责人谈话，强调要全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批评现在的宣传（即“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有很大的片

面性。要求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这次谈话触发了胡乔木想要写一篇全面论述和宣传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的文章。过后几天，他又读到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胡乔木感到为全面整顿作思想理论准备，也很需要写这样一篇文章。9月18日，胡乔木即找邓力群商量。邓力群欣然同意，接受了写这篇文章的任务。胡乔木指出，文章的主题是全面宣传三项指示，集中精力进行全面整顿，促成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二天，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拟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打算。邓小平表示赞成，要他们抓紧写出来，并说，如果文章写得好，可以约几位副总理研究一下，送毛主席审阅同意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9月20日，胡乔木把邓小平的意见向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负责人作了传达。

邓力群立即找人一起动手，把1975年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收集起来加以研究，还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就贯彻执行三项指示的情况和文章的写法开了两次座谈会。拟就提纲后由四人分两组并行作业各写出一份草稿。邓力群看了这两份稿子，都不满意，决定重写。由邓力群口授，苏沛、滕文生记录整理成文，再由邓力群改定。10月7日文章完稿，题目也由邓力群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

二、《论总纲》的主要观点

《论总纲》这篇文稿相当集中地阐发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思想，它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全面论述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的内涵和相互关系，阐述了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既有深刻的说服力和强烈的号召力，又有尖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这篇论稿突出的主要观点是：

（一）指出毛主席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

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在当前,必须“用这个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其关键在于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克服软、懒、散,清除个别坏人,调离长期闹派性者。同时,要在全党范围内整顿党的作风。

(二)提出检验学习理论成绩好坏、大小的“唯一标志”是:“就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文稿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指出,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这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以及干部工作好坏成绩大小的标准。

(三)指出当前斗争的特点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总是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要彻底揭露他们在“造反”、“反潮流”的旗帜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要彻底揭露和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安定团结。

(四)总结、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4个要点:我们的干部既要学会搞阶级斗争,也要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其核心是责任制,要把建立责任制作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论总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整顿的方针政策，探索了当时的中国怎样摆脱动乱局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路径，称得上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姚文元对该文写了47处批语。按照“四人帮”定的调子，《论总纲》被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571工程纪要的翻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还说《论总纲》是“文拳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它同“四人帮”的极左理论的尖锐对立。所以，当“四人帮”把它作为“大毒草”提供给全国人民进行批判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反而从中更看清楚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的整顿，代表了人民的愿望，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说明了他们站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一边。

综上所述，在1975年整顿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顿在文艺、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以至工业交通等部门的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和帮派活动，出色地担当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助手和参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一)

“文化大革命”晚期的 1974 年，邓小平恢复了中央领导职务，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 8 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并立即按照邓小平的统一部署投入了对中科院的整顿工作。他深知，建国后的许多年来，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 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的提议，党中央才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的负责人说，建设新中国必须渡过“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没有大批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当时有人说，“许多知识分子只埋头钻研业务而不问政治”。胡耀邦说可不能一刀切地这样看，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主要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他说可以把这归纳成 12 个字，叫做“抬头瞭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他到了中科院后，与核心领导小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他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

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实情，恢复了周总理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不久，涌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他随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他觉得我们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了呢？

归根结底，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个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个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奔向四个现代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曾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耀邦家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他还请叶选宁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华国锋同志。

可是，此后不但久久未得到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

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论却在 1977 年 2 月出台了。

对此,当时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直接了当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3 月 14 日,耀邦去见邓小平,他对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小平和耀邦谈了很多话。

从此,耀邦决心全身心地投入推倒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斗争。

(三)

1977 年 3 月底,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首先召集党校内一些思想解放的“笔杆子”和《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开会,对他们说,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展!由此,一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初稿,就这样出来了。耀邦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并和这些同志一起陆续修改了 17 次才定稿。

1977 年 8 月 18 日,党的十一大闭幕,邓小平被恢复了一切领导职务。但是,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但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而只统统地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

这时耀邦感到,发表已经写好的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

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脏、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道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前面,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地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仅1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了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认为这下大家可盼到大天亮了。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见到“大天亮”,还非易事。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的一些同志对落实干部政策仍在“顶牛”。针对这一情况,耀邦对《人民日报》的同志和文章作者说:“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而且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是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耀邦还指示他们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

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定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下一步，我们就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极左思想和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耀邦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这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说明：许多干部群众热烈赞扬第一篇文章的同时，也愤怒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而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就拖，得推则推；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委，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以致这帮派体系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还在暗中活动，欺上压下，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同时第二版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5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对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1977年12月初，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竭力举荐下，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重新成了“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四)

然而干部政策的落实工作并不蓬蓬勃勃,因为一些固有的观念仍在桎梏着许多人的头脑。

还是在中央党校的时候,耀邦就率先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并指导他所倡导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了一些文章。

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应《光明日报》之约,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与此同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受室主任吴江委托,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不谋而合。

《光明日报》负责人得知,请孙长江将两稿合成一文,题目仍用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隆重推出了这篇重文。新华社当天全文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这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但在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砍旗”、“丢了刀把儿”、“反对毛主席”,会“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就在耀邦受到如此重大压力时,邓小平出来讲话了。当年的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思潮,极其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使耀邦感到增添了强大力量。

6月30日,《理论动态》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经耀邦审定、署名“岳平”(特约评论员的偕称)的文章——《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文章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对一切反对“真理标准”的种种议论作了总回答。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长张平化谈了话,要张平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再一次对于“真理标准”的讨

论，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7月22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了一个多小时，给予鼓励打气。邓小平说，“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很好地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由此，“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统治中国多少年的左倾理论，以及妄图在新时期继续坚持这种危害深重理论的“两个凡是”论，顷刻间摇摇欲摧。

（五）

然而一些曾轰动国内外的重大冤案的平反，仍然一时难以展开。因为这些冤案的形成，都是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或圈定，又全都由“中央专案组”直接查办的，已经恢复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的中央组织部一时难以过问。但早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之前，胡耀邦刚刚进入中组部的时候，他就筹划着要从薄一波等“61人案”打开这一难关的突破口。他对中组部的个别同志说，必须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头上的这口大铁锅。

恰巧，与“61人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申诉人名叫王先梅，“61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时才22岁。“九一八”事变他17岁，在北平读大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担任一个支部的书记；1933年1月加入共青团，同年7月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从事兵运工作，他就毅然离开大学，去国民党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积极物色并发展军人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遂奉党的派遣，去

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

“文革”中王其梅于1967年8月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1938年14岁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共产党的老同志，被下放到她所在的轻工业部江西“五七”干校。

“文革”结束后，王先梅于1977年12月8日向邓小平写了申诉信。邓小平收到了这封信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这一批示等于给胡耀邦解决“61人案”一个有力的契机。

汪东兴看到邓小平的指示也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批示过的这封申诉信，立即委派中组部一位副局长王建梅和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了住在右安门的王先梅，向王先梅传达了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提出：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就回到了轻工业部，担任科研室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几个孩子也都安排了工作。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的信（摘要）》，并配发了该报评论员的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了头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也看作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他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

（六）

然而当耀邦向当时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写信提议，是不是把“61人案”等重大案件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时，得到答复却是“61人案”的问题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

为了使这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61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此案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未几，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61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的一封材料中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这一下，终于为中组部争来了复查“61人案”这样重大案件的尚方剑。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4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经过4个多月的奔波忙碌，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走访了“61人”中的许多当事人和当年北平地下党向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及北方局决定的有关人，中组部于1978年11月20日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后说：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

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61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宋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

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刷之后,彭德怀、陶铸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诬陷中被昭雪平反。

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这一系列决定。雷厉风行的胡耀邦即刻回到“党员之家”研究部署:迅速从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处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的善后;有些同志病老伤残不便行走,组织部的同志要一一前往拜访,加紧解决他们的一切困难。

这一切,后来都像耀邦一再叮嘱的那样:快刀斩乱麻似的一一得以实施。

从此,“两个凡是”被彻底推倒;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和落实各方各面的政策在全国普遍展开;全国人心为之大振,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致陈乔年等的一封信

王若飞

编者按：此信是王若飞同志从苏联回国途经海参崴时，于1925年4月5日写给当时担任中共北京区委书记的陈乔年等同志的信。这件珍贵的文献资料的原件，现存于中央档案馆。1996年10月11日是王若飞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鉴于已公开发表的此信有个别纰漏，我们对其进行了校正和注释并予刊登，以表示对王若飞同志的深切怀念与纪念。

乔年转 бюро^① 同志：

到此已一星期。初以为，据 мисоловски^②之言不过三五日即可有船开上海。乃昨夜所得消息，则现因上海审判问题，十号以内不能有船开上海。我们在此最少尚有一星期以至二星期的停留，经崴既不顺手，改道又不可能，心中极不耐烦。然急又何益……

海参崴小组情形及想请求中央留莫斯科回国的一二得力同志驻崴作党的学校教育工作事，大口^③前信已经说过，我是极赞成此事的。以往派中国工人同志到莫斯科读书，常发生下列的许多困难：1、路费难筹；2、家庭的维持无着；3、最得力的同志不能在俄久留。现如能在崴设校，教育期限不过三月至六月，而地方又距中国甚近，来往输送亦易设法，则我们将能在很快的期间，使我们许多

① 俄文本意为“局”，此处似指中央局或北京区委。

② 一名叫米索洛夫斯基的俄国人。

③ 指罗亦农。

忠实勇敢的工人同志均得到受列宁主义训练的机会。在初办时，自然仅系沿海省负担经费，俟数月稍有成绩，再求扩充发展（或成为 КУТВ^① 的分校或成为 КОМИНТЕРН^② 的学校）是很可能的事。至于担负教育的人，我以为季达^③ 姐姐和阳明夫子很相宜。决定之权自在中央，不过我可贡献一点意见。

团体中坚分子在你们指导之下必能更加努力，更加进步。惟落后分子之有某一方面长处者，我想单独的给他们写信，从旁促进他们对于党的观念，提高他们革命的情绪，或许可收点训练效果。又，合林与仁先既很快就要回国，而他们如能在最近期间较前进步，可于回国时把他转党。这纯是从国内工作的方便与利益上着想，并且我们以后并不是无法监督他，甚至清洗他。

凡我们所写的信无论全体的或个人的，如有可以刺激同志们革命情绪的，均可公开。这也是训练方法之一种。

我闷的慌且有点伤寒，常睡觉。有精神时再写。

若 飞

四月五号

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或东大。

② 即共产国际。

③ 季达，指李季达，化名李吉荣。四川省巫山县人。1921年1月20日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9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转中共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的党员，后受党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4月回国。曾担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6月中共顺直省委成立后任宣传部长、工人部长兼天津市委第一任书记。同年8月被捕，遭敌人杀害。

我的祖父孙中山

孙穗芳

1996年11月12日是先祖父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我应邀回国参加各届的纪念活动。作为孙中山的孙女，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

先祖父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开创世纪奇迹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了不起的民族英雄和著名的道德领袖。他在继承中国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贯大道的基础上，将五千年文化之精华和中华文明之道统发扬光大起来，并撷取欧美政治、科学之精粹，融汇世界民主理论，再加选择和创造，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套思想体系。这套体系包括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等思想、学说和方略。

先祖父思想体系中最辉煌、最精华的部分是他制定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这是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

先祖父在讲述三民主义时提出了“五权宪法”，这是他的一个重大贡献。祖父认为西方只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宪法是不完备的，从三权之中分立出行使弹劾官吏的监察权，再加上中国早已有之的选用官吏的考试权，才能构成一部治理国家的完善的机器。

先祖父的三民主义，是以“孙文学说”推动心理建设，以“实业计划”推动物质建设，以“民权初步”推动社会建设。祖父在《孙文学说》中阐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克服民族自卑的心理障碍的重

要思想；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时进行，发展实业必须借用外资外才的思想；在《民权初步》中，论述了民权方式不外投票和会议两种形式，人民有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权利，从中央到地方各种不同的立法和民主参与程序等思想。这些思想大大丰富和完善了祖父的“三民主义”。

先祖父的三民主义是救国、治国的宝典。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他领导同胞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祖父为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统一，为促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无私地奋斗了一生。他在临终时仍在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祖父大公无私的革命思想和爱国精神必将激励广大同胞团结起来，实现他救国的崇高理想，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祖父的思想和实践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出不朽的光辉。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孙女，我更深深体会到他的思想、学说、方略是中国近代极其丰富的思想宝库，其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发扬光大。出于对先祖父由衷的崇敬之情和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关心，我自1980年起，30余次来到祖国大陆，并多次踏着先祖父在各地的足迹，搜集资料，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写了《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愿此书的出版，能使先祖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教义和崇高的为人品德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以促进祖国统一，建设中国并达到世界和平。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先祖父对中国固有的优良道德传统极其重视，一贯主张以人格治国、以人格救国。他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他认为，要培养好的人格，每人都应“从自己的方寸之地

做起”，通过磨炼和修养，“把自己以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重温先祖父孙中山先生的教导，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如果我们全民族的思想素养和道德素养真正得到全面提高，中国在新世纪中的前途一定光明辉煌！

很多人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海峡两岸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有责任发扬光大先祖父的思想和精神，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大前提，团结一致，勤奋努力，振兴中华。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也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永远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祖父郑洞国的一生

郑建邦

我的祖父郑洞国先生辞世已经6年了。他早年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师长、军长，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东北行辕副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等重要军政职务，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归向人民。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水利部参事，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务，1991年1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本文仅就他一生的某些重要经历和在中国共产党关怀、教育下思想转变的过程，以及他后半生积极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情况做些介绍，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

驰骋疆场 战功卓著

1903年，我祖父诞生在湖南省石门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从青少年时代起，他痛感国家贫弱，政治黑暗，努力寻求救国道理。1919年春，“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正在石门中学读书的他和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并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1924年初，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感召下，他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望，毅然投笔从戎，千里迢迢地从长沙奔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了20余年的戎马生涯。据说，当年我祖父历尽艰辛转辗来到广州时，黄埔军校的招生报名期已过。碰巧他的湖

南同乡黄鳌(中共党员、红军早期将领,1929年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阵亡),为防备一次考不取,报了两个名。我祖父就顶用他的名字参加了考试,结果双双考中。谁知入校后,两人又同分在一队,每日出操点名,两个人往往同时应声而答,同学们都觉得诧异好笑。此事对我祖父压力很大,于是向上级如实汇报了事情经过,要求重新单独进行入学考试。但校方表示谅解,并将其名字更正过来,这才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我祖父素以爱国、敦厚、勇猛、稳健、擅打硬仗而著称。第一次东征战役攻打淡水时,他加入奋勇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攀越云梯,率先登城,在黄埔学生军中崭露头角。北伐战争时,他参加东路军作战,在永定、松口等战役中担任主攻,由于作战勇猛、指挥出色,不满24岁便升任团长。1933年春,日寇悍然深入热河,进犯长城各口,狂妄叫嚣要“在一星期内摧毁华军的所有抵抗”,我祖父时任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率部参加古北口战役。在古老而残破的长城上,殊死鏖战两月余,狠狠打击了侵略军的气焰。我祖父由此成为最早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之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祖父转战南北,身经大小百十战,屡建战功。“七七”事变后不久,他率第二师参加平汉路北段的保定会战。在友军相继撤退,后路亦为敌骑兵包抄的情况下,他以孤军死守保定城及漕河一线,与敌血战两昼夜,城破后仍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直到敌人即将包围了他的指挥所,才在部属力劝下突围转移。当时因与友军的通讯联络已中断多日,后方不少人认为我祖父在保定全军覆没,一些报刊还发表了他“成仁殉国”的消息。

1938年春,我祖父奉命配属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开赴鲁南参加徐州会战。不料第二师刚抵达徐州附近,战局即发生突变,滕县(今滕州市)已为日军攻陷,川军第一百二十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以下2000余官兵全部殉国,敌人乘我徐州正面空虚,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准备袭占徐州。考虑到军团主力已来不及实施原定在鲁

南运河以北临城之线集结歼敌的作战计划，我祖父果断报请上级变更部署，同时命令先头部队连夜抢占运河南岸阵地，掩护友军集中。次日黎明，日军已源源涌至运河北岸附近之韩庄，正以优势炮火压迫我少数警戒部队节节后退，马上就要渡过运河。我祖父率师主力于千钧一发之际赶到，当即以猛烈炮火迎头痛击，杀伤大批日军，并摧毁其渡河器械。双方隔河激战终日，日军多次进攻均被挫败，最后被迫以主力东移，转攻台儿庄，这样就为我军调整部署，确保徐州，争取了宝贵时间。为此，第五战区长官部曾嘉奖第二师的出色战绩。此后，我祖父又率部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峯城的激烈战斗，与友军一起赢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日军于台儿庄溃败后，中国军队乘胜追击退守峯城之敌。我祖父奉命率第二师攻击峯城附近的重要制高点九山。鉴于九山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地形险要，而且日军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易守难攻，第二师多次强攻未能奏效，我祖父遂以“精兵夜袭”的方式，挑造数百名精壮士兵，趁夜幕掩护潜入敌阵突袭日军，经激烈战斗一举夺占九山，予敌沉重打击。

徐州会战后期，日军陆续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三十余万兵力至徐州战场，中国军队被迫防御作战。我祖父率迭经苦战、已伤亡近半的第二师担任邱县以北之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日军浴血鏖战二十余日，阵地寸土未失，直至奉命撤往后方整补。在此作战期间，他为便利后方交通，曾命所属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上铺设了一道浮桥。徐州失陷前，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中国野战军主力十余个师，赖此桥脱离了战场。

1939年底至1940年元月初的广西昆仑关战役，是中日两国精锐军队间又一次罕见的殊死较量。当时我祖父担任国民党政府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率部与该军第二百师一同担任战役主攻任务。这时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十二旅团，已攻占昆仑关天险，并构筑了重重坚固工事，企图固守待援。我祖父指挥荣一师，在友军的支援配合下，不顾

重大牺牲，勇猛冲杀，血战兼旬，迭克要点，两度攻入昆仑关，并击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为最后歼灭该敌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敌我双方为控制位于昆仑关西南的重要制高点“四四一”高地，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由于连日攻坚作战，我军各部队伤亡极大。我祖父为顾全大局，不顾自己部队损失惨重，主动派出一团兵力在友军炮火支援下攻克了位于昆仑关东北的另一重要制高点界首高地，同时指挥所属其他部队全力与日军争夺“四四一”高地。日军为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犹如输红了眼的赌徒，调集重兵，在飞机掩护下，孤注一掷地向已为我军控制的“四四一”高地主峰发动三面围攻。荣一师官兵头顶敌机的狂轰滥炸，与日军剧战数昼夜，阵地屹然不动。最后日军竟狗急跳墙，惨无人道地向我军施放毒气，继以陆空协同，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守军伤亡殆尽，被迫退至高地北侧死守，阵地危在旦夕。这时，连我祖父手下一位惯打硬仗的团长也沉不住气了，在电话里连连告急，请求撤出阵地。我祖父却从容镇定，厉声命令该团长坚守高地，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也不准后退半步，否则军法从事。同时将师部特务连和传令兵、伙伕，以及部分主动请战的轻伤员迅速组织成一支突击队，利用暮色掩护向敌侧背发动凶猛反击。日军猝不及防，在我军突然夹击下死伤枕藉，残部仓皇溃败，荣一师遂将昆仑关周围这最后一处重要高地稳固占领。该役我军全歼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中村正雄少将以下四千余人，缴获各种火炮、枪支弹药和辎重不计其数，不但狠挫日寇凶焰，打出了我国国威，也大大鼓舞了大后方军民的抗日信心。

昆仑关战役后，我祖父升任第八军军长，随即率部参加鄂西会战。此后负责防守宜昌以西、宜都以北沿长江南岸一线达两年余，其间多次击退并重创日军大举进攻。1941年9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再次进攻长沙。为配合第九战区防守长沙，他所在的第六战区的主力积极向荆门、宜昌出击，准备相机收复鄂西重镇宜昌。第八军则奉命渡江进击于沙洋、后港间，策应主力作战。本来根据战区

长官部下达的作战命令，第八军应以主力进攻沙市，以一部进击浩子口，向沙洋、后港间攻击。但我祖父认为，战区给该军下达的任务是“相机攻略沙市，主力进击沙洋、后港间，切断汉宜公路，阻止日军增援”。如按上述部署，恐怕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经再三思考，他决定以荣誉第一师相机攻略沙市，掩护该军侧背安全，而以主力第五师、第一零三师进击浩子口以北地区，切断汉宜公路，拒阻日军增援，这样部署既可保障该军的安全，又能以足够的兵力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

据此，我祖父命令荣一师于9月底的一个夜晚由荆州（现江陵）东南悄悄渡江，以突然动作攻袭沙市，迫使日军龟缩城内固守。他趁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该军第一零三师一举攻占后港，并以一部佯攻沙洋，主力则乘虚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毙伤大批日军。该军第五师也在襄河两岸截击日军水上交通，取得较大战果。第八军的作战行动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多日，并给敌人造成极大恐慌，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部队围攻宜昌之敌的战斗。战后总结，战区长官部特别嘉奖了第八军。

1943年春，我祖父奉命飞赴印度，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后升任副总指挥。当时的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是一位具有卓越军事才能，对日作战坚决的美国将领。但他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也对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舞台缺乏了解，因而同国民党最高当局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同时军中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师长（后分任新一、新六军军长），分别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和法国圣西尔军校，均是作战经验丰富且战功卓著的优秀将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同盟国折冲樽俎、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并团结部属，鼓舞部队斗志，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祖父以坚定无畏的爱国精神和敦厚豁达的泱泱气度，出色地完成了自己肩负的重要使命，同史迪威、孙立人、廖耀湘及驻印军广大将士，也建立起真挚深厚的袍泽之谊。

我祖父到任之初，驻印军将士与美军人员之间的关系一度比

较紧张。我祖父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我方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我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某次美方未按规定请准国民党最高当局，即将驻印军中一位中国将领遣送回国，此事引起全军大哗，重庆军委会也电斥史迪威“何以对于人事调动，不先请准而擅自撤委”。我祖父为此面见史迪威，意欲劝他顾全大局，收回成命。岂料时任驻印军参谋长的美军将领波德诺在一旁叫嚣：“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因此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干预过问。”我祖父对其蛮横无礼的做法十分气愤，强忍心中怒火，严辞质问他：“参谋长阁下的这番话，可以代表美国政府和总指挥的态度吗？我提醒阁下，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不能接受殖民地式的待遇。”波德诺顿时语塞。总之，我祖父在处理与美方人员的关系问题上，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于事关我国政府和军队尊严、利益的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据理力争，除非上级同意，轻易不做出让步；对于史迪威则像对待本国长官一样，给予他应有的尊敬。他下达的命令、指示，只要是正确的，便认真执行，从不违抗，并在工作中积极地协助他。对待美方其他人员，也努力体现出不亢不卑、宽和大方的风范，与之友好相处。即使双方一时发生矛盾，也努力保持冷静和理智，采用适当方式加以解决。以后随着双方共事日久，彼此的信任程度逐渐加深，史迪威和我祖父之间，也开始建立起一种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使他们在后来的战争中彼此信赖，互相尊重，始终保持着军事指挥上的协调与统一，进而为取得反攻缅北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1943年10月，我祖父协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驻印军发动缅北反攻战役，历经胡康谷地、孟拱谷地、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戍等重要战役，于1945年1月先后与中国远征军及英国军队在芒友和乔梅会师。这次战役在被一些西方军事家称为“绝地”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进行，环境极为险恶，又值雨季，我军一面筑路，一面战

斗前进,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歼灭了被日军吹嘘为“亚热带丛林之王”的第十八师团,并重创其他几个师团,毙伤日军三四万人以上,打破了在缅甸战场上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打通中印公路,收复缅北及支援整个缅甸战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反攻缅北的全战役中,我祖父肩负重任,殚精竭虑,昼夜辛劳。不论在印度蓝姆珈基地整训部队或在列多前进指挥所战地指挥,他经常冒着缅北地区摄氏三四十度的高温,在大雨滂沱的丛林中艰苦跋涉。每当战役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火线,常常冒雨在尺多深的泥泞沼泽中徒步行军,亲往第一线营连,到距敌仅数十码的前沿阵地上指挥作战,也曾多次乘指挥机在敌阵地低空进行观察、督战。在驻印军攻击胡康谷地重镇孟关和瓦鲁班的战斗中,我祖父仅率参谋、卫士数人徒步前往新三十八师师部指挥、督战,途中被日军一股溃兵发现并包围。他命随从销毁文件与敌死战,幸亏邻近一支新三十八师部队闻讯及时赶到,才将敌人击退,化险为夷。这次战役我新二十二师在战车支援下从正面横扫孟关、瓦鲁班日军,新三十八师则迂回敌后、切断日军归路,曾嚣张不可一世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在我军前后夹击下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敌师团长田中新一仅率千余残兵仓皇逃窜。战斗结束后,我祖父在新三十八师师部的帐篷里,高兴地聆听孙立人师长坐在行军床上叙述战斗经过,望着他那瘦削英俊的脸庞上已蓄满浓密的胡须(孙在进军胡康谷地前声言,不拿下孟关决不剃须),不觉打趣道:“你这个常山赵子龙现在变成燕人张翼德了!”言毕,两位身经百战的年轻将领相对大笑。驻印军与美军联合攻击缅北重镇密支那时,因担任前敌指挥的美军将领耽误战机,部队遭受较大损失,战斗进度极为迟缓。史迪威将军为此更换了三任美军指挥官,均未能扭转战局。我祖父乃果断向史迪威建议,应指定中国将领统一指挥前线各攻击部队,并亲临距敌仅50码的坑道内仔细观察敌阵,遂决定重新调整兵力,加强火力,督率各部再次向日军发起全面攻击,最终一举攻克该城。我祖父就是这样以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和与将士同甘

共苦的精神，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受到驻印军全体官兵的爱戴与钦敬。

在国民党军队中，我祖父曾被誉为抗日名将。应当说，在那场决定中华民族存亡命运的艰难而神圣的抗战中，他确实尽到了一名中国军人应当尽到的责任。

转变思想 追求真理

我祖父一生跨过几个历史时期，他的前半生曾在政治上走过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早年，他作为一名爱国的青年学生，是怀着满腔救国救民的愿望，跨入黄埔军校校门的。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团结合作，造就朝气蓬勃的革命形势，他和许多共产党员并肩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彼此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当时黄埔军校一期同学中的一些共产党人，如王尔琢、蒋先云、黄鳌等，都曾是他亲密的朋友和同志。先后担任黄埔军校和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也因我祖父思想进步、作战勇敢而对他十分爱护。

1927年国共分裂，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极重要的转折，也是我祖父一生政治选择上的一个极重要的关键。然而，在这个关键上他做出了错误的抉择。尽管当时他对国民党右派大肆“清共”无法理解，甚至感到痛心；对于一些曾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们惨遭杀害和迫害，内心里非常同情和惋惜，但却始终视国民党为“正统”，认为国民革命只有通过孙中山先生遗下的国民党才能完成。看不到这个曾经是革命的政党在蒋介石集团的把持下已经蜕化变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就这样，我祖父在困惑和怀疑中，把自己的命运和蒋介石连在一起，走上了一条与其革命初衷相反的政治道路。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我祖父本人也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失去了信心。但由于封建思想和意识的长期束

缚，他还是放弃了去上海医病的打算，以“临危受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凄凉心态，奉命去困守在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下的孤城长春，幻想做“党国”的忠臣，失败中的“英雄”。东北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后，于1948年10月一举攻克锦州，切断了几十万东北国民党军队退往关内的陆上通道，迫使饥困不堪的长春守军一部起义、一部投诚，我祖父也不得不放下了武器。这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做的第二次重大政治抉择。

古人云：“择善而固执之”。如果说，当初我祖父在长春放下手中的武器是为形势所迫，那么他后来思想上逐渐发生根本性转变，直至成为一位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者，却是在共产党的亲切关怀教育下，长期坚持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结果。

长春解放之初，我祖父的思想仍很顽固，心绪极为苦闷。他戎马生涯20余年，同反动的新旧军阀血战过，同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血战过，最终却失败在共产党的手下，尤其是他为之奋斗了近半生的国民党政权，也已日薄西山、穷途末路了。这一切使他的心情既痛苦，又不很服气。绝望之余，他竭力用封建的正统思想来约束自己，努力保持所谓军人的“气节”，不肯做任何有损“党国”的事情，还想对国民党政权尽最后的“愚忠”。

对于我祖父思想的顽固，中国共产党始终给予了耐心的帮助与教育。长春和平解放的当晚，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和政委萧华同志，在位于长春郊区四家子的司令部里设下丰盛的筵席款待他。席间，两位萧将军阐释了共产党对国民党投诚官兵的宽大政策，对我祖父提出的“今后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以及不去广播登报、不参加公开宴会的生硬表示，也毫不介意，并热诚地邀请他去哈尔滨解放区参观、学习。

在哈尔滨解放区，我祖父看到的是一派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景象。虽然战争尚未结束，但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开始了各项经济建设，特别是共产党各级干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精神，更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实引起他深沉的思考：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人民群众不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却热烈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呢？为此他要求读毛主席的著作，结果得到了一部当时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书中对时局的分析，特别是对国民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失败原因的分析，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开始认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也不单纯是军事的失策。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党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因而必然导致了它在政治上的极度腐败和黑暗，而共产党则是一心一意地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所以赢得了人民衷心的拥护。

以后，我祖父又相继潜心阅读了《列宁文选》、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书籍不仅解开了他头脑中一个又一个思想疙瘩，也使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并逐步建立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敬重和信仰。至此，我祖父才真正痛切地感到自己过去走错了道路，违背了当年投奔黄埔时反帝爱国的革命初衷。同时深切地体会到，长春的解放也是他自己政治上的解放和新生，他决心以今日之我否定旧日之我并催生来日之我。

在我祖父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亲切关怀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长春解放前夕，国民党守军第六十军宣布起义，新七军也在与解放军接洽投诚，惟有我祖父率兵团直属部队退踞中央银行大楼进行最后的顽抗，死心塌地的要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为了将我祖父从黑暗中挽救出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亲自写信给他，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劝他顾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举行反蒋起义，回到人民的行列中。信件原文是：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

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离背，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 恩 来

十月十八日

据说这封充满黄埔师生情谊的信件是用电报转达到前线的。次日上午，解放军进驻长春时，交给了新七军主持军务的副军长史说，请他转交给我祖父。可惜因中央银行大楼附近枪声四起，市内秩序混乱，史说派去的人未能把信送到，我祖父到解放区后才知道此事。不过对于周恩来同志这番亲切关怀，他内心还是感到由衷的感激。

1950年8月，我祖父由东北去上海医病途经北京，已经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闻讯在百忙中要会见并宴请他。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祖父感到意外的兴奋，想不到建国伊始，周总理日理万机，却还一直记挂和关怀着他这个不成器的学生。那天，我祖父准时来到周总理家中，看到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另一位老师聂荣臻元帅也已在座。见我祖父走进会客室，周总理连忙起身，快步迎了过来，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他，紧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我们很久未见面了，难得有这个机会呀……”

我祖父被周总理的坦诚、热情所感动，觉得他还像当年的周主

任那样诚挚可亲。一时真是百感交集，两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哽咽半天才愧疚地说出几句话：“周总理，几十年来，我忘记了老师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我感谢您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

周总理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过来了吗？今后咱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

大家落座之后，周总理问我祖父在北京是否还有熟人，我祖父说有位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叫李奇中，与他交谊甚笃，据说也在北京。周总理略想了想说这个人我知道， he 现在是政务院参事，随即吩咐工作人员快去请来。过了不久，李奇中便赶到了，师生四人相见，分外亲热。

吃饭的时候，周总理详尽地询问起我祖父和家庭情况，那副关切的神情犹如家人一般，使他如沐春风，心底感到无比的温暖。周总理还和藹地问我祖父今后有何具体打算，我祖父想了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别无所长，人也老了，打算回家乡种地去。李奇中在旁插话道：“好哇，你在老师面前也敢称老？”说得一桌人都笑起来。周总理亲切地说：“洞国，你还不到五十岁嘛，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多为人民做贡献呀。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周总理的诚恳态度使我祖父非常感动，遂表示拟先回上海治治病，料理一下家务，再听候安排。周总理说：“你先回家休息一下也好，身体养好后随时可以来。”

席间，周总理还询问起当年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与盟军联合作战的情形。那时正值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我祖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军的作战特点，指出美国人打仗主要靠武器装备，打不了硬仗。为此还特别举了几个实际战例加以说明。周总理和聂帅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询问。待我祖父讲到美军非常依赖空中补给，如过去中美军队共同执行作战任务时，美国兵行军走累了，就先丢弃武器弹药，然后再丢弃衣服，待到达目的地时，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了，以致空运的装备只好先全部补充给美

军。周总理听得有趣，不禁开怀笑了起来。据说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周总理多次引用我祖父讲的这几件事，激励大家要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坚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心。

我祖父在上海医病、休养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使他有机会和解放后的新社会发生接触，把学到的、并初步信仰的理论和现实相印证。抗战胜利后，我祖父曾在上海住了半年多。那时，这里是有名的花花世界、冒险家的乐园。谁知解放刚刚一两年，上海居然大变了样：昔日常见的那些恶霸、流氓、娼妓等几乎涤荡殆尽，整个城市在人民政府管理下井然有序、生机勃勃，人民安居乐业。我祖父原来认为上海的情况复杂，牵连非常广泛，很难治理好，而共产党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在事实面前，他真是叹服了。理论和现实的印证，使我祖父坚定地确信，自己新的政治信仰没有错。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和实际措施是一致的，是贯彻到底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前途一定会大有希望。

1951年冬，我祖父写信给李奇中，谈到他目睹祖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心情格外振奋，准备春节期间再到北京看看。李奇中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很快给我祖父打来电报，邀他去京。

春节前夕，我祖父到北京。周总理在政务院再次会见并宴请了他。一见面，周总理还是那么亲切地关怀备至，问长问短。我祖父心情很激动，坦诚地向周总理汇报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听了我祖父的汇报，周总理格外高兴地说：“你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这是值得庆贺的，我代表大家欢迎你。你的年纪还轻些，完全可以多为人民服务嘛。”

我祖父恳切地向周总理表示：“感谢总理的关怀，我把上海家中的事情安置好，很快来京工作，听候总理安排。”

周总理爽朗地笑了起来，说：“好，好，你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嘛。”

几个月后，我祖父举家迁京，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又被任命为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机要工作。

过了些天，我祖父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柬。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请贴，要在中南海家中宴请他。当时我祖父的心情既激动又不安，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日夜为国事操劳，还想到他，甚至要设宴招待，这该是多么荣幸的事情呀！但是，想到自己曾负罪于人民，参加工作以来尚未给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却身受种种优厚的待遇，现在又蒙毛主席亲自接见，心中甚感愧疚，他真不知见了毛主席应该说些什么。

去见毛主席那一天，我祖父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还有鹿钟麟将军等早已在座。我祖父刚到，毛主席即迎了上来，同他握手、寒暄、让座。

我祖父本来有些紧张、拘谨，然而毛主席开始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打消了他的顾虑。坐定之后，毛主席微笑地注视着我祖父，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诙谐地说：“郑洞国、郑洞国，这个名字好响亮哟！”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毛主席问我祖父吸不吸烟。他应声说“吸”，顺手在茶几上取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主席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身替他点燃了香烟。这位深受亿万人民敬仰和拥戴的革命领袖，竟是如此亲切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有旧社会达官贵人那种虚伪矫饰、盛气凌人的样子，使我祖父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多了。

毛主席又体贴入微地问起我祖父全家的生活情况，他都如实地做了回答。毛主席听后笑着说：“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还得多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哟！”我祖父很惊讶，想不到毛主席对他的情况了解得这么具体，连他的年龄都知道，激动地表示今后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他们愈谈愈随便。不知怎地，我祖父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似乎不甚得体的问题：“您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毛主席仿佛也觉得他问得太突然，不觉怔了怔，我祖父自感唐突，有些不好意思了。毛主席却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帐。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候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真正转变过来嘛！……”

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在那天的宴席上，毛主席讲了好些。许多话我祖父后来已无法一一记起，但他始终难忘的是，毛主席以其切身的体会开导他，鼓励他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走革命之路。

从那以后，我祖父一直牢记着毛主席的谆谆教诲，认真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上爱国和革命的道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记得他生前曾很感慨地说过：“我这个人过去固执得很，但是我服从真理。现在我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才会大有希望。在这个信念上，我是绝不会再动摇的！”的确，作为一位热诚的爱国者，我祖父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和进步，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程，这是他晚年引为自豪的事情。

淡泊名利 清廉自守

我祖父一生保持正直、爱国、仁厚、清廉的情操，其道德风范一

向为熟悉他的人们所称道,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他身上的体现。

我祖父平生最大的嗜好是读书。他学识渊博,谈吐温文尔雅,为人亦谦逊平和,敦厚稳重,被誉为有儒将风度。更可贵的是,他在国民党阵营多年,注意清廉自守,克己奉公,也从不介入派系争斗,竭力做到洁身自好,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很不多见的。

抗战初期,我祖父一度担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参议。当时武汉会战正在激烈进行,某次他奉命去前线某军督战,发现该军军长黄国梁是他多年不见的老长官。俩人相见分外亲热,指挥余暇常常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夜深则同榻而眠。过了些天,汤恩伯突然给我祖父打来电话,指责黄指挥无方,所部战绩不佳,要他取代黄的位置。我祖父这时才明白当初派他到此督战的真正用意。此事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升官发达的好机会,但我祖父却不愿担此暗算朋友之嫌,所以便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汤的提议。事后有人讥笑我祖父处事迂腐,他都始终不悔。

抗战胜利后,我祖父以打通滇缅路的声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但他从未过问或参与过国民党中央内部的事务,更不想利用这个条件为自己活动钻营。有一个时期,蒋介石曾有意要他担任其侍卫长,这是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求之不得的显赫职位,但我祖父却以生性愚钝、不善内卫事务为辞而推却了。东北内战初期,许多国民党大小官员均视去东北为肥缺,以接收为名,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搞得东北国统区乌烟瘴气,人民怨声载道。而我祖父则从不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己捞取好处,所以尽管身居高位,家中却无余财。当时有人评论说,“假如在东北的国民党官员中还有不贪污的,郑洞国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祖父在晚年一直同我们共同生活,这使我们对他的思想情操,有了更多方面的了解。他一生不仅淡泊名利,而且为人刚正不阿。“文革”期间,许多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我祖父也身处逆境,但他从不肯屈从压力而做违心的事。某次造反派来到家中,硬

要他证明当时的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同志是“叛徒”、“内奸”，遭到我祖父的拒绝。来人纠缠不休，均未达到目的，不由凶相毕露。我祖父却还是冷冷的一句话：“对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不能冤枉好人！”几个造反派没有办法，只得悻悻离去。似这类事情，他当时经历了不止一次。在那人妖颠倒，魑魅魍魉横行的时代，这样做不知要冒多大风险，但在真理和道德面前，他早把个人荣辱置之身外了。

我祖父的生活非常俭朴，且律己极严，很少向组织上提出什么个人要求。在他生前，湖南家乡县委政府的同志来京，当面提及我祖父在家乡的一处房产可以折价发还。他一再婉言谢绝说：“我老了，不能给家乡做出什么贡献了。现在家乡还比较贫困，我怎么能再给家乡父老增加负担呢？”一席话使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相反，他对别人的困难却十分关心。他多方努力，积极协助为过去一些受过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落实政策，使不少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我祖父去世后，一位曾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闻讯拖着半身不遂初愈的身体，艰难地从远郊县赶进城，拿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只花圈前来吊唁。我向他鞠躬致谢，感谢他这么多年还惦念着我的祖父。这位老兵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不是我们忘不了你祖父，而是你祖父的事情让我们忘不了！”

许多与我祖父共过事的党内外同志，常常称赞他在工作中识大体，顾大局，谦虚谨慎，诚恳待人，是一位忠厚长者。在这方面，他不仅身体力行，也经常告诫我们，为人要正直、虑心，少计较个人私利。在他晚年，我协助他整理、撰写回忆录。凡涉及他参与的一些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历史活动，他都要求多突出别人的功绩，少写他自己。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力求公允、客观，尽量避免带有个人恩怨。这种不计私利实事求是的精神，令我十分感佩。如今我祖父虽然已离开人世，但他老人家的高尚情操和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将永铭不忘！

促进统一 不遗余力

我祖父曾目睹过贫穷落后、四分五裂的旧中国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而他十分关注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地希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尤其是到了晚年,对此更是魂萦梦绕,不遗余力。

多年来,他始终牢记着孙中山先生的教导:“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己任,经常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提案,在电台、报刊上发表讲话或文章,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意见和主张。他认为,“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提出的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好方式。为此,他曾多次寄语台湾当局,希望其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多做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事情,不做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情。并且指出,所有炎黄子孙都关注着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和举措,观望和拖延不是办法,反共拒和更无出路,只有实现统一,才能保持台湾岛的稳定和繁荣,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贡献。

我祖父生前,接待了许多来自台湾及海外的故旧袍泽,直至他病重住院期间,还多次会见了一些昔日的同学、同事和部属们。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帮助他们消除顾虑,增进了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0年9月底,我祖父的病情恶化,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躺在病床上拉住我的手,吃力地说:“我曾是个军人,对生死已看得很淡,你们好好生活,不要为我难过。我现在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有看到祖国统一。一旦国家实现了统一,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此后不久,他失去了语言能力,这番话竟成了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言!尽管我祖父带着这唯一未了的遗愿离去了,但我坚信,在海峡两岸及全世界中华子孙的共同努力下,祖国统一的千秋功业终将成为现实。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

(1945.12—1946.1)

陈春华 译

编者按：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苏关系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蒋介石曾试图前往莫斯科，亲自同斯大林讨论中苏关系的全部问题。但苏联政府出于种种考虑，包括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没有向蒋介石发出邀请。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作为其私人代表出访莫斯科。斯大林分别于1945年12月30日和1946年1月3日两次会见了蒋经国，双方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谈。蒋经国向斯大林提出的问题，代表了当时蒋介石完全从国民党的利益出发，处理中苏、中美、国共关系的原则和立场。

会谈记录译自〔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1996年第4期《近现代史》（原件存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文长约3万字，本辑因篇幅所限在编发时作了删节，只保留会谈纪录部分。

—
1945年12月30日21时

莫洛托夫、帕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座。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面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军队是否已进驻沈阳？如果未进驻，是谁

在阻挠，也许是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中国军队尚未进驻沈阳，不过很快就要进驻。共产党人没有阻挠。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想要谈什么事情嘛？

蒋经国答：苏军已进入东北，粉碎了日本军阀，加速了日本投降，苏军还帮助恢复了东北的政权机构，对此，蒋介石要他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谢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派自己的代表会见斯大林大元帅，有以下想法：

（一）他认为：战后苏中关系愈来愈密切，为两国利益计，这种关系应日益加强。如果遵守十分重要的条件，即斯大林大元帅与蒋介石彼此完全谅解，那么苏中关系能够而且一定会加强。蒋介石认为：情况不明只能使问题模糊不清，情况明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蒋介石认为：有许多问题不必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此，蒋介石派他（蒋经国）前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苏中关系问题。

（三）蒋介石要他（蒋经国）向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表达他的敬意和信任，并请他谈谈对中国的看法，他的全部怀疑，并谈谈他不同意蒋介石现阶段所奉行的政策的哪些方面。

他（蒋经国）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下列问题：

第一，他想就中国统一问题进行会谈。中国人同日本人斗争了二十年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可能的日本阴谋活动和武装入侵。因此，国民党和蒋介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国家问题上。正如斯大林大元帅所知，中国有各种政治团体。蒋介石一方面竭力集中力量对日作战，另一方面竭力统一中国。现在日本已被打败，有可能进行国家民主化、国家统一，并解决社会体制问题了。这一任务的完成首先取决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调整。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可能共存，国民党不打算消灭中共。国共两党的政治路线不相矛盾。应当坦率地指出：如果国共两党和平共

处,就可保障国民党避免解体,并迫使国民党更快地前进。不过,国共两党共存的必要条件是共产党不能打算消灭国民党。

蒋经国说:在五月份召开国民大会以前,业已决定邀请中共代表参加政府,条件是保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合法地位。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中国对三国外长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的决议持何态度?

蒋经国说:他尚未看到这些决议。

斯大林同志答:三国外长业已商定: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统一中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国民政府各个部门,停止内争。

蒋经国答:他认为这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因为决议谈及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可以参加国家最高机关国防委员会。

下一个方面是共产党的军队。中共建议政府准许保留共军 16 至 20 个师。此项建议是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提出的。蒋介石同意保留共军 16 至 20 个师,并保证其安全。不过,既然谈及中国统一,军队也应当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兵力分裂国家。另一个条件是统一国家管理,要求共区服从中央。他(蒋经国)记得:斯大林接见宋子文时,谈及在保留国民党领导权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统一,不过应有广泛的民主力量参加。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认为,苏联关心中国的安定和统一,他请求斯大林大元帅谈谈他对该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可能有哪些怀疑。另一方面,蒋介石还请斯大林大元帅劝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有三名代表驻在延安共产党人那里。美国人也有三十至三十二名代表驻在那里。苏联政府从延安召回了自己的全部代表,因为苏联政府不同意中共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隶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

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不愿提出日后不被采纳的建议。加之中共也不来征求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信将使中共按照他的建议行事。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如何。他们也不征求任何建议。以前当苏军开始进入东北，苏联政府还有三名代表驻在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通过这些代表请求给他们提建议，当时答复他们说：按照俄共中央的意见，中共代表应前往重庆谈判，中共未料到会提出这种建议。这一建议在中共当中引起惶恐不安。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共前往重庆有什么打算。只知道谈判受挫。

斯大林同志说：当共产党人希望向东北转移时，苏联司令部不准许他们向那里转移，因为苏联政府不想干涉中国内政。总之，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会导致削弱中央政府的威信。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在想什么：是中国苏维埃化，还是两个政府共存。

斯大林同志说：他未料到中国中央政府与共产党人有这些困难，共产党人会阻挠中国军队调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和苏中条约中阐明。苏联政府在两个文件中声明：苏联政府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党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则对政府有好处。但看来中共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呢？苏联政府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看来中共不同意这一看法。

蒋经国说：蒋介石认为，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将会破坏苏中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他理解这一点，因为许多人都在说：苏联政府劝中共不要同蒋介石签订协定。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信可能对中共产生影响。

斯大林同志答：苏中条约已经公布，但看来中共并不重视这一文件。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也已公布。以后的情况会表明中共是否同意。看来不会同意。

蒋经国问：怎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呢？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中共与中国政府的代表需再次聚会。

蒋经国答：周恩来一行 30 人已抵达重庆。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是否认为：中共来重庆是为了进行谈判。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需要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国军队和中央政府军在蒙古打了起来。而中共宣传说：既然外蒙古已宣布独立，那么他们也将力求使内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志答：这是愚蠢。并说：苏联政府不能为中共的行为负责。

蒋经国说：可向中共提出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他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建议。如果他们来征求建议，他就向他们提出，会不会这样，天晓得。有一天中国共产党人去重庆征求建议（指向苏联驻华代表征求意见——译者注），但未能达成一致。从那时起他们再也不来征求意见了。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关于蒋介石提议的中国师（原文如此——译者注）的数目他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答：他不知道中共有多少个师，有哪些师？苏联政府得到了各种情报，有时是通过无线电截获的消息。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所有这些消息是否可信，他不知道师的数目。

谈到国民党，按他（斯大林同志）的看法，蒋介石是对的。在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方面，他是对的。如果蒋介石打算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那么，按他（斯大林同志）的看法，可以这样做，不过，这当然是蒋介石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苏联政

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满。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意见。

蒋经国问：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前去征求建议，苏联政府将怎么办呢？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政府将按照他（斯大林同志）对蒋经国讲的精神向共产党人提出建议。

蒋经国问：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需要为中国统一做些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答：需要同共产党人谈判，需要了解他们有何要求。

斯大林同志问：重庆谈判为何受挫？为何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国民政府军又打了起来？

蒋经国答：他不知道此事。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政府也不知道此事。

蒋经国答：重庆谈判时共产党人要求热河、绥远、河北等黄河以北诸省由共产党人主持。蒋介石认为：这等于把国家一分为二。这是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至于共军与中国国民政府军打仗，有种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一分为二当然不好。

蒋经国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他讲的上述情况。

斯大林同志答：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同苏联政府商量，苏联政府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苏联政府的建议，苏联政府便很尴尬，苏联政府不愿意这样做。

蒋经国说：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双方达成协议，彼此就能让步。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的观点同他们坚持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斯大林同志说：当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时，向他们提出了建议。他们去了重庆，但没有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征求建议

了。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蒋经国说：应当早日召开由国民党、中共、中国民盟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共产党人来重庆正是为了参加这一会议。

蒋经国答：当然要举行谈判，主要是国共两党谈判。

斯大林同志答：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征求俄共中央的建议，俄国中央将会向他们提出建议。中央委员会不愿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他认为大家都关心这一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有隐秘的想法。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共产党人来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看来，毛泽东不相信蒋介石，蒋介石也不相信毛泽东。

蒋经国说：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过十分友好的会谈。

斯大林同志说：既如此，为什么双方军队又打了起来。看来，中国人的性格就是如此。苏联政府不理解这一点。

蒋经国说：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苏中关系问题。有些人认为：中共反对中国国民政府，是背后有苏联的支持。

斯大林同志答：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蒋经国表示：苏中关系始于十月革命。1923年至1924年期间的苏中关系最好。当然，同1923年至1924年相比，目前的情况已发生改变，当然难于采用旧的方式。不过，蒋介石认为：为双方利益计，应恢复到1923年至1924年期间苏中关系的那样一种精神。

斯大林同志指出：当时并未签订条约。

蒋经国说：当时孙中山还在世。那是北伐前的事情，当时已经创立黄埔军校。虽然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但蒋介石依然认为：应当恢复当年苏中关系的精神。但形式将是另样的，蒋介石在瞻望遥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政府同意这一看法。目前苏中两国关系比较好，可建立密切的关系。1923年至1924年期间的情况不同。当

时的锋芒是针对英国，部分是针对日本。目前由于中国与英国、美国共同对日作战，苏中英美四国实已结为同盟。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中国政府想使苏联反对英国吗？

蒋经国笑着说：当然，根本谈不到此事，但中国政府想恢复1923年至1924年期间苏中关系的那樣一种精神。中国政府竭力使这种关系比现在更亲密。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一个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亲密的关系。中苏同盟是此种关系的基础。

蒋经国说：1923年时，中国的政策遵循三项基本原则：一、联苏，二、联合工农，三、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目前第一项，第二项原则依然有效，第三项原则已失去意义，已为吸收共产党人管理国家这一原则所代替。

蒋经国说：最好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并问道：照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是什么妨碍达成协议呢？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也许双方领导互不信任妨碍达成协议。也许，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欺骗他们。双方领导人谈判时缺乏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怎样恢复这种信任。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不一定相信俄国人，俄国人也不一定相信美国人。不过，当俄国人与美国人签订协议时，每一方都要相信另一方会履行协议。谈判时需要这种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相信：如果协议签订了，将会被撕毁。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政府的分歧已感到厌烦。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这些都是背着中国人民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与中国建立最亲密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政府同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要他转告斯大林大元帅，蒋介石保证中国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加反苏的事情。蒋介石表示：他当权时不会反苏。

对此，斯大林同志请转达对蒋介石的谢意，并且表示：苏联政府也将这样对待中国，只不过苏联政府没有任何担心。英美两国的情报机关散布说：苏联和英美两国快要打仗了。这是虚伪报道。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可能鼓动军队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因为没有目标；日本已战败，人民讨厌战争。任何一个英美政府企图鼓动自己的军队打仗必将失败。正是这一原因，苏联政府也不会鼓动军队发动战争。也许英美两国情报机关作虚伪报道是为了恐吓苏联和中国。尽管如此，他（斯大林同志）仍感谢蒋介石发表这样的声明。他（斯大林同志）过去和现在都相信中国不会反苏。他（斯大林同志）可以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不会反华。过去苏联不止一次劝说要这样做，不过苏联坚决坚持与中国共同前进。

蒋经国指出：蒋介石指的不是现在，而是遥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更好了，因为过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当然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蒋经国表示：下一个方面是教育中国人民。蒋介石制定了以亲近苏联的精神教育国民党员和在学青年的大纲，内容丰富而又广泛。蒋介石希望中国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应当说明，目前中国人的情绪并未集中在与苏联友好方面。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预先同苏联商量，并就发表共同的观点同苏联政府达成一致。

斯大林同志说：迄今为止，中国代表一向反对苏联。比如，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这样。在旧金山关于谁主持会议问题有很大争论。美国人决定，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会议。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四国代表轮流主持。在讨论此项协议时中国代表反对苏联代表团。

蒋经国答：将来中国人将与苏联共同表态。当时，蒋介石竭力摆脱伦敦会议的困境。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久前获悉此事。看来，对蒋介石的建议未

做出答复。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在等候结果。

斯大林同志答：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予答复。实际上，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一方面美国人和英国人，另一方面苏联政府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在莫斯科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蒋经国说：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东北。蒋介石十分感谢苏联司令部帮助恢复东北的政权机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同中国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谈及：东北曾是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强调指出：日后东北不应再成为这种基地了。因此，蒋介石授命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元帅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中国军队开赴东北只是为了维持那里的秩序。中国政府本不愿意在中苏边境驻军。蒋介石在与彼得罗夫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准备在苏联与东北的边境建立像美国与加拿大边境那样一种制度。谈及在东北采取的政治措施，蒋介石说：东北离苏联很近，那里一切均需重建，那里开始实行民主化比较容易。

在东三省经济方面，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应当是东三省的主人，是拥有主权的力量。苏联在东北不谋求优势地位。

蒋经国答：中国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蒋经国说：东三省有苏联希望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东三省也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将在东三省购买所需产品。苏联方面也将给予东三省可能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就中苏联合公司交换意见。苏军司令部认为：东北的所有企业均为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指出：只有那些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属战利

品。按照战争的法规,此种企业属战利品。所以,苏联政府并不想得到所有这些企业。

蒋经国说:为避免将属于战利品的企业转给苏联可能给居民留下不好的印象。蒋介石建议以别的根据作为把企业转给苏联的理由。蒋介石提议说:鉴于苏军消灭了东北的日军,同时也遭受了损失,考虑到苏中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把半数的企业转给苏联。

莫洛托夫说:可见,蒋介石不愿把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转给苏联。

蒋经国承认确实如此。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在波兰也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也是苏联的盟国。苏联在波兰并未动波兰的企业,但在波兰有德国人建立的企业。当德国西部遭到轰炸时,德国人认为:他们在波兰的企业是安全的,红军离波兰很远。苏联政府宣布这些企业为战利品,但苏联政府并未把全部设备从工厂运走,而是把大约一半的设备留给了波兰人。战争法规就是这样。一些国家不利用这些法规,另一些国家利用这些法规。

斯大林同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做得使中国不感到有任何难堪。

蒋经国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交给中国代表一份应由苏中联合公司管理的一百四十个企业的清单。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知道中国没有重工业。因此,蒋介石希望把这些企业的若干部分留给中国管理。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他不熟悉这个问题。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不想建一个苏中公司,最好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比如机器制造、金属等部门的若干个苏中公司。当时日本有一个开发东三省资源和经营东三省企业的公司。蒋介石提出此项建议是要竭力避免留下仿效日本体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答:可以这样做。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同意建立苏中联合公司，不过希望在苏军撤走后再签订条约。当时蒋介石同意把现在那些企业中工作的苏联人留下。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可以继续谈判，协定晚些时候再签署，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财产可能被陆续偷走。

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司令部接收了一些设备。但没收这些设备并不妨碍恢复工厂的生产。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迟撤军。

蒋经国答：延迟到二月一日撤走苏军的请求，是中国政府最后一次请求。

蒋经国说：还有一个问题，即发行钞票问题。

莫洛托夫说：关于此事已签订协议。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谈谈新疆问题。中国政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消息说：叛乱者代表请求苏联驻伊犁领事在解决冲突方面进行调停。叛乱者代表已来到迪化（乌鲁木齐）。中国政府迫切希望尽快解决新疆问题，因为停止对苏贸易，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已陷入困境。叛乱者提出了十一项条件，基本上已为政府所接受，已达成了协议：新的新疆政府将由二十五名成员组成，其中十五名成员由新疆居民选举产生，十名成员任命。不过叛乱者代表现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军在一个半月内撤出新疆。当然，中央政府要从新疆撤出自己的军队，但不想在条约中指明在一个半月内撤军，因为这与中央政府的威信不相容。

莫洛托夫问：叛乱者代表要求撤走哪些军队？

蒋经国答：他们要求将那些派到新疆镇压叛乱的军队撤走。

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苏联政府进行调停。

蒋经国答：蒋介石希望苏联政府进行调停。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答应在接到苏联领事报告以后，再作最后的答复。

蒋经国说：他现在要谈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蒋介石授命他向斯大林大元帅坦率地表示：中国希望中苏美合作，因为中苏美结盟不仅对远东，而且对全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凡到过中国，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中从来就没有一位对苏联有过不好的评论，尤其是马歇尔将军，他说：他完全信任斯大林大元帅。发表种种评论的不过是那些竭力为自己赚大钱的人。蒋介石表示：他期望苏中美三国结盟。

斯大林同志指出：蒋介石是对的。

蒋经国说：不过，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中国对苏联更亲近。中国坦率地声明：中国期望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政治上不能失去独立性。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确的。

蒋经国指出：中国不会相信进行挑拨离间的人。

蒋经国说：他现在想就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说几句话。美军驻扎华北是日本投降前签订的协定规定的。计划规定美军七个师登陆。被日军逼到南方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在日本投降后尚未来到华北，为了解除日军武装，美军才登陆。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日军还未被解除武装吗？斯大林同志说：在长春二十五名苏联军人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斯大林同志说：日军不会抵抗。东北的全部日军十天内就被苏军解除了武装。应当更大胆地行动。解除日军武装很容易。

蒋经国表示：美军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撤走。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区。好像美军并不想进入东北。无论美军、英军和其他外国军队均不应当允许进入东北。

蒋经国答：美军不会进入东北，并且再次重申：他们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全部撤出中国。

斯大林同志表示：外国军队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信，反之，如果外国军队不留在中国，蒋介石的威信将会提高。

蒋经国表示：美国政府声明说：将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但是，他（蒋经国）应当表示：这不过是宣传而已。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已帮助中国人在华南建立了几个师。这并没有什么坏处。

蒋经国说：关于如何更好地对付日本人，蒋介石想了解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现在要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本管制委员会。美国人不想设立。各国也都反对苏联政府坚持设立该委员会的建议。

莫洛托夫指出：王世杰在伦敦对这一建议表示同情，但希望不要在伦敦讨论。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此事已受到好评。将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将要在该委员会上解决。谈到苏联政府，苏联政府赞同不仅要解除日本武装，而且要销毁日本国内生产军舰和武器的工业部门。苏联政府的观点就是如此。苏联政府不赞同美国人不俘虏日军。苏联政府俘虏了日军。他（斯大林同志）对美国人说过：麦克阿瑟至少应当下令逮捕八千至一万二千名日军将军团成员，即陆海空三军将军。现在美国人正逐一对其审讯。

美国人的论断与苏联政府的不同。现在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同上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的态度一样。当时为德国保留了军官团和将军团。他（斯大林同志）多次对美国人说：要美国人俘虏日军。但美国人回答说：俘虏的日军没有地方安置。无论如何，苏联政府坚持日本不能保留将军团。苏联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

蒋经国指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然而，领导人也应当是好样的。

蒋经国说：他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

斯大林同志答：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

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为了阻止日本东山再起，应当俘虏五六十万名军官和一万二千名将军团成员。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未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美国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理解。中国经受过日本占领，苏联经受过德国的占领，也曾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中国和苏联理解：应当把敌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其再也不能打仗。美国人不理解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期望美国人能理解这一点。

蒋经国问：目前日本的警察状况如何？

莫洛托夫答：在日本有日本警察。

蒋经国说：日本人有可能把警察队变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指出：当然日本人竭力把军官安排在警察队中，不过，当苏联代表来到东京时，他们将竭力把此事安排完毕。

蒋经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在结束会谈时，他（蒋经国）要向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转达宋子文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问：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定将于元月头几天公布，到那时中国政府将迁往南京。

谈话继续了一小时四十分钟。

B·帕甫洛夫记录

二

1946年1月3日23时

莫洛托夫、帕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座。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祝贺新年好，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表示祝贺。

莫洛托夫同志向蒋经国表示感谢并祝贺新年好。

斯大林同志说：他已打电话给苏联军人，同他们进行了交谈。他们不同意不宣布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为缴获的财产。苏联军人对不想把这些财产看作战利品感到气愤。他们希望像对待德国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的财产那样对待这些财产。中国方面并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可能成立不同工业部门的几个公司。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只不过形式不同。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方面提出的形式使苏联军人感到气愤。苏联军人说：他们流血牺牲，因此，应当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说：应当具体地就地确定哪些企业是日本人建立的和用来为关东军服务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划给中国若干重工业企业一事有何想法。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说过，这个问题应由专家们研究。

斯大林同志答：当然专家们可以就地解决这一问题。

蒋经国表示：他访问莫斯科的使命是使斯大林大元帅与蒋介石取得彼此完全谅解。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国民政府采取的措施和奉行的政策开诚布公地、友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谈谈自己有哪些怀疑和不赞同之处。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对确定蒋介石主持的政府的政策将十分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他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基本情况。他（斯大林同志）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与毛泽东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独特的人，独特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为什么蒋介石与毛泽东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表示对谁不满，他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不掌握事实，因此，他只是有

些疑问。如果他有少量事实,他就能提出一些什么建议。

谈及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同志说:正如他所说的,要使日本再也不能打仗。要俘虏日本军事干部,要裁减军事工业和那些可能满足军事需要的工业。

谈及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这是友好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在发布的公报中已公开指明这一点。

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政策是正确的。苏联现在不能给予中国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望美国援助,因此,他奉行同美国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斯大林同志)坦率地讲了他知道的事情,并且询问了他不知道的事情,即关于解除日军武装和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协议的情况。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苏军司令部迅速地解除了日军武装,并希望尽快解除日军武装。

蒋经国答:当初中国政府没有足够兵力解除日军武装。

斯大林同志指出:解除日军武装几乎不需任何兵力。

蒋经国表示:目前中国政府有力量,并将消灭日军。苏中条约是针对日本的,斯大林大元帅可以放心,中国对日政策的出发点是阻止日本重新站稳脚跟。至于解除在华日军武装,由于地理情况和中国军队当时被日军逼退到南方地区,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困难。

斯大林同志问:为什么美军不解除日军武装?日军并没有抵抗。要知道日军已宣布投降。

蒋经国说: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与政府未能签订协议,是因为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

斯大林同志指出:需要做些让步,但究竟做那些让步,应由双方自己决定。

蒋经国说: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国民政府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议。

莫洛托夫讲述了报界对国民政府的建议和中共建议的报道。莫洛托夫指出:不完全清楚这些建议,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可以

得出结论说：在中共和国民政府签订协议应当依照的程序制定出以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苏联人们知道什么是内战。

莫洛托夫说：美国魏德迈(Wedemeyer)将军表示：为保障把中国军队调往东北并维护道路治安起见，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四千人。

蒋经国说：此项声明是早在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以前，即早在马歇尔将军到来以前发表的。

蒋经国说：目前主要的困难是北平与南京之间没有铁路交通，因为铁路被共军切断。甚至北平至天津这段长 100 公里的铁路火车也要走一两天。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恢复铁路交通。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将会改善中国人民的状况，并促进贸易发展。

蒋经国同意这一点，并说：中国人打了多年的仗，深受战争的折磨。

莫洛托夫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已经厌倦。

蒋经国说：中国尤其深受贫困之苦。他(蒋经国)认为：在目前这场战争中苏中两国所遭受的苦难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多。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可以向他讲一讲对蒋介石的政策有什么怀疑之处。

斯大林同志答：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很难说有什么怀疑。他(斯大林同志)没有怀疑。他有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已对蒋经国谈过了。

蒋经国说：在中国大家都坚持必须使中国实现民主化。

斯大林同志答：这很好。

蒋经国说：关于中国民主化的形式尚未形成意见，他(蒋经国)想了解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民主化的形式有何想法。

斯大林同志问：目前中国是不是共和国，中国有没有君主制潮流？

蒋经国答：中国是共和国，目前中国没有君主制潮流。

斯大林同志说：共和制更接近民主制。苏联没有敌对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实行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党也应当存在。中国是否还有其他党派。

蒋经国答：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确定中国的选举原则。政府应当对议会和总统负责。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打算实行什么样的议会制，是一党制，还是两院制。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是否还保留各省政府。

蒋经国的回答是肯定的。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潮流，是赞同一院制，还是赞成两院制。不过中国应像法国、波兰、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那样确定选举原则。议会应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应由议会任命，由总统确认。在美国总统同时也是总理。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在法国由下院和上院选举总统，总统不兼总理，虽然他可以参加政府的会议，以主持者身份活动。不过法国和美国的体制也均符合民主制原则。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可以接受南斯拉夫和波兰实行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说：同法国一样，南斯拉夫和波兰目前也实行两院制。苏联也有两院，两院有平等的权利。比如：联盟院可以否定民族院的决议，反之也一样。在英国则不同。那里也有上下两院，但上院比下院有更多的权利。美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而参议院有更多的权利。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实行什么制度。

斯大林同志问：什么是院？

蒋经国答：与议院相似。

斯大林同志说：议院可以随便叫什么名称，这取决于国家的特

点,但议院都应当是由选举产生的机构。

蒋经国问:在苏联如果两院出现分歧时,那么决议又是怎样通过的呢?

莫洛托夫答:在此种情况下,应召开两院联席会议,决议由多数票通过。

蒋经国问:照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应成什么样的比例呢?

斯大林同志答:在欧洲一个政党在政府中所拥有的部长职位通常与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数相一致。英美两国政府是由取得多数的政党的党员所组成。比如:工党在英国最近的大选中取得了多数,他们建立了只有工党党员组成的政府。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要求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中要有反对党代表。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他们耸了耸肩膀。

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现行的组成政府的制度更加民主,参加政府的还有取得少数的政党的代表。如果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那么反对党就会转入地下活动。如果允许反对党参加政府,他们会奉公守法。这是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的优点。

斯大林同志还举了匈牙利的例子。在匈牙利小农业主党取得了过半数的选票,虽然如此,该党依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自由派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保持自己多数的部长职位。

蒋经国答:他认为中国不应当采用英国现行的民主制度。他(蒋经国)认为:在现阶段各民主党派均应参加中国政府。

蒋经国问:日前斯大林同志如何评估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邱吉尔和艾登认为:保守党人将获得多数,然而工党却获得了胜利。中国过去未举行过大选,因此很难弄清楚人民在想什么。大概国民党应当获得多数,但他(斯大林同志)很难说国民党能获得多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国共两党能够共存,在什么条

件下才能共存？

斯大林同志答：如果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将存在，国民党也将存在。比如，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并未同他们打仗。国共两党更加应当和平共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赛，不过国共两党都将存在。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国民党有何意见？有许多人对国民党不满。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对国民党不满。迄今为止，东北仍在散发署名国民党的传单。这些传单号召杀俄国人。当然这激起苏联政府不满。

蒋经国说：这可能是日本在东北挑拨离间。

斯大林同志答：当逮捕散发传单的中国人时，他们宣称：他们是国民党部队的。国民党有两种人：一种是公开的，另一种是地下的。在东北进行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把苏军赶出东北。国民党的这种行动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政府不允许国内有反蒋介石的言论，因为苏联政府同蒋介石签订了条约，政治路线有一条。也许在国民党内存在各种派别。

蒋经国答：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国民党内有资本家和地主的代表。不过，谈到东北的国民党组织，他（蒋经国）清楚地记得蒋介石下令东北国民党党部主任解散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甚至逮捕了这些组织的成员。

蒋经国说：应当注意到东北局势十分复杂。

斯大林同志说：他了解这一点，也许东北有自称国民党的冒名者在活动。但是国民党已正式表示不同意那些散布反苏传单的组织的活动。

蒋经国答：东北的许多国民党组织已被解散，并再次重申：东北形势十分复杂。

蒋经国问：关于国民党斯大林同志可能还有什么要说的？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需要建立容让的制度，在容让的情况下，其他党才能同国民党共处。

蒋经国答：中国的情况十分特殊。蒋介石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他奉行的是曲线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很难长期奉行此种政策。

蒋经国答：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叫嚷：他有 150 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有 60 万军队。

蒋经国说：当然，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蒋经国说：许多人认为：蒋介石向着日本，实际上他在准备同日本作战。他（蒋经国）希望斯大林大元帅明白蒋介石在竭力追求新事物。

斯大林同志说：他知道蒋介石很困难，并问：战争期间是否提拔了年轻干部？

蒋经国答：中国新任陆军部长是从年轻干部中提拔的。

蒋经国指出：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当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起来的。

斯大林同志答：国民党将作为国民自由党而存在。那些认为共产党人将吃掉国民党的人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广泛、更有影响的党。

蒋经国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存在，则对国民党有利，因为共产党存在可预防国民党解体。

蒋经国说：需要改造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选举能改善国民党，选举过程中可对人进行选择：好的留下，坏的走开。

蒋经国说：战争期间提拔了许多新的活动家。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是这样，那很好嘛，因为老活动家仍在发挥作用。

蒋经国说：最后，他希望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八年抗战中遭受

严重损失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期望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工业。不要只醉心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么德国就会打败苏联。由于苏联有工业，战争期间才有可能每月生产三千架飞机，三千辆坦克、五千门大炮、四十万支步枪、二十万支自动步枪。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工业。中国有原料和勤劳的人民。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正在讨论是否应当更加注意农业和工业。他（蒋经国）认为：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美国有私有制，但美国工业很强大。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起见，需要建立工业、修筑铁路、建化肥厂、汽车厂等。中国尚未开采石油。不过新疆有石油，南方也应当有。要组织石油勘探和开采。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外资发展自己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借助外国资本有可能比较迅速地建立工业。在苏联由于一切掌握在国家手中，建立工业不难。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比较困难。因此，中国需要得到外国贷款，否则工业化会拖延许多年。

蒋经国说：中国人担心再次陷入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斗争。中国是个大市场，外国将竭力向中国进口自己的货物。货物进口需要解决，但同时不允许外国把某些条件强加给中国。例如，美国人不久前建议给波兰二亿美元贷款，但提出的条件是：这些钱应按美国人的意愿花完。波兰人认为这个条件破坏了波兰主权。他们没有接受这个条件并坚决要求斟酌情况，而不是按美国人的要求花完贷款。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不沦为奴隶，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门户开放政策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答：外国希望苏联门户开放。如果真的那么做，苏联政府就将完蛋。但中国作为弱国只好在表面上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通常要求半殖民地门户开放。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就东北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向苏联政府发出了呼吁。苏联政府答复美国人说：苏联政府不是东三省的主人，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向中国呼吁。这一答复使美国人感到十分震惊，但美国人还是容忍了。

蒋经国问：雅尔达会议是否讨论了门户开放政策问题？

斯大林同志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苏联政府在雅尔达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的事情。

蒋经国说：杜鲁门通知中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反对中国奉行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中国同意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会反对，但苏联政府不要求中国开放任何门户。在这个问题上可向中国提什么忠告吗？在现阶段中国很难拒绝门户开放政策，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破坏。为了建立自己的工业也只好晚些时候再关门。

蒋经国说：中国目前经济状况的确十分困难。他，蒋经国认为：除苏联以外，任何人都不希望中国复兴。

斯大林同志说：他理解这一点。中国遭到日本人的严重破坏。苏联政府知道德国人是怎样进行抢掠的。

蒋经国问：苏中两国可以什么方式互相帮助呢？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并同中国进行贸易，购买中国的黄豆、大米（如果中国有很多的话）、购买棉花、一些原料，少量的钨等。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可向中国提供某些机床、机器，并派专家进行帮助。

东三省有相当发达的工业和发达的铁路网。日本人想把东三省变成自己在大陆的工业基地。

蒋经国说：在东三省的中国居民中没有业务熟悉的干部。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人是有才能的人民，什么都能学会。

蒋经国说：许多中国青年已被派往美国学习。

斯大林同志说：这不错嘛，并且表示：中国要有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财政专家、经济专家和农业专家。

蒋经国说：长春铁路的运营需要许多业务熟练的中国员工。因此，他（蒋经国）想问斯大林大元帅，他对派中国青年到苏联的学校，尤其是运输学校学习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虽说有困难，但这可以办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苏是否合适？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经济代表团可以来苏联参观轻重工业的工厂。

蒋经国说：他想提请斯大林大元帅注意新疆局势。当时新疆有许多苏联专家，他（蒋经国）认为：需要恢复以前那种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盛世才已开始逮捕苏联专家，苏联政府从新疆召回了自己的专家。如果能好好对待苏联专家，可以再把他们派回新疆。他（斯大林同志）日内将查明此事。

蒋经国说：盛世才目前已不在新疆。

蒋经国问：中国经济能否在那样基础上发展呢？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情况如何？要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封建主义残余、有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还有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集体农庄。

蒋经国说：人们告诉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发达的工业，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制革公司、铺设了铁路、并且已采取措施开矿。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工业。当然现在的蒙古人已不是从前那样的野蛮人。不过不能把中国与这个落后的国家相提并论。中国能成为一流强国。谈到经济形式，中国与蒙古不同，不是畜牧业国家。从精耕细作方面看中国农业十分发达。中国珍惜每一块土地。中国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所需要的一切。蒙古

不珍惜土地。蒙古人从事畜牧业，而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蒙古不能保障牲畜过冬的饲料。蒙古是游牧国家，所以，很落后。因此，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均不可能把中国与蒙古相提并论。畜牧业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而农业是中国的基础。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政府的东三省政策有何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需要有自己对东三省，而不是别人对东三省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蒋介石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打算把香港归还中国人。

蒋经国作了否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热烈拥护香港归还中国，当时曾就此问题同邱吉尔进行过热烈的争论。

蒋经国答：目前英国人不打算把香港交给中国人。

蒋经国说：后天他将乘飞机回国，并问：斯大林同志有什么事是否要他转告蒋介石？

斯大林同志答，他有一封信要转交蒋介石。

会谈进行了一小时三十分。

В·帕甫洛夫记录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苏联外交人民
委员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И·通金
面交蒋经国先生的（斯大林给蒋介石的）信件

重庆 蒋中正大元帅先生

大元帅先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贵公子蒋经国先生面交我一封您盛情的来信，谨向您表示谢意。

我与他的会谈涉及到一系列苏中关系问题和其他一些中苏两

国感兴趣的问题。我希望我们两国关系将按照苏中条约发展，今后我将经常注意此事。

不久前在莫斯科结束的三国外长会议已取得有益的结果，应当特别指出：此次会议有助于解决对中苏两国均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战后远东问题。

大元帅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约·斯大林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于莫斯科

新 书 选 介

《关山渡若飞》：

该书是为纪念王若飞诞辰 100 周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辑而成。全书收录了 1916--1946 年王若飞的自传、文稿等 70 余篇，老一辈革命家对王若飞同志的回忆与悼念文章近 70 篇。全书共 47 万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出版。

《梁灵光回忆录》：

本书作者梁灵光同志回顾了自己错综复杂、艰难曲折的革命生涯，真实地记录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建国后的福建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轻工业部；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州工作等等。全书共 48 万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出版。

《余秋里回忆录》：

老红军战士余秋里的长篇回忆录，在记叙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时，着重写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他一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他所遇到的问题及其问题的解决；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二是讴歌了部队中和石油工业战线上的英雄模范。全书 61.8 万字，由解放军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出版。

《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学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方面，而对于经济和文化方面（尤其是文化）的研究则比较薄弱。“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由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苏联东欧史研究室主任马允闪的这本新

著论述了 1917—1982 年间苏联文化体制的发展、沿革以及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这对于中共党史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4 月出版,全书 26.5 万字。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

该书是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近年出版的力作之一。它向人们描绘了苏联建国初期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当时土地占有关系到农村的“分化”和所谓“富农问题”,从工业品销售危机到谷物收购危机,从早期的合作社到后来的“全盘集体化”的发展,书中都作了详实的论述。全书 35.7 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出版。

《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

由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董志凯主编。该书对 1949—1952 年中国经济的实践进行了分析,着重论述了当时的产权关系、宏观管理、投资、就业等政策以及价格、税收、信贷等作为经济杠杆的运作经验。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撰写是该书的特色。全书近 30 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4 月出版。

《红军不怕远征难》:

该书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记。由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中华魂编辑部、炎黄春秋编辑部等单位在广泛征文的基础上编选而成,是长征史、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资料之一。全书 26 万字,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出版。